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No. 39 SEP. 1986

鄧小平：10年內可能內亂



劉賓雁與中國之春
中國第五代留學生



鄭寶羅先生(右)在北京會見葉飛副委員長

■ 中國留美同學
國際政治學會成立

■ 獨家專訪人口學家陳必照教授

9月號

總 39 期

1986

民聯成員鄭寶羅先生訪問北京記實

本刊徵稿

稿酬從優

暑期已到，留學生們投稿大大增加了。苦讀或打工之餘，寫些文字，議論國是，既可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又可得些額外收入。

本刊近幾期擬組織如下專題：

- 一、大陸經濟改革如樣才能突破「一放就亂、一亂就怕、一怕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
- 二、評論文革和「五·一六」問題；
- 三、民運策略的研討。進入共產黨內部從事改革與群眾運動之關係；民運手段之採取；
- 四、新一代民運人士如何打破中國歷史上「革命——專制——革命——專制」的惡性循環。

另外，人文科學研究生的論文、習作，本刊也有興趣刊登。

凡探討中西方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報導中國現狀及留學生生活的稿件，均表歡迎，稿酬從優（每千字廿五至卅元）。

中國民聯留學生服務部增加服務

好消息！中國民聯增設了留學生服務部。中國民聯的分支機構及盟員遍及全世界，與僑界、學術界、國際人權組織和服務界有廣泛的聯繫，為我們服務留學生和外出人員創造了良好條件。我們提供的服務項目有：

- ▲為留學生及陪讀家屬尋找工作；
 - ▲為自費留學生及留學生家屬尋找經濟擔保人；
 - ▲提供工作、入學、居留和法律等諮詢服務，代聘移民律師；
 - ▲留學生及大陸外出人員政治庇護事宜。
- 中國民聯絕對為服務對象保密。為保證我們工作人員的起碼生活，我們將收少許服務費用。

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

「民主的目標誰不嚮往？可是，怎樣才能成功呢？」我們總是聽到這樣的問題。

「怎樣成功？」我們的體會是：大家團結起來、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形成力量，就能成功。您加入民運的行列，民運成功的希望就大了一分。

孤獨時，常有無力感、無助感、無望感。加入民運行列，做一兩件對祖國前途有益的事，和我們共同奮鬥，會使您的這種感覺一掃而空。



取消企事業單位的黨委制

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的一步

政治改革應與經濟改革協調並進，這是我們一貫倡導的基本主張。自今年五月份起，國內政治改革的輿論驟然高漲起來。然而直到現在，政治改革仍停留在務虛階段，很少提出實際具體的方案。比如說，實行黨政分離，消除機構擁腫，都是一些很正確的想法。但是，應該怎麼做？這麼做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這些實際問題，與論界注意得并不充分。我們在此呼籲大家拿出具體可行的方案來，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辦一件實事。「一個實際行動，要比一打綱領還重要」，列寧這句話不無道理，我們不能因人廢言。

我們在此提出一個方案：取消企業單位黨委制。中國的任何一個部門（廠礦、學校、研究院和醫院等），都有雙軌指揮系統：黨政系統和業務、生產系統。黨委統攬人事、組織、宣傳以及後勤大權，對生產和業務工作人員，形成很大掣肘。他們只說不幹，平時喝茶看報紙，運動來了專整人，實際上一直盤剝工人們的勞動成果，分房子、拿獎金，樣樣佔先，嚴重地傷害了知識份子和工人階級的生產積極性；他們不懂管理、不通業務，却總是以老大大自居，以行政命令對待經濟規律，使人、財、物等生產要素無法流通；他們任人唯親，形成「中梗阻」，使經濟改革的各項政策無法貫徹落實

；他們嫉賢妒能、暗箭傷人、專搞人事鬭爭，使近年湧現出來的優秀改革家們，紛紛中箭落馬。

縱觀當今世界各國，不說制度有別的西方，單看東歐及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像中國這樣龐大的黨政系統，也是絕無僅有的。先看蘇聯，當年赫魯曉夫上台，就進行過大胆的政治改革，實行廠長負責的「一長制」。再看南斯拉夫，不僅沒搞黨委制，而且廠長和主要管理人員，都要由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聘請。故我們認為，取消企事業單位（包括工廠、礦山、商業、學校、研究機構和醫院等）黨委制，是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的一步。

對於企事業單位的雙軌領導制，看得最清楚的，也許正是中共改革派領導人。據悉，鄧小平曾在八二年就提出過要取消廠礦企業的黨委制，實行完全的廠長負責制。結果，遭來保守派領導人的群起反對，鄧小平無可奈何地放棄了這個主張。幾年下來，中國的政治形勢、民衆的民主覺悟，已不能與過去同日而語了。由於經濟改革遭受到落後政治體制的羈絆，使中共黨內的一些有識之士，也認識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否則，進行了數年的經濟改革將一籌莫展。所以說，時機已經成熟，條件已經充分，就看中共敢不敢邁出這一步了。

取消企事業單位的黨委制，并不等于取消這些單位的共產黨組織。黨員仍可以在不脫黨的黨幹部組織下，過組織生活。但黨組織已不再具有人事調動權、人事任免權和強迫非黨員職工進行政治檢查等權力。

取消企事業單位黨委制後，這些單位的領導如何產生？我們考慮可有如下方式：

- 一、本單位職工自由選舉；
- 二、本單位職工代表大會聘任；
- 三、公開招標。

國內若干試點已經表明，由本單位職工選舉或聘任的幹部組閣而成的領導班子，由於向本單位職工負責，管理效率大都明顯提高。

取消黨委制後，原黨委系統的幹部要給予妥善出路：

- 一、原脫產的幹部專業歸隊；
- 二、政府開辦職業訓練班，對年富力壯而無專業技能的幹部進行職業培訓，並負責安置他們的工作；
- 三、有興趣與辦個體或集體企業者，政府給予優惠貸款；
- 四、一部份年邁的幹部，維持原薪，由政府或原企業單位養起來。

被精簡對象的出路問題，關係到政治改革的成敗。歷史上，中國和日本都搞過維新。日本天皇對於幕府時代的貴族、武士，用給與土地的辦法，換取了他們的政治權力。中國的變法者，則未能充分照顧皇室貴族在喪失權力後的出路，從而遭到拼死反撲。今天，共產黨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當然，扼止保守勢力反撲的最有效辦法是開放言論和依靠人民，這一點，共產黨改革派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改革派宣稱要在政治體制上動手了，我們歡迎，但我們要看看具體的行動。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六年九月號總三十九期·八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六年九月號總三十九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社論

3 ■ 取銷企事業單位黨委制——政治改革勢在必行的一步
讀者 ● 作者 ● 編者

6 ■ 共產黨作風·建議「亞洲民主日」等
馮耀錦等

特輯 劉賓雁與中國之春

9 ■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中國大陸留學生)倪青賢

15 ■ 劉賓雁與「中國之春」

特輯 中國留美同學國際政治學會成立

20 ■ 報導：中國留美同學國際政治學會成立
(本刊特約記者)楊亭

22 ■ 發言選登：論中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
(中國大陸研究生)程鐵軍

國內快訊

26 ■ 防止內亂：鄧小平如何解決待業(失業)青年問題(國內)董旭生

向海峽兩岸建言

28 ■ 談中共統戰不前之原因
(中國大陸旅美作家)李目

30 ■ 共產黨只是一家，馬列主義只是一花
(中國大陸留學生)楊漫克

特別報導

31 ■ 第五代
「中國青年報」記者張健華等

39 ■ 使領館同情留學生
(中國大陸留學生)周少銘

36 ■ 當代中國文學討論會記
(西德)馬漢茂

本期專題 中國的人口政策

41 ■ 中共的「一胎化」人口政策剖析
(本刊責任編輯)張森

45 ■ 專訪陳必照教授：談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
(中國大陸留學生)楊漫克

50 ■ 中國人口問題座談會記要
(本刊編輯部)

55 ■ 我目睹的「計劃生育」
(中國大陸留美醫生)伍正則

96 ■ 計劃生育小記
(中國大陸訪美醫生)袁着

56 ■ 中國大陸殺嬰慘聞
(澳洲)朱林英

人物專訪

57 ■ 大陸歸來談統一——鄭保羅先生訪問記
(本刊記者)陳洪林 馳 遼

編者的話

本期吸引人的內容實在不少。首先是倪育賢對於劉賓雁聲明的迴響，他在沉默一段時間之後，撰文提出了不少發人深省的問題。

本刊上期刊發了「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的報導，本期又客觀報導了「中國留美同學國際政治學會」。中國之春是留學生們思想交流的園地，我們歡迎大家把研究成果寄給我們。從留美同學經濟學會和國際政治學會的成立和發展，我們看到了留美學派的逐步崛起，他們的特點是開放的，理性的，民主的。「中國青年報」的報導「第五代」，與我們有此同感。

中國大陸人口問題，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本刊的專題討論，力求客觀與公正。其中，陳必照教授的談話，極具水準。

民聯成員鄭寶羅先生的返國一行，充滿着正義感和責任感，相信會啓發很多愛國的華僑。

文革發動廿週年、毛澤東逝世十週年之際，我們準備連續幾期刊出「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專題，希望大家繼續投稿。

應作者寒山碧要求，鄧小平評傳(續編)停止連載。

下期預告

大陸城市經濟改革觸礁後，已陷於停頓。怎樣才能脫出「一放就亂、一亂就怕、一怕就收、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下期有精彩文章進行分析。

中共改革派為什麼正在醞釀政治體制改革？它與明年全國黨代會的權力重新分配有什麼關係？可能會出現什麼後果？你若思考這些問題，請看下期。

李玉先生的力作「對共產主義的分析」，因卅九期篇幅有限而移至下期，其精闢論述，頗引人思考。

民運報導

62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連續專題：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之一)

65 對否定的全面否定與再否定 (中國大陸新移民)蔡可風

71 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 (美國)劉安第

78 淺談蓋棺猶難定論 (中國大陸旅美作家)趙汝恩

民運策略

80 關於民運策略的一點看法 (中國大陸留學生)魏碑

思想論壇

82 自由民主與經濟制度的關係 (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

僑社專欄

86 自由神·華裔·中國人 (中國旅美學者)胡務實

90 文化交流，多多益善 (本刊記者)馳遠

91 海外新聞自由，豈容粗暴干涉！ (中國大陸留學生)秦風

台灣專欄

92 撥雲見日話台北 (台灣留學生)凌天鳳

香港專欄

40 富人政治的犧牲品——「大陸醫生」(香港)紅與黑

文藝園地

94 血絲——回憶我的朋友王荃 (中國大陸旅美作家)晴曉

97 燴麵館 (報告文學) (中國大陸留學生·歐洲)陸明

38 我依然徘徊 (詩) (國內)林島

98 依戀 (詩) (中國大陸留學生)楊漫克

89 詩兩首 (中國大陸新移民)草葉

封面

鄭保羅先生與葉飛副委員長攝於人民大會堂





共產黨作風

看了中春卅七期六十九頁週羅錦給黃鳳祝的信，我真有些不值她的爲人。週羅錦口口聲聲感謝黃鳳祝把她從中國「救」了出來，又一再聲稱永遠是他的朋友。但我們却在文中看到週不就事論事，却岔到旁邊去攻擊黃的私生活。說他：「左手摟德國夫人、右手摟香港情人，肚子裏是大蝦和小牛肉等。」這些東西和黃鳳祝的觀點及理論又有什麼相干？這簡直是把共產黨那一套搬到德國去了。「先從私生活上整臭，再從政治上搞垮。」

在西方私生活神聖不可侵犯。黃鳳祝有情有義，肚子裏有蝦有肉又怎樣？犯法嗎？在西方，只要努力工作，生活舒適點是天經地義的，有什麼好非議的？不像大陸，努力了半生最後可能努力到牢裏去。攻擊別人的私生活，只能證明自己的無知與幼稚。

奉勸週羅錦，妳口口聲聲反對共產黨，却

沒想到妳自己的作爲正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作風！

張松於芝加哥

眼中有樑木

我不反對在週、黃兩人的爭論中有各式各樣的見解和說詞，但是我不喜歡以攻擊別人的私生活來證明自己的論點是正確的。一個人的私生活神聖而不可侵犯。如果攻擊別人的私生活就能證明自己的論點正確，那這個論點也未免太荒謬了一些。更何況週羅錦攻擊別人的私生活，難道她自己的私生活就潔白無瑕嗎？聖經上說的：「我們常看見別人眼中有刺，却忘了自己眼中有樑木。」真是一點不差。

高紀平於加州

許多是沒有辦法的事

正因爲我不是週羅克、徐文立那樣的人，所以我只好說：「許多是沒有辦法的事，連我自己也無可奈何。」

「假如你的第一個丈夫結婚第一夜就跟你你不愉快，對性的知識無論他和你都毫無半點常識，你從此不想和他睡第二次，而由于他粗暴的性格，常爲此來毒打你，就算那一夜的「奇迹」使你竟生下過一個孩子，請問，你愛上一個溫柔的男人是不是自然的？不離婚又怎麼辦呢？還是應當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呢？」

明明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却成了我「利用人」的第一樁罪名。而我在赴北大荒之前，

是滿心以爲能和他過好的。

「假如你的第二個丈夫從不看一本書，只知道吃飽了混天黑。對魏京生、徐文立這樣的人，他竟然會說：『這些小子鬧騰什麼？全應該逮起來！』甚至他告訴過你，在他前妻要求和離婚時，爲了報復她和支持她離婚的哥哥，他故意「揭發」她和她哥哥去天安門參加了「四·五」事件，因此兄妹二人受到審查，他爲此一直得意不止。即使他再愛你，又和他沒有孩子，離婚就成了罪名嗎？還是你太小題大做了呢？」

是的，這次離婚就成了我第二樁「利用人」的罪名。然而，我結婚以前并沒想過和他離婚，也滿心以爲能和他過好的。

每次離婚，無論在精神上、經濟上、名聲上，對我都無法計量的損失。究竟我得到什麼好處了呢？我真不明白。如果不離婚，背着丈夫去搞情人，反倒不會有什麼罪名。但這「利用善良人」的罪名從國內一直背到國外，一直要背到死，我已經「認命」了。

好在我已習慣，并不希望人們說我好。如果有人當面誇我或寫我好，我反倒很别扭了。我早已準備着挨更多的罵。因爲我常會做出傻事或荒唐事來，也不準備改變自己。我寫書，從沒單純地訴過苦，總是連歡樂一起寫的。我最討厭那種自哀自憐的文章，我只是坦白，從不想懺悔，也不想做個「正人君子」，是的。

如果說我有罪名，那就是不該在文革中，結那兩次婚，而應像週羅克一樣巍然屹立。但我不是週羅克，總是做出沒辦法的選擇，要不這世界怎麼豐富多彩呢？

至於我要求庇護後某些報紙的宣傳，實在也沒辦法。比如我從沒說過我要「爲十億人吶喊」，我可不是林希翎。但報紙非要這麼說

，連我看了都很生氣。我講話有時很慢，有時很不願講話，但報紙上却說我講話飛快，一秒鐘能講六個字。我的嘴唇長得雖然不大，可也不薄，可報紙上却說我上下唇薄薄的，好像這樣才「能說會道」。我是一個一點不「強」、很軟弱的人，常常以「一定會自殺」為自己的光榮結局，以前做的事也沒有一次「強過」，更討厭人家說我是什麼「強人」，可報紙上說我對一切困難都不在話下，真讓我氣得要死！沒有辦法，許多是沒有辦法的事。而人們看了報紙的宣傳，反過來挖苦我了。沒辦法，真是哭笑不得、無可奈何。

至於黃鳳祝否認的：如博士學位問題，他沒講過什麼話問題，生活方式問題，稿費問題……我都懶得再回答了。因為太容易反駁他了，所以不想回答。請大家原諒。

不管黃對我怎樣，我內心裏永遠感激他。永遠愛他。我希望和他是朋友，一直是這樣的。但他不願意理我，又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沒有辦法，許多事情常常是無可奈何。

我真希望我的經歷、一切感情故事能全文公之於衆。《聯合報》現在雖然連載我的《在中國，一個結過三次婚的女人的自述》（他們在「中國」之後加了「大陸」二字。真沒辦法），但由於報紙篇幅有限，跳的幅度極大。有一多半內容都未能刊登。而這些內容牽涉到哥哥和我個人的道德與感情故事；我懷疑，他們所以跳過去，是否與我哥哥的信仰和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有關呢？但我已經很感激他們了，起碼對這作品起到了宣傳作用。可許多人并不知道跳的幅度極大，實際上又影響了這作品給人的印象。我真希望某家中文雜誌或出版社能一字不刪地登我這篇文學作品，以期引起更廣泛的討論。比較全面地了解一個人的生活，了

解這個人對那個社會的感受，再討論才更有意義。我相信一定會有全文刊登的機會。

遇羅錦一九八六年七月，西德

犯了何罪？

看了貴刊在卅七期所報導的有關徐文立在監獄中慘遭虐待的消息，心中真是不能自己。徐文立到底犯了什麼罪？他只不過是要中國早日走上民主的道路而已。他的罪名也只有在中國這個獨裁專制的國家才會出現，當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發現他竟然是以這種罪名入獄，其不對中國感到失望和輕視者幾希也！不單是中國大陸，在海峽的另一邊——台灣，也有為政治異見而入獄達三十餘年者。海峽兩岸在這般獨裁者統治下，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會出現真正的民主社會？

張 根於加州

應理直氣壯

看了中春封三上關於增加留學生服務的「啓事」我們這裏的大陸留學生都覺得很親切。我們都知道，中國駐外使領館的頭頭們，除了「管」留學生外，對留學生真正的困難是無法幫忙的。中國民聯的服務留學生工作，正好彌補了這一缺失。

然而，「啓事」中最後一句話——「為保證我們工作人員的起碼生活，我們將收少許服務費用」，讀後令人感到不是滋味。為什麼你們民聯工作人員只能過「起碼生活」，而不能過「正常生活」？收服務費為什麼不可理直氣

壯，而是羞羞答答？在美國有句話：「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們認為，你們為大家服務，接受服務的人交費是應該的。

順致敬意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董樹之等

國共兩黨對外蒙的態度

中國留學生廣昆先生，在卅四期讀、作、編上有個高見，他說：「毛也不屬於擴張國土的偉人……毛同意讓外蒙古獨立，外蒙古逐漸落入蘇聯版圖中。」因此，「毛這是變相的賣國行為。」

大家都知道，外蒙古獨立是在日本投降之後，毛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之前。外蒙古獨立時的中國政府，正是中華民國政府，當時與蘇聯有外交關係的也是這個政府，執政者又恰恰是已經作古了的蔣老先生。廣昆先生不是指着和尚罵禿驢嗎？

香港地盤工會 鳴上

外蒙於一九二一年在蘇俄羽翼下宣佈獨立。當時蔣介石曾公開聲明不承認外蒙獨立，表示國民黨政府態度。但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在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完全而無條件地承認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蔣的外交部長王世杰，在與蘇聯簽署的「中蘇友好條約」中，為了取得蘇聯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竟允許蘇聯在文件裏使用「蒙古人民共和國」一詞。

由此可知，國共兩黨，在為求目的不擇手

段方面是無分軒輊的。

——編者——

陪讀停止了？

帶著憂慮的心情讀完了中國之春第卅六期。應該說，我是留學政策收緊的一個受害者。我太太（以前稱愛人）申請陪讀已有數月，本來都快批下來了，前幾天突然接到通知：中央最近有文件，公費生陪讀一律停辦！我太太到處打聽，據說國家教育委員會最近下了八十八號文件，明令停止辦陪讀護照。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呢？聽說都在鑽別的路子，苦就苦了我們小民了。獨裁者們，想收就收，想放就放，全然不顧我們百姓的人權。

是「人民」共和國？還是獨裁者的樂園？
（大陸訪問學者）魯旋駟於美西

要擴大層面

讀卅三期中春三十頁的民聯二大代表發言，華盛頓州代表張俠提出「爲了擴大影響，應該爭取外國友人支持，不知外國人可不可以加入我們的民聯。」我當時拍案「此人高見！」我推測，民聯沒讓外國友人在組織上加入，是怕有「勾結番邦」的嫌疑。美國當年打獨立戰爭，他們是從英國出來的新移民和「母國」英國作戰，是一場「內戰」，可是法國幫助美國人打「內戰」，起了重大的作用。

當年中國對日本作戰，美國陳納德將軍在中國內地的空軍部隊，轟炸日軍，蘇聯殲滅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現在仍有蘇軍陣亡紀念碑

，這些是外國友人爲中華民族流血的例子。國共戰爭，中共一早就有蘇俄的包羅庭軍事顧問。在長征中有共產國際的人參加，（這些過去被中共隱瞞）。抗戰中有白求恩大夫、柯隸華大夫等。國民黨，則有無數的美國顧問。連國共的暴力鬥爭也允許外國人幫助，大打出手，流血。爲什麼中春的和平民主運動不可以讓外國人參加組織、寫寫文章、在會上發言？當然可以嘛！

加拿大華僑張日比於溫哥華

建議訂個「亞洲民主日」

當我讀到馬科斯終於下台出走的新聞後，興奮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以致通宵失眠。英勇的菲律賓人民以自己的英勇鬥爭，不僅迎來了自己祖國的民主化，也爲亞洲民主化開創了新紀元。菲律賓人民創下了兩大奇蹟：

第一個奇蹟是一個亞洲國家的人民，自己走上街頭爭取自己的民主權利並獲得成功。（美國雖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基本上只是承認了菲律賓人民的選擇。）

第二個奇蹟是用人牆堵住了坦克，人民瓦解了軍隊。這在亞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見的。

長期以來，東方人、亞洲人，被看成是安於家長制的馴良順民，即沒有民主意識，也沒有民主願望，既不需要民主權利，也不適合民主政治。軍隊有更大的決心投向人民，方使馬尼拉的勝利歡呼永遠在世界上迴響，以使全世界明白，東方人再也不是沒有民主尊嚴的順民，東方的獨裁時代已經快要完結了。

中國大陸研究生桑羊於亞利桑納

「經濟決定論」再議

中春三十七期關於「經濟決定論」的討論實在發人深省。

中共說，當前他們全黨上下的頭等大事是把經濟搞上去，只有經濟上去了，才能實現四化；並且希望海內外中國人爲四化作出貢獻。這種論調，充份說明了他們對現代化的無知，他們也低估了海內外中國人的思想水平和知識水平。

著名行爲科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勒乃爾（DANIEL LERNER）曾告訴人們：「現代」或「現代性」不是一個單一的或一些不相連的社會文化的現象，而是一「綜協的整體」。它包含工業化、都市化（URBANIZATION）、世俗化（SECLARIZATION）、及普遍參與（POPULAR PARTICIPATION）等多項。工業化就是經濟現代化；都市化就是社會生活的現代化；世俗化是「聖化」的對稱，聖化是傳統社會的態度與行爲，其特點爲先驗的、感性的。世俗化是一種實證的、理性的態度與行爲，可以說世俗化即是意識形態的現代化；普遍參與又包含媒介參與（報紙、雜誌、廣播、電視）和政治參與，亦即輿論開放和政治民主，就是大家的事。這幾項是現代化社會必備的起碼條件，缺一即非真正的現代化。中共宣揚的「現代化」，算什麼現代化？

劉安第於加州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答劉賓雁聲明

倪育賢

編者按：劉賓雁作品「第二種忠誠」中的主人公之一倪育賢於一月十七日飛抵美國。一月二十五日，中國之春編輯部及中華人權協會在紐約為他召開了「第二種忠誠」座談會，會中倪育賢道出了他來美的經過及劉賓雁受壓的內幕！（詳見中春三十四期）。之後，劉賓雁於三月一日在北京公開表態，發表聲明。由中共的香港「文匯報」和北美「中報」三月十日頭版刊登。

劉賓雁的聲明全文如下：

鑒於倪育賢出國後頻頻發表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我認為有必要發表如下聲明：

一、幾年來我寫了幾十萬字的報告文學作品，在各種文學刊物上發表。倪育賢不過是我所寫的許多人物之一；我同他的關係不超過作家與他的寫作對象之間的關係。因此，倪育賢無權以我的代言人自居；我對於他發表的任何與我有關或無關的言論，也不負任何責任。

二、最瞭解我的政治境況的，莫過於我本人。關於我在國內是否享有創作自由或受到政治「迫害」，最有力的證明是我的活動和作品。就當倪育賢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報告文學」一九八六年一

月號剛剛出刊，上面就發表了我訪問西德歸來後的第一篇關於西德的報告。在那裏，我一如既往自由地表達了我的政治觀點。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倪育賢發言之虛妄。

三、當一月廿四日我接到倪育賢從紐約打來的電話時，我對他的第一個勸告就是不要和「中國之春」發生關係。所謂「中國之春」這個組織，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我抵達紐約的前一天由王炳章宣佈成立。他曾要求與我會面，被我斷然拒絕，這是我一貫的政治態度。

四、因此，倪育賢依靠一個我所反對的政治組織呼籲什麼「海外作家與文藝界人士發表文章支持劉賓雁」就純屬嘩眾取寵之舉了。

五、總之，倪育賢只能代表他自己。至於他是否如他所說，「希望國家好，希望社會進步」，那要由他言行效果來證實；而迄今為止他在美國的言論與行動，却表明他站到全然相反的立場去了。

劉賓雁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於北京
倪育賢在沉寂了兩個月之後，對劉賓雁的聲明做出了回應。

今年三月十一日下午，我獨自在洛杉磯發現一份報紙的頭版用大號鉛字套紅印著劉賓雁的名字；而黑字副題裡竟然嵌著我自己的名字，不禁大吃一驚，迅即買了一份細讀。原來是劉賓雁在北京發表了一項宣布與我劃清界線的聲明。

相反的立場？

聲明中劉賓雁指責我「出國後頻頻發表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並申明劉賓雁與我的關係「不超過作家與寫作對象之間的關係」，還鄭重宣告：「倪育賢無權以劉賓雁的代言人自居。」對我的言論「劉賓雁不負任何責任。」

劉賓雁還在聲明中宣稱自己享有完全的創作自由「能夠一如既往地自由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所以在美國呼籲海外作家支持劉賓雁是「純屬嘩眾取寵之舉」，最後劉賓雁嚴肅地指出「迄今為止，倪育賢在美國的言行已站到與希望國家好，希望社會進步全然相反的立場去了」。

讀完這個聲明，襲上心頭的第一閃念慮是：難道這真是劉賓雁自己的意思嗎？

機敏過人的香港文匯報編輯先生好像早就料到讀者（其中自然包括我）會產生這種疑問

。所以，就在這個聲明下面，周到地同時刊出了一份劉賓雁聲明的親筆手稿影印件，我認得出劉賓雁的筆跡，在這裡，我有義務為文匯報作證。這聲明確是他的親筆，完全可以排除文匯報冒名發表聲明的嫌疑……

於是，我終於大澈大悟，我雖然到了美國



劉賓雁



倪育賢

，但還決不是一個可以真正自由發表意見的人！這時，一陣巨大的悲哀猛烈湧上心頭，我忽然感到渾身乏力。我真想在洛杉磯街頭痛哭一場，我要為我自己，也為劉賓雁，為那片已與我橫隔著整個太平洋的土地痛哭！

到處被轉載

如果把劉賓雁的聲明僅看作是劉賓雁個人的一種政治表白是幼稚的。劉賓雁聲明是通過香港文匯報對外發表的，然而不久即由上海市一家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報刊文摘）全文轉載。接著一家公開發行的全國性文藝報刊也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國內報刊全文轉載一篇海外報刊的文章，這在文革以後恐怕也是史無前例的。這與這兩家報刊以往對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持不予置評的抵制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經歷過大陸生活的人都知道，一家官方報紙以贊同的姿態公開發表一份指責某人政治立場的聲明，這對被指責者即意味著一種政治判決，因為，只有上級黨的權威機關才擁有指示公布這種聲明的權限。

大陸報紙公布「劉賓雁聲明」這件事，實際上，是給那些敢於在海外發表批評性意見的「狂妄份子」一個警告：誰如果想在海外發表「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那麼，「我們將採取相應的制裁措施」。

我終於又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的留學生，患著那種病態的政治恐懼症的原委了。

自從大陸報刊公布「劉賓雁聲明」之後，原來跟我通信的大陸朋友，幾乎都不約而同地中斷了與我的聯繫，而從不涉世事的祖父也憂心忡忡地生起病來，來信反覆叮嚀要擁護「黨」的方針政策，牢記黨的恩情，我妻子也一再

來電、來信懇求不要講大陸問題，我的老岳母得知報上又發了批判女婿的文章，急急匆匆趕了幾十里地到我家中探看是否安好。

我子女就讀的學校「組織上」也找孩子談話，要求他們能「正確對待父親的問題」，至於究竟如何才算「正確」了，卻沒有更具體的指示……嗚呼、文章殺人，我們中國古已有之，文革為烈，想不到至今餘威猶存。

一如既往？

不管「劉賓雁聲明」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劉賓雁本人的意願，目前的情況已清楚顯示，這個聲明完全代表了中國大陸部分當權者的意見，既然如此，我作為被官方報刊正式指控的一方，繼續保持沉默就是一種不敢正視現實的怯懦行為，我必須作出公開而且明確的答覆！

記得去年九月的一個晚上，我離京回滬時，劉賓雁在家略備小酌為我餞行（席間第二種忠誠的另一主人公陳世忠先生也在座）劉賓雁不無感慨地對我說：「我將來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希望在我的墓碑上寫下這麼一句話：『這裡埋葬著一個敢講真話的人』。」

而今天，劉賓雁却發表了一個宣告自己享有「一如既往」表達政治觀點自由的聲明。真是絕妙的「一如既往」。

我的一位極可尊敬的老大姐告訴我：「劉賓雁可不是一個肯講違心話的人，他是倔強的。」

這一點我毫不懷疑，我比任何人都更相信劉賓雁的正直和傲岸。然而我也許比任何人更清楚在大陸的巨大的政治天秤上，個人的那些傲骨是永遠壓不下權力的法碼的。

有些外國人會感到不可思議，為什麼堂堂

的第一夫人肯在脖子上掛著一長串乒乓球站在門鬼台上彎腰九十度，爲什麼那些經過刀山火海的老將會連連高呼打倒自己的口號。外國人也許感到不可理解的，我却理解，因爲我也是中國人，我在那裏生活了整整四十年，我也會跪在地上雙手被銬在抽水馬桶的彎頸上，我會經屈辱地一次又一次在拘捕證上簽字，我也舉過紅寶書，敬祝過那個現在大家都在喊千刀萬剮的老太婆的身體永遠健康！

我深知，如果事態不是已經嚴重到了非如此不可的地步，劉賓雁是絕不會發表這種實質上是自我否定性質的聲明的。

幾乎就在我召開記者會之前十天，劉賓雁自己就在答香港鏡報雜誌文章中承認自己遭到極大的麻煩，說自己「已經到了一種沒法寫下去的地步」，「我受到的限制和威脅並沒有完全解除」，「危機」沒有解除。請注意，這裡劉賓雁自己使用的詞彙是「威脅」和「危機」，其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在講話和文章中所使用的詞彙，劉賓雁甚至還駁斥了某個大人物散布的關於劉賓雁的麻煩是自找的這種論調，劉說：「我不同意某些人的說法，好像我的困難就是因爲我的報導有些不實造成的。根本不是這回事。不要造成這麼一種錯覺，劉賓雁生活得很舒服，創作條件很好……。」

一月廿四日我與劉通電話時，劉也率直告訴我，處境還很不好，但是在一個多月之後，劉賓雁却不得不在北京發表了一個表白自己享有充分創作自由的正式聲明！

創作自由何在？

劉賓雁不愧是一個具有幽默感的作家，如果沒有這四個字，我倒真是會給搞糊塗了。因

爲熟悉大陸的現代文學情況的人都很清楚，劉賓雁登上大陸文壇以來幾乎每發表一篇作品都會帶來一連串的政治誣陷，劉賓雁親口對我說因爲發表了「人妖之間」，曾有人竟揚言要用製造車禍的辦法來除掉他，如果時時要擔心意外的「車禍」這就是所謂的自由，那麼這種自由對於一個作家來說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如果這種自由還能夠一如既往下去的話，大陸的文藝究竟還有什麼希望可言？

從這裡我幾乎悟出了一個有些規律性的道理來，那就是：當一個作家還要靠官方報刊發表聲明來表白自己享有如何如何美妙的創作自由時，創作自由是不存在的。劉賓雁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們評判一個人不能用他自己的評論爲依據，我想同樣的道理，我們評判一個人的自由，也不能以這個人的自我表白爲依據，特別是當這個人處在一種「連續不斷的困難和麻煩」的環境中，他所受到的威脅和危機還沒有真正解除之前！劉賓雁畢竟是劉賓雁，他在聲明中不無深意地寫下這樣的話：「最了解我的政治情況的，莫過于我本人。關於我在國內是否享有創作自由或受到政治『迫害』，最有力的證明是我的活動和作品。」

在這裡劉賓雁自己給了我們一個解答這個疑問的鑰匙，即對劉賓雁是否享有充分的創作自由的答覆，不應以他或別人的某種政治表態中（諸如聲明之類）去尋找而應當從劉本人的作品和活動中尋找，而我在美國作的有關劉賓雁因「第二種忠誠」而受到巨大壓力的結論恰恰是從大量的無可置辯的有關劉賓雁活動的事實中得出的，（例如第二種忠誠的續篇被扼殺，開拓被禁等），饒有趣味的一點是，劉賓雁在聲明中並沒有對我列舉的大量事實作任何一

點具體否定，要麼是劉賓雁其實並沒有讀到我的發言的全文，要麼是劉賓雁認爲我所舉的事實都是真實的和不容置辯的。

但無論前者還是後者，聲明指責倪育賢「虛妄」的結論是顯得那樣的軟弱無力、惱人的軟弱無力。

聲明「謹此一點」地舉出了劉賓雁在報告文學一九八五年一月號（疑爲一九八六年之誤）發表的訪德報告的事來證明作者一如既往地享有自由表達政治觀點的權利。然而就在同年同月，劉賓雁自己在對一家港刊講話中就坦率地指出，這篇訪德報告是因爲他寫了一篇關於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的報導文字遇到了麻煩被拉下來以後，只好以此代替。

衆所周知，劉的訪德是在歷盡種種屈辱的折磨足足被延擱了半年之久，當局爲了平息紛紛議論而勉強放行的。所以劉賓雁聲明中據以證明其政治境況良好的僅此一點事實也都只能從反面來證實劉賓雁受到的巨大壓力，根本未見減輕的。去年「鍾山」雜誌第四期發表劉賓雁「我的自白」，用極清楚的語言表明作者因寫作觸及時弊的作品而時時處在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之中。這難道也是倪育賢爲了嘩衆取寵而虛構出來的嗎？！

兩個劉賓雁，一身兼二任

於是在我們面前，就出現了兩個劉賓雁，一個是敢於爲真理呼嘯吶喊的戰士，他在維護正義和鞭撻黑暗的鬥爭中以大無畏的勇氣，高舉理性的火炬呼嘯著前進。另一個是作爲官方政治利益辯護人的劉賓雁，這是一個小心翼翼地，千方百計要避開潛伏在水中的暗礁的飽經滄桑的舵工。他時常擔心着說不定那一陣狂風

惡浪會把這艘危舟捲進深淵。

我當然充分體會到劉賓雁這種一身而二任的困難處境，劉賓雁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黨的紀律要求他在政治上永遠要與黨的領導保持一致。而迄今為止任何一屆的黨的領導都堅持聲稱只有自己執行的政策才是最正確的政策，因而凡是批評現行政策的一切言行都必然將被自然推論為對黨的領導在政治上不一致的錯誤甚至罪惡。

而劉賓雁却希望在這種體制中鶴立雞群般地保持一種善意的批評者的立場。但是被批評者却並不是都能夠體會到批評者這種善意，他們常常會懷疑你是一個居心叵測的不同政見分子。

於是儘管劉賓雁的大膽的批評意見受到從來沒有批評權的人民的熱忱歡迎，但却必然要遭到權力階層的懷疑和排斥。劉賓雁的麻煩，其根源或許就在這裡。不能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的全部真實思想，這是整整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真正悲劇，其實沒有一個人會感到是真正自由的，但他們却始終要公開聲明他們正在享受着最充分的自由，否則，他們手中僅有的那麼一點曲折表達思想的權利也將被無情地剝奪殆盡。從張賢亮一月間在美國發表的那個慷慨激昂的宣言到劉賓雁三月初發表這個義憤填膺的聲明其實都是這種曲折心態的寫照。從這個意義上講，劉賓雁的聲明確實具有一定的歷史文獻價值。它證明了即使勇敢如劉賓雁這樣的作家，也不得不扮演政治利益犧牲品這樣的角色！

劉賓雁的確對我不滿

當然，我決不是說劉賓雁的聲明都不是劉

本人的真實思想，劉賓雁在聲明中極真切地表達了對我在紐約發表講話的那種不滿情緒，這一點毫無疑義是真實的，他確實電話中告誡我不要與某個團體來往，只是由於一些技術性的原因，我才未能完全按劉賓雁的囑託辦事，對此，我深感愧疚。

由於大陸長期以來實行的新聞封鎖，我這個剛從大陸出來的「所謂的知識分子」，對海外複雜的政治情況幾乎渾然無知。因此在行事處世上不免帶有相當的盲目性。然而，至今我還是認為，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紐約的記者會和座談會，所作的發言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對在這二次會上的講話負完全的責任。

我在講話中只對真實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敘述，我在發言中公開發明，我的發言只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任何其他個人和組織。我始終認為，由什麼團體和什麼個人出席這個座談會，只是一個形式問題，而何況這個座談會也不是由某個團體包辦的，更何況我對大陸那種動輒以政治判決方式把一個不合自己意的團體打成什麼什麼性質的做法最為不滿。所以，我當時認為，只要不對我的發言內容作任何限制，由什麼人來參加座談會都無關大局。事實上我也無權拒絕任何關心劉賓雁問題的人和組織，參加會議和發表意見。

我最關心的一點是作為會議的主講人，我唯一的責任是必須講真話，如此而已，我也確實這樣做了，我當時無論如何也沒料到這件事，後來會給劉賓雁造成那麼嚴重的困擾，我也沒有想到，我的發言會給我招致那麼嚇人的罪名！

就我自己而言，在前後二次會上，我都一再聲明，我的發言，只代表我自己，我並不代表劉賓雁，我對我的發言負完全的責任。我這

樣聲明的目的是預防有人會鑽空子，也為了避免因我的發言而造成劉賓雁的困難。所以當我看到劉賓雁聲明中責怪我以他的代言人自居的時候，確實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我真不明白這種批評根據何在？現在細讀了文匯報編發的這段新聞才恍然大悟，原來劉賓雁的這個誤解，其源蓋出於文匯報的這段新聞，而文匯報的這段新聞是純然憑空編造的，這只要查對一下我的發言記錄就一清二楚了，謝天謝地，當時還總算未忘了留下錄音為準。還有紐約幾十位學者和新聞人士都在場可作見證。

不負責任值得玩味

聲明中顯得最值得玩味的一點是，指責我頻頻發表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如果說我到了美國後偶爾會發表過幾句政治言論這確是事實，說是「頻頻」這就有些過舉了，因為我在美國既要上學又要謀生，自顧尚且不暇，那有餘暇常常來高談闊論呢？頻頻或否，實在無關宏旨，關鍵在於我發表的是不是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

在這裏我想遙致劉賓雁一句摯語，問題不在發言者願不願意負責，問題在於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有沒有不負責任地發表政治言論的可能。就我自己的生活經驗來說，我可以說我的前半生遭受的一切磨難和痛苦都是因為負責地發表政治言論造成的，大陸有警察、有黨、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有那麼多具有高度革命覺悟的群眾，那麼多別紅袖章的工糾隊員和居民委員會的老婆婆，你能發表了某種政治言論而不負責任嗎？當然在中國也不是沒有任何權利不負責任的說話。說真的，這種不負責任的自由天地還確乎廣闊得很，甚至絲毫不亞於別

中國文譚



和去年秋天成爲港人熱門話題的吳亞倫一樣，倪育賢借去美國留學的機會，發表了不少言論。不同的是，吳亞倫言及的是他個人；而倪育賢則一時失誤，將自己當作了劉賓雁的代言人。

大約倪育賢認爲，既然劉賓雁在「第二種忠誠」裏爲他倪育賢的不幸經歷作了代訴，他也可以借美國這塊「自由天地」代劉賓雁作些不平之鳴了。我們不能認爲倪育賢會別有用心，但他做事考慮不周却是肯定的。首先，美國雖是「自由世界」，却有派別之爭，他爲劉賓雁代訴之語，不只是可能是事實，更可能是事實上一派攻擊中共之炮彈；其次，他還有欠考慮：劉賓雁必然會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發表自辯的聲明。

去年秋天，劉賓雁因爲「開拓」雜誌被封、「第二種忠誠」及其續篇受到一些非議以後，因說了一時的氣憤之語而被報導成「退出文壇」。那以後，劉賓雁一直成爲海外注意的中心，「文壇是中國大陸的晴雨表」也慢慢地變成了「劉賓雁爲中國文壇的晴雨表」了。所以倪育賢的一番愚忠式的代言，也給劉賓雁造成了新的壓力：倘若「失去自由表達政（這點劉賓雁用萬言長文肯定過）可以說明他的兩個「希望」的確已到了一「愚」的地步；另外，他明知自己發表了大量「偏」的言論之後，毫無躲閃閃閃有避難之意，而是毫不猶豫地回到了中國大陸，可見他對中國有信心，對中國的未來是懷着希望的。

倪育賢已回到北京，劉賓雁的澄清聲明也見諸海外的報紙，一樁壞事，可謂已挽回，海外華人只要懷着公正之心的，也必不會因此產生歧見。所以，筆者希望，對於有不確言論於海外而又回到國內去的人士，可以不必追究個人責任，俾使海外華人更信服中國大陸的開明政策！

倪育賢的愚忠

筆者認爲，倪育賢此舉，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他的愚忠加上某種政治勢力利用的結果。所以，劉賓雁的聲明，對消除其錯誤影響是會有好處的。

但有一點筆者與劉賓雁的看法不同，即筆者相信倪育賢的「希望國家好，希望社會進步」的話是真的。從倪育賢以往二十多年的歷史

（這點劉賓雁用萬言長文肯定過）可以說明他的兩個「希望」的確已到了一「愚」的地步；另外，他明知自己發表了大量「偏」的言論之後，毫無躲閃閃閃有避難之意，而是毫不猶豫地回到了中國大陸，可見他對中國有信心，對中國的未來是懷着希望的。

雨寒

圖為一家左派報紙所刊登的有關倪育賢已回到北京的謠聞。文中並說：「一樁壞事，可謂已挽回。」

的文明大國。例如，在中國有權不負責任地談論「今天天氣，哈哈！」也有權不負責任地捕風捉影報導平民百姓的桃色新聞，甚至有權不負責任地製造能致人於失去自由到生命的冤假錯案，但唯獨沒有可能不負責任地發表什麼政治言論。這樣的證據還嫌少嗎？張志新因爲要對她的關於懷疑文革的政治言論負責而割了喉管；邁羅克是因爲要對他關於唯成份論不滿的言論負責而飲了槍彈；王申西只是因爲在給他的女朋友的情書上發表了政治言論而被砍了頭顱；我自己也因爲要對要求民主的政治言論負責而差點丟了殞命。

在大陸這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還真有什麼可以發表了政治言論而不負責任的人嗎？

捲舖蓋回北京？

對我這樣一個多次因政治言論而出生入死的劫後餘生者還修談什麼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萬事都有個例外。像毛澤東這樣執掌最高政權的人與之所至也許可以一時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一番。但是到頭來歷史和人民還是要算他老人家的老賬，所以發表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是縱使求之也不可得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能找到的倒是那些爲自己的政治言論負責到死的冤鬼遊魂！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不是嗎？其實官方公布「劉賓雁聲明」這件事本身即是一個極生動的例證，不是有人誤以爲只要出了國就可以「不負責任」地談論國是了嗎？

天下那有這樣的便宜事兒。我在紐約只是無關痛癢地議論一下創作自由這種雞毛蒜皮之

事，中共就忍不住要通過香港文匯報發表聲明，遠渡重洋追究責任來了，如果萬一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地議論起別的什麼國脈民命之言來，還真不知道要龍顏震怒到什麼地步呢？中國的知識份子向來謹言慎行戰戰兢兢了，口將言而嚙，足將行而踟躕，偶然也出幾個不怕殺頭的，也終不免被大多數明哲保身的聰明人，視為怪誕和瘋狂，往往一入禁區便遭警告。其中不乏終於幡然悔悟、逐漸痛改前非將功贖罪者。

自絕於人民？

怪不得，有位先生按照「正常」的邏輯推理，在報上發表文章，想當然地推斷我自感罪孽深重，愧悔交加，必定已急急捲起舖蓋回北京請罪以承擔散布不當政治言論的責任去了。

劉賓雁聲明的結論中說：「迄今為止倪育賢在美國的言行已站到與『希望國家好和希望社會進步』全然相反的立場上去了。」平心而論這個判斷是夠嚴厲的了。如果這句話是劉的個人結論，儘管嚴厲，但也終究不過是一個文人作家的意見，但當這個聲明通過大陸官方的宣傳機器加以認可並予以公布之後，其作用、其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經過黨的宣傳機關肯定這道官方程序之後，劉賓雁聲明中對我所作的政治結論實質上已成了「黨」、「政府」，也就是「中國」對我的政治判決了，區區一個知識份子一旦有幸被黨的報刊認定為已站到不「希望國家好，希望社會進步」的立場上去了，那不就意味著這個人已墮落到不可救藥的自絕於人民深淵中去

了嗎？

根據目前大陸官方的文告，那便是作爲頭

號政治對手的蔣經國先生也不至於「壞」到不「希望國家好」和不「希望社會進步」的地步啊，難道一個留學生在國外對一個作家的處境和黨的文藝政策略有微詞，就會變得如此危險可怕嗎？

讀過「第二種忠誠」的人都知道，作者在文章中熱情讚揚了陳世忠與我在面臨殺頭判刑的巨大危難時，敢於挺身而出，敢於爲人民利益講真話的精神。劉賓雁把這種肯爲真理而獻身的精神，謳歌爲「第二種忠誠」。

不背叛「第二種忠誠」

現在的問題是，作爲「第二種忠誠」主人公之一的我，到了國外，是不是還要保持和發揚這種敢講真話的勇氣？

如果我明明知道劉賓雁的真實境況，而爲了某種一時的利害，而掩蓋真相，不肯出來「譁衆取寵」，那麼我認爲這實質上是對「第二種忠誠」的一種背叛和褻瀆。

我相信，劉賓雁先生從內心深處是必定希望我能保持和發揚那種敢於爲真理而鬥爭的精神的，因爲我深知劉賓雁先生的心是始終與中國人民的心在一起跳動的。

所以，我完全不介意于「劉賓雁聲明」中對我所作的一些誤解。

我從大陸報刊公布「劉賓雁聲明」的那一日起，就不把該聲明看作劉賓雁先生自己的行動了。

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這個聲明已成了大陸某些極左勢力對思想解放運動的一種反撲，其矛頭決不僅是指向我一個人的，而是指向敢於批評大陸政治弊病的民主思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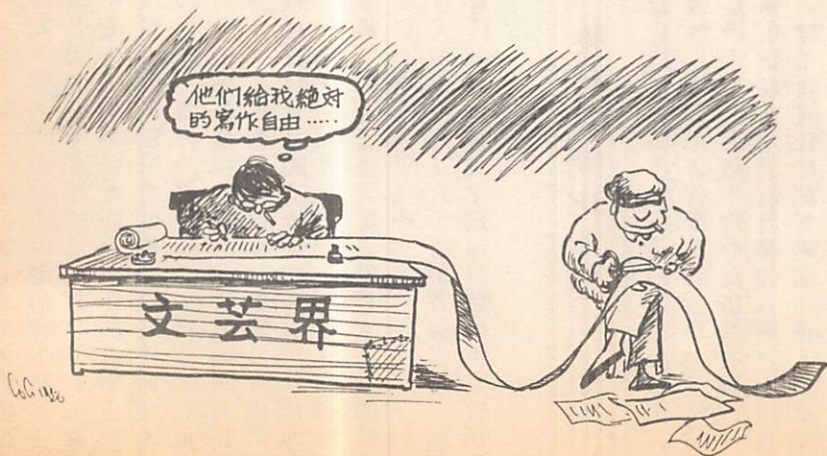
從根本上來說，也是指向劉賓雁自己的，

所以我決定打破沉默作出上面的回答，這不僅是在維護我的政治聲譽，也是在維護劉賓雁先生嘔心瀝血栽培出的「第二種忠誠」的幼苗。我堅信，由於個別傳播媒體的誤導，劉賓雁先生對我產生的一些誤會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得到澄清。

祈祝我所敬愛的老師劉賓雁化險爲夷，一切順利。

（一九八六年六月于加州）

倪育賢



劉賓雁與中國之春

(中國民聯) 王炳章

提起劉賓雁，我想到盧卡奇——一位堅信正統馬克思主義而無情鞭笞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匈牙利共產黨員。

六十年代，西方翻譯、出版了盧卡奇的著作，同時，西方知識界與流亡西方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為盧卡奇的人權進行呼籲。然而，身居國內的盧卡奇，却對西方輿論大聲抗議。

今天，中國民聯、倪育賢與海外學者在紐約聲援劉賓雁，得到的反而是劉賓雁「斥責」《中國之春》和倪育賢的聲明。

當年，盧卡奇的行為引發了人們的思索；今天，劉賓雁的聲明也招致了種種議論。

有人說，中國民聯和倪育賢揭露了中共保守派壓制劉賓雁的內幕，觸怒了保守派。當局給劉賓雁強大壓力，迫使其發表聲明。按這一解釋，劉賓雁在那種殘酷的制度下，連「不說話」的自由都被剝奪了。這正是當年胡適先生的感慨，他指出，至少，國民黨給了人們「不說話」的自由，而共產黨連這一自由也給剝奪了，它逼迫人們進行「政治表態」。

有人說，劉賓雁內心支持中國民聯的事業，也樂於見到海外的聲援，但他故意發表聲明，與中國民聯「劃清界綫」，以防落給中共當局任何口實。劉賓雁以這種主動說「違心話」的方式，給自己繼續講些真話創造條件，以便在國內繼續為民主和自由而戰。

有人說，劉賓雁雖然對中共執政者的某些作法不滿，但他仍是一個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而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他對中共問題的批評和揭露，僅是奉獻他的「第二種忠誠」。因此，他反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團體——中國民聯，也反對他的朋友與中國民聯發生關係。劉賓雁在訪問西方民主國家時，的確曾不只一次地宣稱，他仍然信仰共產主義。這似乎給這一種解釋做了註腳。

實際上，上述三種都是「純淨」形式的解釋，「純淨」形式在現實中是少見的。劉賓雁做出反駁中國民聯和倪育賢的決定，是殘酷的客觀環境與複雜的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劉賓雁的出現和存在，是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現象。現在已經有人在研究劉賓雁，將來

，會有更多的人研究劉賓雁。透過對劉賓雁的研究，有助於人們對中國社會的理解。無可否認，在對劉賓雁的研究中，他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在北京發表的「反擊」中國民聯和倪育賢的聲明，佔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這是一樁政治性的事件。

對劉賓雁先生，我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我從未和他交談過，但他的作品，凡能讀到的，我都仔細閱讀，從中獲得不少啟示。劉賓雁的一些朋友，也同時是我的朋友，從他們口中，我對劉賓雁先生有了進一步認識。然而，我也發覺，有些見過劉賓雁的人，由於對中國的特殊環境認識不足，對他有些誤解。為了對研究劉賓雁的工作負責，為了從劉賓雁「反駁」中國民聯和倪育賢的事件中，加深對中國社會本質及改造中國社會途徑的認識，我有必要把了解到的一些情況寫出來，從中也順便探討「劉賓雁為什麼反駁中國民聯」的答案。

官方的精心安排

據我們內部了解，劉賓雁三月一日發表聲明之前，國內有關當局曾將倪育賢和《中國之春》在紐約舉行記者會及座談會一事，通知劉賓雁，然談話內容不詳。但是，有過大陸生活經驗的人，大概可以想像得到當時的情景。劉賓雁三月一日草就了一份聲明，交給了人民日報社黨委，人民日報社黨委不敢擅作處理，上交至中共中央宣傳部。鑒於《中國之春》和倪育賢的記者會在海外造成了巨大影響，中宣部決定透過其下屬的中國新聞社，將劉的聲明經由中共的幾家海外喉舌同時發表。三月十日，香港《文匯報》和紐約的《中報》，同時在頭版刊出劉賓雁的聲明。《文匯報》放在頭版頭

條，還刊有劉賓雁的手跡，以示真切。隨後，上海出版、發行量巨大的《報刊文摘》進行了轉載，流傳全國。

有一個插曲值得一提。《文匯報》及《中報》刊載劉賓雁聲明的第二天，中國新聞社駐紐約辦事處打電話給左報《北美日報》，問其為什麼不刊登劉賓雁的聲明。《北美日報》中主持正義者婉言答道，《北美日報》起初並未報導倪育賢和《中國之春》的言論，現在突然刊出劉賓雁的反駁聲明，似乎令讀者不知所云。中宣部——中國新聞社這條線在發佈劉賓雁聲明中的精心安排，由此可見一斑。

談到中共對海外左報的控制及中共保守派對《中國之春》的不能容忍，《北美日報》的另一件怪事也有必要說上一說。有一個《北美日報》的打字小姐，利用業餘時間為《中國之春》打字。她到《中國之春》編輯部取稿時，常帶些《北美日報》，順便也拿幾本《中國之春》回去，給《北美日報》的同事傳閱。此事竟被報社內打小報告的人向中共告了密。中國新聞社駐紐約辦事處責成《北美日報》的老板（一個僑商），對此事嚴加調查。該老板竟以開除為威脅，叫那位小姐不要再給《中國之春》打字。他還勸阻報館負責人：「不要與《中國之春》來往，否則連我的飯碗都要丟了。」中共對海外左報控制到如此程度，的確叫人驚訝。

在自由世界的美國，一份左報的普通工作人員與《中國之春》有些業務關係，中共都要插手干預，報社老板都要承受巨大壓力，劉賓雁當時處境之險惡，便不難想像了。

劉賓雁真的反對

「中國之春」嗎？

劉賓雁在三月一日的聲明中說：「所謂『中國之春』這個組織，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我抵達紐約的前一天由王炳章宣佈成立。他曾要求與我會面，被我斷然拒絕，這是我一貫的政治態度。」

劉賓雁真的反對《中國之春》嗎？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先談談與此有關的某些事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正當《中國之春》剛發起並掀起海外輿論高潮時，劉賓雁訪問了紐約，並住在現任中華人權協會會長陳憲中先生家中。

陳憲中先生是我一九八二年十月從加拿大抵美後，最早聯絡的出版界人士之一，參與了《中國之春》雜誌創刊號的策劃。創刊號的排版工作就是陳憲中先生完成的。陳先生擁有一家規模相當大的印刷廠，由於他的慷慨贊助，我們沒花一分錢，即在他的廠裡印好了創刊號。陳憲中先生和鄭心元先生（紐約一家獨立的華文報紙「華語快報」的社長），還共同安排了《中國之春》的第一次記者會。陳、鄭二位都是反對台灣國民黨戒嚴法並與中共經常往來的著名獨立人士，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散佈什麼《中國之春》是國民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謠言。

劉賓雁在其聲明中說，我當時曾主動要求與其見面。實際情況是，想促成我和劉賓雁見面的動議來自陳憲中先生。陳問我：「劉賓雁就住在我家，你有沒有興趣和他談談？」我說：「這要看他是否方便。」陳先生徵求劉賓雁的意思時，劉思考了好半天說：「讓我考慮廿四小時，明天我再答覆你。」第二天，劉賓雁對陳講：「我還沒考慮好，再給我二天的時間。」二天後，劉賓雁婉言謝絕了陳先生關於我

和劉賓雁見面的安排。

儘管劉賓雁未能與我見面詳談，但他從陳憲中先生處，了解到很多《中國之春》的第一手情況。同時，他也了解到了中共對《中國之春》的態度。那時，關於《中國之春》的謠言滿天飛，這些謠言，特別是《中國之春》由國民黨炮製出來的謠言，也傳到他的耳朵裡，使他產生疑慮。在私下，他表示過這種疑慮，但對《中國之春》的宗旨未予置疑，他也從未發表過任何對《中國之春》的誹謗之語。

在公開場合，他當時對《中國之春》「冷嘲熱諷」。離開紐約後，他在舊金山市一家左派機構安排的演講中，被問及對《中國之春》的看法時，風趣地說：「據說王炳章的辦公室在洛克菲勒中心，那是什麼地方？我在美國連張辦公桌都沒有！（眾笑）還有，王炳章住在哪裡？他住在希爾頓酒店，我呢？隨便在人家湊合一下。（眾笑）」他明明知道，洛克菲勒中心只是《中國之春》郵局信箱的所在地，希爾頓酒店只是我們開記者會的地方。他用這種「誤傳」，巧妙地與《中國之春》「劃清」了界限，並用「據說」一語，表明了他無意直接誹謗《中國之春》。

劉賓雁當時訪美，正值《中國之春》的新聞高潮。劉賓雁和《中國之春》，同是中國政壇上兩個敏感的話題。劉賓雁迴避不了《中國之春》的問題。同樣是追求民主、法治的他，面臨着兩個選擇：

第一，公開與《中國之春》溝通和接觸。這樣，他可能斷送回國的機會。

第二，表面上與《中國之春》劃清界綫，回國後，在另外一個戰場上，為了民主、自由的相同目標，繼續其以前的工作。因為，文藝界爭取自由的鬭爭，是民主運動的重要一翼。

劉賓雁選擇了後者。我相信，劉賓雁當時拒絕與《中國之春》接觸，並非謠言的緣故，他是對謠言有分辨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之春》是以組織形式出現的。對中共瞭如指掌的他，知道共產黨對介入組織者，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中國民聯有很多陳憲中這樣的忠實朋友，他們同時也是劉賓雁的忠實朋友。他們把中國民聯的海外戰綫與劉賓雁的國內戰綫聯繫在一起。從他們那裡，我們不斷了解到劉賓雁的處境和心情。

某些出國的劉賓雁的朋友還告訴我們，他們在國內聽到的有關《中國之春》的消息，還是劉賓雁告訴他們的，介紹《中國之春》時，劉賓雁都持客觀的平實態度。他說過，中國的希望在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

兩個戰場 兩種方式

事情就是這樣的耐人尋味：一些人讀了劉賓雁的作品受到啟發，積極地投入了民主運動；另一方面，一些人則在民主運動中磨鍊了意志和膽識，立志回國，像劉賓雁一樣，在國內這個民主運動的主戰場上馳騁。

這是兩個戰場，兩個目標相同而運作方式不同、表面並不相干而下面協調配合的兩個戰場。

《中國之春》運動一開始，就以兩個戰場的理論為指導。中國民聯實際上分為兩部份，一部份公開，一部份不公開。不公開的部份，正在國內戰場上工作，或準備到國內戰場從事合法形式的運作。當然，有更多的獨立人士，像劉賓雁一樣，同樣在國內頑強地奮戰。團體的功用在於，它可以將兩個戰場協調起來。不

組織團體，不加入團體，不聯絡團體，雖然也在為民主化工作，但勢單力薄，形不成合力，也構成不了對專制制度的實質性威脅。這就是為什麼中外專制者可以容忍極端的個人而難於容忍溫和的團體的原因。

爭取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總體的社會工程，其運作方式是多元的。當各種形式的運作在表面上也滙為一體時，中國的民主化就已達到相當的程度了。

劉賓雁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嗎？

劉賓雁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海外訪問時，他在任何場合都堅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基於這一點，有人在看到三月一日劉賓雁「攻擊」《中國之春》的聲明時，則說什麼：「他畢竟是個共產黨，不管是第一種忠誠，還是第二種忠誠，他都是忠於共產黨。中國民聯何必為他呼籲呢？」

怎樣理解劉賓雁的共產黨員身份？

我對劉賓雁的思想實質（而不是他的身份）始終懷有濃厚的興趣。一些與劉賓雁有深交的朋友告訴我，劉對中國的現存制度已發生根本動搖，有時甚至說，他對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也已失去信心。但他對黨內某些較為開明的領導人，特別是胡耀邦、胡啟立等，又存有相當的好感和寄望。他的思想在痛苦的矛盾中掙扎。在劉賓雁的一篇篇報告文學中，他的這種思想表露無遺。

然而，劉賓雁還是願意留在共產黨內。

我們常看到這種人：他了解到中國人的很多毛病而感慨地說：「我真恨自己是個中國人。」這個「恨」，是「恨」鐵不成鋼的「恨」，包涵著一種深沉的愛。劉賓雁一方面對共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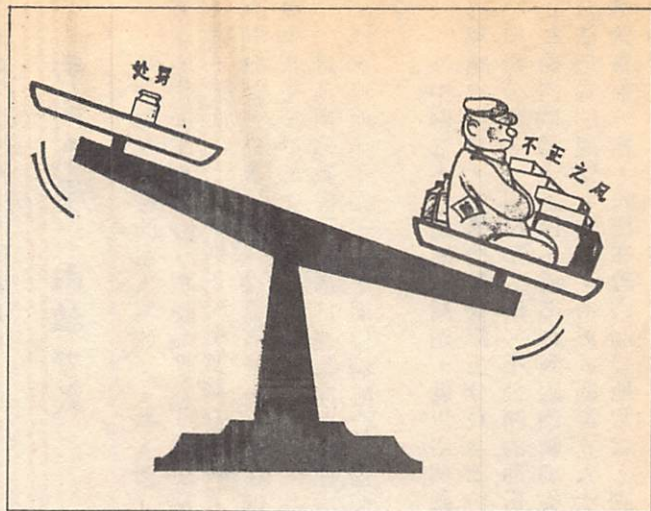
黨的貪官污吏、黨棍官僚深惡痛絕，但另一方面，他畢竟是一個深讀馬克思著作的人，是一個從青年時代就信仰馬克思主義而自願加入共產黨的人。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同情勞苦大眾的人，背叛他參加過的團體是容易的，而背叛他的信仰是困難的。劉賓雁可以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病入膏肓，可以認為中國的社會制度已經徹底腐敗，但他却難以從本質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我研習了他的一系列作品後發現，在他的下意識裡，中國的問題是中共並未搞懂馬克思主義。

因此，截至目前，我仍然認為：劉賓雁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他的真話。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真正信仰者，我是十分尊敬的。最令人鄙視的，是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人，是那些為了個人利益而強姦信仰的人。

共產黨專制制度的悲劇就在這裡：對於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哪怕信仰馬克思主義——是不能容忍的。陳獨秀是個例子，劉少奇是個例子，王希哲、王若水、劉賓雁都是例子。

坦承而言，我不信仰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但我對因各種信仰、包括與我不同的信仰而獲「罪」的人，都深表同情，不遺餘力地為他們呼籲。德國神學家馬丁·納墨勒曾說：「他們（指納粹）最先來捉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然後他們來捉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隨後他們來捉工會會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其後他們來捉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捉我的時候，再也沒有人說話了。」

劉賓雁願意留在共產黨內，以便為自己的理想找到歸宿；同時，也用共產黨員的身份，



向自己的理想提出證據：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共產黨員是廉潔的、公正的，儘管他在整個黨內可能并非多數。以上，是從理想層面而言。如果哪一天胡耀邦被黨內的保守派排擠出來而宣佈另組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劉賓雁大概會率先進入這個黨而成為一名模範的共產黨員。

從現實的層面講，做為一個寫實主義、干預實際政治的作家，劉賓雁願意保留共產黨員的身份。這樣，他既可以看到黨內文件，又可以更加有利的身份調查研究，蒐集素材。在講話份量上，顯然掛有黨員頭銜更具有影響力。

在考慮作品的實際效益時，劉賓雁個人的信仰和身份就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如果劉賓雁

的作品不署劉賓雁的名字便失掉了價值，那麼，他的作品是失敗的。實際的情況是，劉賓雁的署名引起了關注，但真正產生震撼力的，是他作品的內容。因此，我們不必深究他個人的身份和信仰。

我認為，劉賓雁的作品，對幫助人們認識中國的社會，對中國的長遠民主走向，是具有重要價值的。

劉賓雁為什麼能夠存在

劉賓雁不斷揭露中共的瘡疤，雖然承受了不少壓力，但他仍能合法寫作。劉賓雁為什麼能夠存在？這是一個很多人都在研究的謎。我的看法是，這是因為，社會幾方面都需要他。

中華民族仍是一個需要清官的民族，很多人還未學會獨立地爭取人權。以專門報導冤假錯案出名的劉賓雁，自然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冤情大使和「包青天」。

不僅僅是人民需要他，黨內改革派現在也需要他。容忍了一個「包青天」，便給人們多了一個「希望」，增加了執政者與人民之間的緩衝體。這對黨內改革派樹立開明形象、鞏固權力是有好處的。另一方面，黨內改革派也需要一個爆破能手，把一個個障礙改革的頑固堡壘炸掉。對最高當局來說，「青天」還有另外一個作用，那就是「青天」把某個單位的問題揭出後，「聖上」下旨解決，這是體現「聖上」英明的把戲之一。為了在最高當局面前過關，劉賓雁常在作品上掛上一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障眼招牌。

然而，黨內的保守勢力，如胡喬木、鄧力群之流，對劉賓雁是容不下的。如果改革派被迫下台，等待劉賓雁的，只能是監獄。

每當劉賓雁深刻觸及到制度的弊病和保守勢力的利益時，保守派們就群起而攻。此時，抵銷保守勢力的，是人民和海外輿論的支持。劉賓雁就這樣小心翼翼地走著鋼絲，一不小心，就會被保守派推進萬丈深淵。

就中國民主化進程而言，劉賓雁的文章起到了啟蒙人們認識專制制度本質的作用，這是民運人士喜歡他作品的原因。劉賓雁作品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以文學的形式揭出問題，但並不直言制度的根源，同時，他的文章也使最高當局有一種「聖上英明，臣屬昏昏」的錯覺，從而大多能夠通過檢查。可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想改變中國專制制度的人，一下就聽得出他的弦外之音。

啟蒙群眾是一門高超的學問。大道理太深，多數群眾聽不懂。這猶如上台階，一步只能跨一階或二階，如果一步讓他跨五、六階，反而達不到啟蒙的目的。劉賓雁的作品，正在引導群眾逐步攀登著認識的階梯。

總之，劉賓雁的出現和存在，帶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中國社會制度轉變過程中的需要。

盧卡奇的影子

我不時在劉賓雁身上看到盧卡奇的影子。盧卡奇是匈牙利共產黨人，本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蘇聯十月革命時期，他投身到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一九一八年，他卅二歲，加入匈牙利共產黨。盧卡奇是匈共內部開明的作家和思想家，很早就開始反省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問題。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發自由化革命運動，盧卡奇歡呼這場革命，並應邀出任納吉政府的文化部長。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之後，盧卡奇被捕坐牢，

後獲釋，致力於寫作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研究，直至一九七一年逝世。

在其生命的最後階段，盧卡奇得出結論：「一九一七年開始的全部實驗現在已經失敗了，要在今後以新的地點重新嘗試。」然而，他執着的信仰仍然使他相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都面臨危機，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盧卡奇生前就受到西方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一九六〇年，他的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被譯成法文出版，西方學術界和流亡海外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並呼籲改善他在國內的處境。

奇怪的是，對於自由社會的捧場和關切，盧卡奇並未「領情」。他反而在國內發表聲明，斥責西方翻譯和出版他的著作。

怎樣理解盧卡奇的這一行為？熟悉匈牙利當時高壓政治的人士認為，盧卡奇捧打西方，實際上是為他在國內清理出一塊戰場，以便能夠同匈共內的黨棍們繼續作戰。

劉賓雁「攻擊」《中國之春》，與當時盧卡奇的作法何其相似！「攻擊」《中國之春》的反彈力量，使劉賓雁在國內獲得了迴旋的餘地。為了不掉繼續為同一個目標而工作的機會，不得不向自己的友軍打上一槍，這是專制制度製造成的特有悲劇。

「攻擊」一下《中國之春》，我們可以理解和承受。值得注意的是，劉賓雁三月一日的聲明，也把倪育賢先生完全否定了。此聲明在國內發行量極大的上海「報刊文摘」上轉載後，給倪育賢先生的家屬造成了巨大壓力。看來，某一特定專制環境下，人民的苦難是一個常數，它不會減少和消失，而只能從一批人身上轉移到另外一批人身上。我們相信，如果劉賓

雁知道他的聲明給倪育賢的家屬帶來傷害的話，他一定會痛苦不已，一定會引以為憾。

中國民聯與劉賓雁

中國民聯將一如既往，繼續為劉賓雁及其他國內受壓的作家呼籲。一旦得知他們遭到新的壓制，我們就會揭露並大聲疾呼，以期引起國際間的注意。至於受壓者對我們的呼籲採取什麼反應，則視他們的處境自行決定，我們並不十分介意。

中國民聯的呼籲，可通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發生作用。即：中國民聯揭露「某人」受壓，由於中共對民聯採取「否定」態度，一般會「否認」民聯的揭露和報導（如肯定民聯之報導，則助長民聯之聲勢），於是，不得不適當解除壓力，安排「某人」見光。中共這樣做，也是出於形象上的考慮——它要給西方財主們塑造自己的理性形象，以便能夠借到多一點的外匯，渡過難關。

事實表明，外界輿論對國內受壓人物是有幫助的。沒有海外的聲援，劉賓雁不但不可能有後來的西德之行，而且說不定早進了秦城監獄了。

我們高興地看到，劉賓雁的封筆之辭，只是他的一時氣話。在中國民聯、倪育賢和海外正義之士的呼籲之後，劉賓雁又發表了數篇力作。他，仍在爭取自由的戰場上奔馳。

我們需要中國的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

一九八三年底的一天，我去專門研究共產黨國家問題的評論家倫敦太太家裡作客。她問

我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不出薩哈羅夫？不出索爾仁尼琴？」我至今未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的確，中國國內至今未出現像蘇聯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那樣已經出名而公然與專制當局決裂的、持不同政見的高級知識份子。巴金、劉賓雁屬於另一類型：他們與當局表面上合作，並聲稱擁護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未能出現自己的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是由於我們的文化傳統？還是由於中國專制的殘酷性甚於蘇俄？

我們不僅僅需要劉賓雁，我們也需要中國的薩哈羅夫、中國的索爾仁尼琴、中國的吉拉斯。當我們中華民族出現這類英雄時，則標誌着我們爭取人權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結束的話

劉賓雁曾不止一次地對他的好友說，他希望死後的碑文上能夠寫上：這裡埋着一個敢說真話的人。但是，他沒有要求碑文上寫道：這是一個從來不講違心話的人。

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活着的人有資格說，他在政治上從來不講假話。如果有這種人的話，也只能在單身牢籠和九泉之下可以找到。

我們的民族出現了危機，她可以容下億萬個口是心非的人，而容不下一個心口如一的人。

「危機」的妙意是「危險」和「機會」。當我們都受到「口是心非」的懲罰時，當我們都感到自己的「口是心非」是一種痛苦時，民族新生的機會也就到來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於紐約）

休城舉盛會

眾眼放全球

——記中國留美同學國際政治學會成立

本刊特約記者（中國大陸研究生）楊亭

六月的休斯頓，艷陽仲夏，充滿南國海濱的美麗情調。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國同學國際政治學會在此成立，並舉行了第一屆討論會。

美國三家基金會支持

二十一日上午，來自全美各地的一百多位學習國際關係和政治學的中國大陸同學、訪問學者和貴賓們，歡聚一堂。會議由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宦國蒼同學和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郝雨凡同學主持，他們首先介紹了諸位與會者和本次會議的準備情況，對各界的支持表示感謝。去年，由來自五個學校的十一位中國同學在華盛頓為籌建學會籌募經費。由於美國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大力支持，第一屆討論會終於順利

召開。

維護和平改善中美關係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總領事倪耀里先生首先發言。他說，他以領事館的名義祝賀會議的召開。各位中，大部分在來美前就從事國際關係的研究。這次大家向大會提交了論文。大家的觀點，必將會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造成影響。他說，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獨立的，和平的。他還提到胡耀邦在倫敦的講話要點：（一）中國的外交立場是支持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二）中國從不依賴於超級大國；（三）中國把第三世界的事務，作為自己的事務，並支持他們的正義行動。世界任何國家，無論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有什麼不同，都應該保持良好關係與合作。倪希望中美兩國人民互相理解，中美兩國學者加強交



大會分組討論會場一角。

流，促進和改善兩國關係。福特基金會的卡羅·馬蒂內西小姐代表捐助了本次會議的各個基金會發言。她認為，這些基金會三十多年一直關心着中國的發展。一九五八年他們就鼓勵美國了解中國。在七九年後，他們直接支持了中國的國際關係機構和人員培訓，提供獎學金給中國學生。她希望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國學者能夠提出高水準的論文，為國際關係的發展做出貢獻。

使館官員強調台灣問題

中國大使館的代表郭茂官也發了言。他說



當選為會長的官國荅同學在發言。

，中國從不任何超級大國結盟，或建立特殊關係。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美國人認為中國在玩聯美反蘇的牌，這是絕對不真實的。中國也不允許美國玩中國牌。他還提到，台灣問題仍然阻撓着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歷史上，美國支持、干涉台灣，至今仍助長着台灣政治上的分離。他希望美國政府對中國統一有所貢獻，作出明智的決定。他最後說他自己實際上是個學者，研究國際關係已有二十五年，不是外交家。他希望自己回國後仍能從事學術研究。

中國官方學者呼籲反對兩霸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研究員張靜宜先生發言說，可以把這次會議比作「馬可·波羅」，因為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把自己看成馬可·波羅。他講到超級大國的問題時說，當今的世界從來沒有過和平，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超級大國對世界的干撓。他認為，中國開始了四化建設後，在國際間首先碰到的是



美國福特基金會代表卡羅小姐在發言。

兩霸的阻力。去年來，兩霸的爭奪有所加劇。由於兩霸都意識到在歐洲搞競爭的危險性，因此他們把亞洲當作新的競爭場所。未來的太平洋，將是蘇美爭霸的熱點，這是新的競爭因素。它們爭相控制中間地帶和中間國家，因此這些國家應團結反霸。

外交政策最複雜時期

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國務院顧問肯尼斯·李伯薩爾教授發言說，在這個有高度研究性的團體面前講話，感到有一種壓力，因為其中很多人對美國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談到中國的外交政策問題時認為，中國現在的外交政策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外交政策都複雜。七八年到八一年間，日本和中國都把外交重心移向美國，一九八二年中國開始奉行獨立無傾向性的外交政策，他認為這與里根總統對台政策以及美國的世界政策有關。此外，這一時期美國加強了軍事。儘管如此，八二年以來，中國與美國的合作關係在經濟上有很大

速的發展。中國的外交和外贸開始轉向美國，並向美國尋求技術進口。中國近來加深參與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

解決台灣問題，應得適宜機會

李伯薩爾教授說，在外交上，中國仍然注目於與美、蘇的關係。首先談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相對說來不錯，但台灣問題一向是敏感而又重要的問題。中美雙方都有所認識。他個人認為，台灣問題應等到中美關係發展到適宜時機再討論，否則雙方都會討厭這個問題。八十年代中台灣問題大概無法解決。目前重要的是發展中美雙方都有興趣的問題，即經濟關係。還有蘇聯問題。他說，蘇聯在世界上無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捲入越南、阿富汗，甚至現在的泰國問題。中國要遏止蘇聯擴張勢力，但也不想妨礙與蘇聯的關係正常化。他認為，蘇聯應在國際事務中負正當的責任，而中國應在未來四、五年中，主動與蘇聯接觸和發展關係。來自國內的青年經濟改革家朱嘉明與何維凌兩位先生也出席了會議。

分組討論八項議題

當日下午，大會進行了分組討論。題目有「中蘇關係和大三角（中、美、蘇三邊關係）」、「中國與太亞地區的經濟政治關係」。有數位同學宣讀了他（她）們的論文，並進行講評和討論。接着大家開了一個輕鬆的鷄尾酒會。晚上，由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作東，在領事館舉行一個招待宴會。

二十二日，大會繼續進行分組討論，議題有「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國與它的周邊區域安全」以及

「中國與世界漫談」。

會上，還就學會理事會選舉問題進行了辯論，在大家的的要求下，表決了學會是否應進行自由競選的決議。結果大家一致贊同民主的自由選舉，否決了原來的選舉方案，充分顯示了留學生們的高度民主修養和風範。

民主選舉產生理事會

二十三日，繼續分組討論的議題有「比較政治與中國的外交政策」、「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按「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的于

大海和楊小凱介紹的經驗，大家在競選人發表競選演講後，選出五名理事，並由理事們推舉出會長，結果如下：

會長：宦國蒼（普林斯頓大學）
理事：馮勝平（普林斯頓大學）

蓋哲婭（女）（匹茲堡大學）

高崢（加州大學柏克立分校）

郝雨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宦國蒼（普林斯頓大學）

討論會上，由會員們宣讀了三十六篇論文，頗有見地和新意。（由於版面所限，本期只選登一篇——編者），將由學會整理發表。學

特輯

中國留美同學國際政治學會成立

論中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程鐵軍

編者按：「中國留美同學國際政治學會」第一屆討論會，收到若干篇留美研究生和訪問學者的論文和學術論文。本刊擬選擇性地予以發表。限於篇幅，本期只選登程鐵軍的論文（論中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程鐵軍、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現在紐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人們常說，外交是內政的伸延。所以對內政策的指導思想，往往也是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然而，因兩種政策的對象不同，內政針對自己熟識的國民，外交則針對比較陌生的國際社會，所以在設計和實行起來，就不能更加理

簡短的回顧

中共建國以來，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兩個時期。

1. 陣營外交階段，五十年代，特徵是一邊倒追隨蘇聯，東風壓倒西風，兩大陣營的對抗重於一切，主要事件有朝鮮戰爭、鎮壓匈牙利等。

會中，許多會員早在留美前已有豐富的國際關係方面的實際工作經驗，可謂人才濟濟。當選會長的宦國蒼同學，在學術上已有相當成就，已在美國權威刊物「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發表過論文，引起美國外交與學術界的注目。

學會的成立，將為中國留美學習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同學進行自由的學術交流、建立信心與共認，開辟廣泛的可能性。為中國的外交與國際問題研究，輸送新的活力，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做出獨到的貢獻。我們預祝會員們學術有成！

2. 意識形態外交階段，六十年代，特徵是意識形態高於一切，反帝必反修，主要事件有批判蘇修歐修，支持阿、羅、朝，鼓勵一切毛澤東思想派等。

3. 革命外交階段，七十年代，特徵是以世界革命為己任，打倒一切帝修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等，主要行動有支持越共和東南亞的游擊戰，非洲的民族解放戰爭等。

4. 探索反蘇統一戰綫階段，八十年代初，特徵是試圖聯合美日西歐，打擊蘇聯霸權，強調社會帝國主義是主要危險，主要行動有懲越戰爭、支持民柬和阿富汗游擊隊。

以上四個階段合起來，可以總稱為幼稚期。

5. 獨立自主外交階段，八十年代中期（目前），特徵是全方位外交，注重自身經濟建設，努力爭取世界和平，認為大戰可以避免，主要行動有對外開放，不與大國結盟，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等等。這一個與上述四個階段相比，可以稱為反省期，因為它是對以往指導思想的總結反省，開始逐漸變得聰明起來，但還

沒有進入真正的成熟期。以上回顧，可以列表如下：

中國對外政策發展變化表

時期	階段	年代	特徵	行動
幼稚期	1 陣營外交	50年代	親蘇一邊倒、東風壓倒西風	朝鮮戰爭、匈牙利事件
	2 意識形態外交	60年代	反帝必反修、中國最革命	中蘇論戰、毛澤東思想是頂峰
	3 革命外交	70年代	打倒帝修反，大戰不可免	援越、援菲，輸出革命
	4 反蘇統一戰綫外交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主要危險來自社會帝國主義	懲越戰爭，支援阿富汗、民柬
反省期	5 獨立自主外交	80年代中	大戰可免，要和平、不結盟	緩和對蘇關係，全方位外交
成熟期	6 和平民主外交	?	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平等互利、民主進步	爭和平、反霸權、搞建設、倡民主

從幼稚期到反省期

為什麼稱前四個階段為幼稚期呢？主要原因有三個：

1. 從時期上說，四個階段共約三十年。常言丈夫三十而立。一個人尚且要用三十年時間體味人生，摸索經驗，何況一個泱泱大國的執政黨。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共的工作重點是農村武裝鬥爭，祇有極少對外交往，僅限於蘇共

、第三國際及美國的戰後調停等。正規外交，建國以後才真正開始，自然有個適應、熟悉和學習的過程。

2. 從觀念上說，在五十年代的陣營外交階段，中國僅是蘇聯的追隨者，難以形成自己獨立的主導思想，進入六十年代以後，階級鬥爭又佔據了統治地位，一切出發點集中在如何破壞舊世界，而不能認真考慮如何建設新世界，所以外交政策表現出偏激、執傲和狂熱。

3. 從國際地位上說，中國被長期排斥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受到封鎖、包圍、孤立等種種不公正待遇，自然中國不會冷靜而客觀地對待外部世界，祇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了。

幼稚期的主要特點，亦可歸納為三方面：

1. 「外」重於「內」。外交戰略的出發點，受外在因素的支配多於內在因素，如對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運、反華包圍圈、霸權主義等等的考慮，使自己處於一種被動防守的地位，無法形成以自我需要為中心的戰略構想。

2. 「虛」重於「實」。主觀的革命理想主義色彩太濃，缺乏現實主義。動輒以世界革命為己任，置現實的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重政治、輕經濟，神聖的使命感壓倒億萬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對第三世界某些國家的窮慷慨，和對自己人民的嚴要求，恰成鮮明對照。

3. 「變」重於「穩」。政策策略上的反復多變，猶如幼童之易於翻臉。雖然世界本身風雲變幻，既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外交政策不能搞所謂「以不變應萬變」，但像中國這樣變化之快、之大，實在不多見。如此多變的外交政策，會降低一國的信譽，從而影響別人與之交往的誠意與信心。

自從提出獨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方針以後，中國外交開始進入一個反省期，其標誌是出現

了三個新提法。第一是世界大戰的危險雖然存在，但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這一對世界局勢的基本估計，比起以往關於戰爭和革命不可避免提法，不僅比較現實，而且比較策略和靈活，易被多數國家接受。第二是中國決不依附任何超級大國，也決不任何一方結盟。不依附大國，是明智之舉，但不同任何一方結盟，似乎有點絕對。從長期發展上看，難說永遠沒有同某國結盟，以應付共同危險的必要。譬如日本，從其對修改歷史教科書的態度就該引起國人的警覺。一旦第二次太平洋戰爭迫在眉睫，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和美國、甚至蘇聯結盟呢？對任何國家來說，在利益和安全需要時，都可以和它認為應該結盟的任何國家結盟，這乃是天經地義的事。盲目結盟，成為它的附庸固然不對，但聲明絕不結盟，同樣也不對。結不結盟，同誰結盟，是操之在我的戰略主動權問題；會不會淪為附庸，則是結盟的方法問題。結盟不見得一定成為附庸，不結盟也不見得一定能保持獨立自主，這要由很多因素（如實力、處境、手腕等）綜合平衡決定。第三是永遠和第三世界在一起。不清楚這一聲明的內在含意究竟是指經濟地位，還是指政治態度？前者是客觀的，後者是主觀的。經過若干年的努力，中國有可能在實力上成為第二世界中的一員，那時別人也不會再認為你仍然是第三世界國家了。如果說從政治立場上永遠和第三世界在一起，恐怕也有問題。因為第三世界國家與其它國家、尤其第二世界國家的矛盾，很多是在國際分工與貿易中產生的，完全按第三世界國家單方面的願望解決，可能妨礙正常的國際經濟合作，因而需要兼顧雙方的利益。另外，第三世界不是鐵板一塊，利害矛盾和流血衝突此起彼伏。超脫具體利害關係的抽象的第三世

界共同利益，即使有，也難以界定和把握。儘管有上述不足，我仍認為目前的獨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方針，比以往有很大進步。

上列表格的下部，有用虛綫附加的一欄，是我想像中的中國對外政策指導思想，進一步發展應該達到的成熟期。因為獨立自主，祇是中國外交政策的起碼要求，或最低要求，遠不是最高要求。而「和平」二字，似乎也還不能概括今後外交政策的基本內容，因此，特提出以下改進意見。

成熟期的標誌「理」、「利」和「節」

我把成熟期的標誌概括為理、利、節三個字。有理、有利、有節，本是中國古人辦外交，鬥智謀的經驗總結，在國共兩黨鬥爭中，毛澤東等人也曾有效地使用過。今天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它的基本原則仍然適用，祇是其含義需要加以發展和豐富而已。

第一理。什麼是理？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強權即公理」嗎？是的，以前這麼說常常是對的，現在再如是說就不太對了。國家民族間的利害衝突儘管仍很普遍，但共同利益也越來越多，這是世界經濟一體化潮流的必然要求，不是個別人或國家所能抗拒的。隨着人類共同利益的發展，世界輿論也有越來越多的共同點。靠強權霸道操縱輿論，強姦民意而能成功的例子已經越來越少了。大多數國家都會對不得人心的行為表示反對，甚至採取聯合抵制行動。越南侵柬，蘇聯侵阿，美國侵略多米尼加和格林納達，遭到世界同聲譴責和抵制，就是證明。還有一些行為，如南非種族壓迫、美日西歐的貿易保護主義、菲律賓和

說明公理所及，已不僅局限於武裝侵略，而且延及到反對公害、污染、販毒、恐怖、暴政、軍備競賽、種族壓迫、無視人權等各個領域。針對這一趨勢，中國外交決策機構有必要加強對世界輿論的收集和研究的，對是非，有理與無理之間劃清界限，以確定自己對外政策的依據。當今世界人心所向有兩大特點：一個是和平，現行外交政策已經包括；另一個是民主，不但國內要講民主，世界各國之間也要講民主。所有的黑暗勢力和醜惡行徑，歸根結底都和不民主相聯繫，因此有必要把爭取民主的內容加入到對外政策中去。

第三利。利者，利益也。辦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謀求和捍衛國家利益。同時利益和力量又是不可分的，當今世界，實力外交，仍然是個事實。當然國力強弱，主要取決於國民經濟的力量，但外交政策的爭取和維護，也是不可缺少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其中以經濟為主；按時間分，又有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需要結合具體情況，靈活運用。但利之所繫，該爭則爭，決不能再像毛澤東當年那樣，動不動以禮儀之邦的寬宏大量，拱手讓人。固然十億人的大國，一人一元，贈給小國頗為可觀，但用乘法的同時，別忘了除法，看起來總量增加不少，但用十億人一除，每人攤到的祇是一丁點而已，這就叫做大有大的難處。我並非主張人們利慾薰心，見「利」忘「義」，祇是希望當政者把國家和百姓的實際好處或者實惠作為一項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決不可一味樂善好施、窮慷慨。這是中國過去的一大毛病，近年來雖有好轉，但尚未形成對外政策的牢固基石，目前對外交往中仍有三種有害傾向，亟應戒除。一是懷國家之慨、謀個人私利；

紫陽總理出訪六國新露外交才華。



二是充大國風度，不算點滴小賬；三是圖眼前微利，不顧長遠大利。因此有必要明確，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遠方針，將來國力雄厚了，這一原則仍然有效。利益原則如何在外交政策上見諸文字，需要有一定技巧。我建議把平等互利這一條，由通常的外貿原則提升為一般對外政策的方針之一。那麼無償外援還搞不搞？當然要搞，國家猶如家庭，不管多窮，必要的認捐還得有，這既是人道，也是一種互助形式。但必須明確幾點：第一，援外總數要與國力相稱；第二，主要搞人道援助，不要搞革命輸出；第三，應該是平等互利的，當中國自己遭到意外天災人禍，應同樣理直氣壯地向世界求援，起碼不能像唐山地震時那樣拒絕外援；第四，援什麼、援多少，不應由少數人私下拍板，而應由人大相應機構民主表決，讓人民知道援助的錢去向如何。

第三節。就是節制，是策略運用。既要講時機，又要講分寸。因為「過」猶「不及」，

會產生副作用，甚至前功盡棄。策略的靈活，自然是一種藝術，但它畢竟是由基本戰略派生出來的。戰略思想端正了，策略運用就容易搞活；反之，在錯誤的戰略思想指導下，難以正確有效地運用策略。

綜上所述，我認為成熟期的外交戰略可定名為和平民主外交階段。具體指導思想上可以包括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平等互利、民主進步等幾項主要內容。

幾個亟待更新的觀念

爲了適應和促進從反省期到成熟期的過渡，有幾個已經落伍的觀念需要按照時代要求予以改革或更新。

第一、內政和外交的關係。一般都同意二者既相聯繫又相區別，但細究起來，二者之間又沒有絕對的、一成不變的分界綫。在民族交往日繁，政治經濟文化趨於互相融合的現時代，很難找出一件與外部世界無關的純粹內政。因爲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國際社會的一部份，任何一個民族都是人類總體的一部份。雖然理論上別國無權干涉一國的主權和內部事務，但這並不妨礙對其內部事務表示關切、批評、抗議和採取相應的抵制行動。對中國的某些內政，外界也頗有微詞，例如人口政策、民族政策、言論自由、政治犯等問題。面對外界的批評，不能總是以「不要干涉內政」爲由而置若罔聞。我看有必要自我檢討，加以改進。菲律賓獨裁總統馬科斯倒台前後種種醜行，受到全世界普遍嘲笑和譴責，唯有中蘇兩國不向人民做全面報導，反而助紂爲虐，替其欺騙選舉作宣傳，用心也許在於顯示不干涉它國內政，但效果却給外界以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印象。

與外國人平起平坐。



第三所謂「內外有別」，也是一個陳舊觀念。內外固然有別，但「別」在何處？理論上大概不是指中國人和外國人有地位高低、身份貴賤、待遇厚薄的區別，而是指有主客之分。實際上，內外有別論一直是中國人與外國人平等友好交往的一大屏障，使人與人被隔絕開來，不能互相信任和融洽。究其心理根源，我看是仇外、恐外、崇外與媚外等多種因素摻雜在一起。這一觀念，在對外日益開放的今天，顯得很不合潮流，執行起來，又產生種種弊端，實在到了拋棄的時候了。現代化的觀念應該是不卑不亢、平等待人、實事求是、表理如一，行爲準則，皆由法定，合法交往，概不干涉。第三所謂「洩露國家機密」，與上述「內外有別論」緊密相關。中國現在尚沒有一部保

密法，雖然某些機要部門有保守則，但極其原始而籠統，不能起法律作用。於是什麼叫「洩密」，常常可以成爲司法部門任意解釋和靈活掌握的東西，因此對洩密問題常捉摸不定，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按照近代法律原則，機密首先要有合法的定義，然後有範圍界定，最後有時間界定。洩密罪量刑，還要看動機、過程、爲害程度等等。中國定洩密罪常有兩個特點，一是某些小人物（特別是那些持不同政見者），向外國人透露，至於什麼高層人物透露給了小人物，一般並不追究，而後者才是真正的洩密；二是所謂機密，並非重要軍事、經濟、科技情報，而多屬於一般小道消息，甚至某些歷史事實，而消息和歷史是不應列爲國家機密的。總之，這個問題已經造成了很多麻煩，甚至新的冤假錯案，應儘快制定法律，妥善解決。

第四政府外交與人民外交。中國人傳統認爲，外交是政府和領導人的事，草民百姓無緣置喙，更遑論參與了。其實這種觀念已經過時了。在民主潮流洶湧的今天，外交也趨於民主化了。人民大眾，不但有權關心、監督和批評外交，而且越來越多的機會親身參加對外交往，每一個出國訪問、留學、經商、旅遊的人，每一個在國內接待外賓的人，甚至與外國客人萍水相逢的人，人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從事外交活動，越對外開放，人民外交越具有重要地位。人民外交不但能促進世界的穩定和進步，而且常常可以彌補政府外交的缺失和局限性。因此政府應順應潮流，爲人民外交創造條件，提供方便。就連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的監督，也要發揚民主，廣開言路，歡迎人民大眾的批評建議，神秘外交和寡頭外交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十年之內可能內亂？

鄧小平如何解決

待業「失業」青年問題

(國內)董旭生

語重心長的告誡

「搞得不好，我國未來十年內可能發生內亂。」這是鄧小平在聽到中國人口問題的匯報後，對他的高級助手提出的警告之語。現今年過八十，但仍然牢牢掌握着黨政軍大權的鄧小平說（大意）：「我們的人口問題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文革中，曾有一個大的生育高峯，再過四、五年，這批文革娃娃就要進入育齡期，進入社會。他們要工作、要房子。我們要儘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如果滿足不了這批文革娃娃的基本要求，搞得不好，我國未來十年內可能發生內亂。」

鄧小平的這番話，是頗有見地的。他已經意識到了未來中國問題的嚴重性。

人口問題的危機

留心一下中國人口的生育曲綫（見圖一），便會發現兩大特點。

其一，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實際上是人禍大於天災），生育率驟降。那時，農村婦女餓得大都閉了經，出現了特殊形式的避孕；

其二，文革中，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嬰兒出生率大增。那時，全國一片大亂，計劃生育工作沒人抓，很多知識份子和幹部閑着無事做，便在家中生娃娃，以此打發時光，也省了嫖娼錢。

可是，文革中的生育高峯，給未來危機埋下伏筆。

六七年至七〇年出生的嬰兒，今年是十六至十九歲，這一大批文革的「副產品」，面臨着或即將面臨着幾個嚴重問題：

- 一、現在面臨着升學（升高中、升大學）問題；
 - 二、升不上學後的就業問題（中國能有機會上大學的，只占百分之幾）；
 - 三、過幾年的結婚、生育以及要求住房的問題。
- 然而，中國的社會現狀能夠滿足他們的要求嗎？

致亂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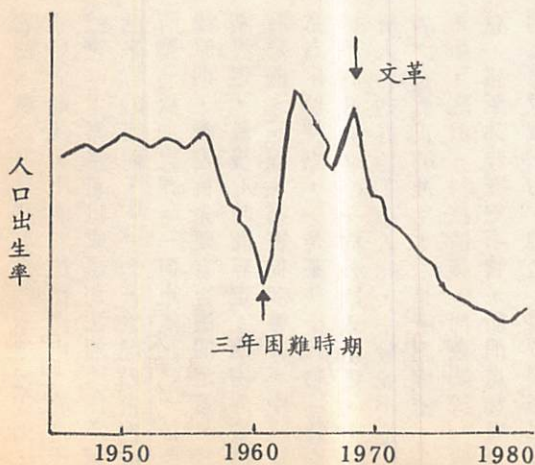
人，無事則生非。
毛澤東一句話「人多好辦事」，使中國多

出幾億人，但毛澤東又把經濟搞得一團糟，無法給青年們提供就業機會。可是，毛澤東又深懂得，不能讓這批小青年們閑着，因為，閑着就會鬧事。

於是，毛澤東想出了一條高明策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毛澤東的這一着，實際上是把「失業」的大包袱拋給了農民。不管我們怎麼批評毛澤東，老毛畢竟還是想出了這個主意，紓解了一時的矛盾。

鄧小平也深知「無事生非」的道理。目前社會上的犯罪份子，相當比例是那些待業（實則是失業）青年。但是，鄧小平不能再用毛澤東的舊方法去解決待業青年的問題了，他必須找出新路子。

怎麼辦？這個問題讓中共高層絞盡腦汁。據估計，中國城鎮目前現有的待業（失業）青年已達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為穩定這個社會的「幽靈」階層，趙紫陽從經濟觀點出發，主張發展個體企業和集體企業，以擴大就業範



圖一：大陸人口出生率示意圖



待業青年能幹鋪路的活算不錯了。

圍。然而由於黨內高層恢復派的阻撓，私有制在中國的發展受到了嚴格限制，未能如期解決知識青年的待業問題。

再過幾年，大批文革娃娃因考不上高中和大學而加入待業（失業）大軍，估計總數可達四千多萬人。這些人，如果處理不當，將成爲致亂因素。一九八五年北京下鄉知識青年三次在北京市委大樓示威，並獲得北京大批待業（失業）青年的同情和支持，已給當局敲響了警鐘。

鄧小平的總體策略

文革娃娃是個問題，但中國人口問題並不止於此。每年都有大批人考高中、考大學，而考上大學的，總是少數。這就意味着，每年都有大批新人加入待業（失業）大軍。據國家計委的一位權威人士講，國家每年招工的人數遠遠趕不上加入待業（失業）大軍的人數。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制訂了一個總體策略：

(一) 大幅度減少高中生人數。爲此，必須把住初中升高中這一關。即：只招收少量初中畢業生進入高中，使考入高中者，大都能夠順利進入大學學習；

(二) 今後部隊招收新兵，重點轉向城市知識青年。農村的初高中畢業生，考不上學校者都會自動回到莊稼田，而農村的承受力較城市爲大；

(三) 對於大批考不上高中的城鎮初中畢業生，給予兩條出路：一是上技校（中等技術學校），培養成技術工人；二是上軍隊的軍士學校和軍事技校，培養成軍士和技術兵。

下面，我們着重談一下這第三種辦法。

士官與技術兵

鄧小平命令，各大軍區、各省軍區都要辦軍士學校，各大軍區要辦中等軍事技術學校，有條件的軍官學校要辦士官班，以便大批培養軍隊士官和技術兵。這種學校與以往的步兵軍官學校或砲兵軍官學校不同，軍官學校培養出的是正式的指揮軍官，今後恢復軍銜時，畢業即授予少尉官銜，並領取相當於行政廿三級幹部的薪水。新興辦的士官學校，則只進行短期培訓（二年），並不培養學員成爲有指揮能力的軍官，而只成爲有一定行政管理知識的軍士

，如文書、司務等行政和後勤工作人員。鄧小平又命令，原部隊中由軍官擔任的七十六種職務，均將由軍士或小兵擔任。軍士和小兵只領津貼或較低的薪水，這樣則將大大減少部隊軍官太多而造成的龐大薪水支出。鄧小平的這項軍隊改革，是一個大手筆，值得研究中國大陸軍事的人關注（編者注：海外對此項改革並未注意）。

能解決根本問題嗎？

今後，中國軍隊將有幾項突出的轉變：
(一) 招兵重點從農村移向城市，小兵們將不再是文盲兵，而是文化兵；

(二) 大批原來由排級和副連級軍官擔任的職務，改由軍士擔任。軍士服役期限較長（十年至十二年），成爲所謂的「職業軍人」（並非「職業軍官」）。

因近年出現征兵困難，中央軍委內部甚至展開過這樣的討論：要不要改現在的義務兵制爲雇傭兵制（即像招收工人一樣給予薪水），但此種改革未被老軍人們採納。鄧小平最後也不同意改成雇傭兵制，因爲薪水支出過於龐大。

鄧小平關於建立軍士制度，以招收大批初中畢業生的決定，究竟能解決待業（失業）青年的問題嗎？國務院一位有關方面負責人私下認爲，要解決就業問題，只有進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給個體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發展大開綠燈。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爲，部隊的容量畢竟有限。而且，部隊中的軍官、軍士轉業時，地方上又如何安排他們的工作呢？

這大概也是最近國內呼籲改革所有制的原

談中共統戰不前之原因

(美國) 李 目

中共是統戰高手因毛澤東早就將統戰列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之一。最近這幾年是中共統戰呼聲最旺的時期，原因是中共不僅在國內運用統戰之謀略，且將統戰謀略的重點放到海外。

一九七九年夏，中共在北京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該會上確定了「新時期」的統戰任務：一是四化；二是統一；「新時期」的統戰口號，則使用「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新時期」的統戰對象，則以台灣、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為主，并且把這些人在大陸上的親屬和戚友們一概都列於其內。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中共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一個「中國統戰理論研究會」，在大陸各省，各市，各縣都積極健全并加強統戰部之陣容。

由於中共修正其統戰的策略，將統戰的重點移到海外，這兩、三年中海外上下人等對中共新時期的統戰的反應也特別投入。

海外所有的報章雜誌都會以不同角度或不同程度地涉入中共這股統戰的新風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的是無論左、中、右新聞媒體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着為中共宣傳、探討、評議之任務。有身價的有學術之士忙碌地為有關單位或人士的訪問或座談各述已見。有過份熱心者，乃往來於兩岸之間，為中共新時期的統戰貢獻他的良策和作為。當然更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兩開」（即海峽兩岸都吃得開）甚至「三開」（包括海外）人物，乘着這股風潮而大出風頭。說實話中共統戰的聲音和動作確實給海外帶來了一片熱鬧和新鮮之景。

然而：政治就是這樣陽陽、陰陰、反反覆覆。如今海外新聞媒體的新聞中心早就轉移，海外人士中該活躍或非活躍的都似乎在保持沉

默或冷觀著中共在海外「統戰不前」之跡象。造成此等反常的原因有如下諸方面：

一、經過這幾年的「投入」，不少海外人士逐漸明白中共制定新時期統戰的目的和企圖。前中共統戰部部長楊靜仁曾公開坦白的承認：「我們把愛國旗幟舉得愈高就愈能爭取和團結更多的人，包括那些贊成祖國統一，但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這位前部長的話點明了中共必需利用「愛國心」來誘導海外人士與中共共同完成「一國兩制，統一大業」。以此推測：中共和海外每一個自由人，唯一的關係可以說就是統戰。因而，人們不再盲目信從的主因是：如完成中共兩個大業後，中共和海外人士的關係和他們如今所統治下的大陸人民有何不同？

二、回顧這些年來，中共為「新時期」統戰付出極高代價：中共運用各種統戰花招，甚至不惜毀共產黨之根本而批判馬列主義，不惜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等等。總之，以他的「變」來達到統戰的目的。然而；海外人士并不幼稚，在中共「善變」的背後，人們看到的是中共高層官員的特權以及他們之間永無休止地權力鬭爭，而人們所渴求的民主、法治、人權等根本不知在何處何方？

魏京生、徐文立等這些人士仍然關在獄中，而中共朝野上下却都在以統戰之故，要求跟國民黨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嗎！但人們看到魏、徐的遭遇，能寄望這種統戰嗎？中共千方百計的把「中國民聯」說成國民黨的一個部份，但奇怪的是不但去統他，反而想盡方法去打擊他。這是怎樣的一種邏輯？

中共對待「中國民聯」一個中立的團體，一群手無寸鐵的人士都容納不了，怎能讓人相

信他們可以容忍國民黨？即使中共再善變，也不能在海外建立起信用！

三 因為台灣堅持不與中共和談，鄧小平等得不耐煩，乃積極對台發出警告：他說：「問題可以延緩，但不能永遠不談，當耐心耗盡，和平折衷方案又被拒絕時，捨武力解決，別無他途。」對於鄧小平的言論，國民黨人士認為這只是中共的軍事恫嚇，而海外人士則認為台灣問題的解決是急不來的，事實上也沒有迫不及待地步。中共當務之急是內政而非外交。如此擺出緊張聲勢的姿態，并不能吓唬海外人士，反而使他們對中共產生更多的畏懼。使兩岸關係難以向前。

四 海外人士承認目前大陸較往年開放，政治氣氛已不如從前恐怖，人民生活也有若干改善，但至今誰也不知道這種現象可以維持多久？「三信危機」常常困擾海外遊子之心。海外不少人士不敢自套「緊箍咒」，因為以往的記錄太讓人心驚肉跳。面對中共歷年來的作為，可以說這些年來被中共統過去的只是些不成氣候的人士。

五 由於中共老一輩統戰高手都已謝世，新一代統戰的魅力不夠，且又不能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如中共國家副主席李先念在江南案期間發表談話；強調統一後台灣可以保留特務體制。由於說話不看時刻，話一出口便引起人們公憤。如此拙劣的統戰手法，怎不使海外人士反感？又如：

中共爲了統戰十九年前不堪其迫害逃到美國的音樂家馬思聰，用一個多月的時間爲其平反大做文章，並透過有關人士一再宣稱對馬當年的「叛國投敵」給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然而，馬思聰並沒有接受中共之刻意殷勤，他鄭重表示拒絕中共的邀請，他還說

，不論用何種方法「回歸」都會讓別人誤解他對中共認同，違背了他當年亡命外逃投奔自由的初衷，也中了中共統戰之詭計。中共在統戰之中的「看不准」以致「走眼」何止馬思聰這

鄧小平親自出馬搞統戰。圖為鄧氏與榮氏家屬握手，鄧背後為榮毅仁。



一例？

六 自中共創始以來，一直運用「統戰」之法寶。在抗戰時，中共以「抗日救國」的口號，獲得多少純潔愛國之心，如今中共仍以落伍的民族主義統戰手法去統戰文化程度較高的海外人士，是中共近年統戰收效甚微的原因。以紐約地區來說，中共官員在紐約活動已達十四年之久，但紐約一百多個華人社團，被中共統去的只有十四個。這十多年中，中共官員沒有培養和挖掘到一個夠格的左派僑領，更不懂如何團結和利用這些愛國志士去壯大「統戰」之陣營。這些親中共的僑團除了爲中共出錢出力，爲中共官員迎來送往外，根本沒有更多的作為。而沒有靠左的僑團當然看在心裡，他們至今維持原狀，對中共統戰逐年減少信心。

誠然，中共統戰有他利害的一面，但并非神乎其技，所向無敵。如果中共要在海外繼續運用「統戰」這籌碼的話，那就急需要不斷地調正統戰之策略，拿出更新的花招。

近聞，爲供統戰之用，中共大肆宣傳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和海外親屬二百餘人在北京大團圓且由鄧小平親自出馬。有一張新聞照片顯示：鄧小平對著榮氏家屬眉開眼笑的握手，榮毅仁在鄧小平背後帶著指點一切的神情，似乎比鄧小平還要神氣。照片由中共在海外的喉舌之一「瞭望」雜誌以彩色全頁刊出。一位文人投書去報館，要中共：「矯枉切忌過正」。當然還有另外一位讀者投書說：我們不否認中共真心歡迎華僑歸國，但我相信有錢的華僑最受歡迎，至於流落在海外的一些窮知識份子，中共大概沒有興趣接納。

走筆到此想到中共現統戰部長闡明高是否能夠聽到和看到中共在海外統戰之不前的原因和人們的呼聲？

共產黨只是一花，馬列主義只是一家 ——由「雙百」方針所想到的

●本刊評論員●楊漫克

前一段由幾位有名望的中國大陸作家，在紀念「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之際，向中國共產黨要求立法保障創作自由，同時中共改革派領導人也因改革政策遭受政治體制阻撓無法深入，而公開提出政治改革的口號。我們為中國大陸開放以來的變化感到鼓舞，也為本刊的基本立場——政治與經濟現代化應齊頭並進——得到愈來愈多的中國人的認同而感到欣慰。

政治改革對中國、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是一次嚴峻的考驗。這個考驗，歸結到一個問題上，就是中共敢不敢實行真正的民主。敢，則國家興盛，共產黨亦可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不敢，則國家衰退，共產黨亦面臨危機的前途。這是一個十分明朗的現實。

回顧「雙百」方針問世後所遭遇的千災百難，人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只有方針政策，沒有民主法治；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過是天府夜譚。在一個黨大于法的人治社會中，一切取決於一個黨、甚至一個人的利益。誰握有權力，誰就代表真理，可以任意制定改變和解釋政策。在「四人幫」橫行的時代，「兩報一刊」照樣年年發表評論，紀念「雙百」方針×周年。而事實上，「萬馬齊喑」「血雨腥風」，才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

要用法律取代方針政策，要用法治來取

代人治，要用民主取代專制，歸根結蒂，還要回到一個問題上來，共產黨敢不敢實行真正的民主，敢不敢進各種黨派自由選舉，自由競爭。這是檢驗共產黨把政治改革和民主作為政治目標，還是作為渡過困局的臨時手段的試金石。

衆所周知，中共至今仍抱定背離人心的「四個堅持」，鼓吹政治改革要「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即要共產黨一家專制，又何來百家爭鳴？即要堅持馬列主義一花獨放，又何來百花齊放？

我們反對「四個堅持」，並不是簡單化地要推翻共產黨，剷除馬列主義。相反，我們認為共產黨只是中國社會的一個政黨，只能代表一部分擁護其政綱的人不能搞一黨專制；馬列主義也只是一家之言，不應做為唯一合法的意識形態強加于人民的頭上，而置一黨的利益于國家人民的利益之上，坐失實行民主的良機，做出損害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的事情來。

對於文革後鄧小平體制在改革、開放政策下，能做出的努力和成就，以及共產黨近年來的一些良性演變，本刊一慣全力支持 and 給予很高的肯定（儘管共產黨至今仍對我們採取完全相反的態度），並且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出主意、想辦法，進行了有力的配合。我們認為，經過文革和開放後外界現代觀念的

引進，中國人民的民主覺悟已經日漸成熟，本次政治改革輿論聲勢的廣泛性，以及近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結局，都充分證明了一點。

在中共黨內有一種言論，把政治改革解釋為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反對官僚主義、消除機構擁腫，企圖使政治改革的任務和目標局限化。不錯，馬克思主義可以發展，官僚主義、機構擁腫極待改觀，但如果不從民主、法治和多元政治着手，不敢觸及共產黨權力膨脹，以黨代國，黨大於法的病根，只是本末倒置，停滯于表面現象和皮毛問題，那樣只能事倍功半，無所作為。君不見，中共近年來一次次的整頓黨風運動，其結果都是愈整愈糟，不了了之嗎？中共對此，應當是最清楚的。希望中共內有志于政治改革的人士，對此能夠大澈大悟，認清現實。

無疑，政治改革同經濟改革一樣，將會遭到共產黨內、以至社會上保守勢力，僵化傳統觀念的更大反對和阻撓，我們對此有着清楚的認識。任何一場社會變革，不外乎採取三種方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上下結合，戊戌變法是自上而下的；辛亥革命、四五運動，是自下而上的。這兩種方式都會引起社會的激烈動蕩，從而成功的可能性較小。而上下結合的方式是最優良的方式，但需要適當的時機和充分的條件。如果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能夠拿出勇氣和魄力，採取上下結合的方式，依靠人民群眾的無比巨大力量，則對克服政治改革的阻力將會提供最可靠的保障。相信鄧小平先生對七九年民主運動的力量幫助他推倒「凡是」派，仍記憶猶新。其實，鍛煉廣大群眾的民主修養，本應是這次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務，更何況政治改革根本就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切身大事！

第五代

「中國青年報」記者 張健偉
「中國青年報」通訊員 左志

總部：

送上「中國青年報」一九八六年五月廿四日的長篇報導「第五代」。
「中國之春」五月一日出版的卅六期上，及時地編輯了「禁讀博士後與留學生」專題，道出了廣大留學生人員的心聲，在留學生中產生了巨大反響。我們很快把這期「中國之春」送進國內……。

五月廿四日，「中國青年報」刊出了這篇報導「第五代」。

留意一下五月一日出版的卅六期「中國之春」的內容，再細讀五月廿四日「中國青年報」的報導，很容易發現，兩者對留學生政策的看法，有很多不謀而合之處。可以說，在此問題上，海外公開的民主運動和國內巧妙運作的青年民主派，是有深深的默契的。

不要忘記，五月中下旬，國務院正召開留學生工作會議，兩派展開了柔中有鋼的辯論。「中國之春」及「中國青年報」及時地反映了民意。

「中國之春」直言說：「不要限制讀博士後」；「中國青年報」委婉地講：博士後訓練「可使博士生增強獨立工作能力……使留學生獲得知識與能力雙重效應。」

「中國之春」一向主張留學生家屬伴讀；「中國青年報」則疾呼：「這是一個深得人心的政策，呼籲不要關閉。」

「中國之春」認為，一部分人學成不歸，不要大驚小怪，他們將來可能在向國內轉移高級科技方面，起到意想不到的積極作用。「中國之春」並舉出台灣留學生留美不歸的例子；「中國青年報」亦以大批台灣留學生留在美國為例，指出其結果是：台灣有了世界先進的電子工業。」

然而，民意反映了，結果並不妙。

以李鵬為首的留蘇派及那些頑固不化的守舊派，憑借他們把持的教育大權，無視民衆的呼聲，再次大幅度收緊了留學政策：

- (一)伴讀基本取銷了；
- (二)大學生出國取銷了；

(三)不再公派碩士研究生；

四讀博士後問題，雖然沒敢說完全禁止，但加了一條嚴格限制：

需經原派出單位（部委一級）的批准……。

大家說：「權力在李鵬一伙手中，我們自己掌握不了自己命運！」

大家說：「留學政策左搖右擺，這樣朝令夕改，怎能使大家建立起信心！」

人啊，人！我們都是具有天賦人權的人！我們都有出國的權力，都有讀博士後的權力，都有和妻子、丈夫生活在一起的權力，都有選擇自己職業的權力！我們的這些天賦人權，憑什麼被剝奪掉？憑什麼還要那些官棍去「批准」？

順便替我國駐外使領館教育組的同志們說句公道話，他們多數是同情廣大留學生的，他們已給留學生們向國內說了不少好話。另外，雖然，「中國青年報」是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報，但其中不乏有見地的青年民主派，甚至在李鵬把持的國務院教育委員會，也有不少有良知、有遠見的主張繼續放寬留學政策的干部。但是，他們沒權啊！他們只能發發牢騷，膾炙人口的呼籲呼籲。印把子還在李鵬等人手裡壟斷。我們的出路只有一個：留學生們團結起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還有一個小地方值得一提：「中國青年報」在刊登「第五代」這篇報導時，刊頭上方用了趙紫陽在紐約會見留學生代表的大幅照片，而沒有用主管教育的李鵬的照片，這點，頗令人玩味。

我們通過總部向「中國之春」編輯部建議：轉載「第五代」這篇報導。我們也希望，我們這封信也能發表。

我們要在促成海內外輿論的配合上多下些功夫。

中國民聯北京某支部駐美代表於保廉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編者按：本刊決定轉載「第五代」這篇報導，讀者們不妨對照一下「中國之春」第卅六期。我們歡迎民聯成員和留學生們繼續向本刊提供國內報刊有見地的文章。

一九七八年，國門打開。於是，一批批青年知識分子漂洋過海，聚成一股股有人貶之，有人褒之留學熱潮。悠悠七載已逝，種樹原為結果，但相當一部分留學生逾期未歸，輿論紛紛揚揚，莫衷一是……

輿論並非沒有來由。

國內一家權威新聞單位發出信息：我國留學生學成後將有百分之八十滯留不歸。

某著名華裔學者提出警告：中國在美留學生，倘能回來百分之十，不必大驚小怪，倘能回來百分之二十，就可舉杯慶賀了！

一些留學生派出單位發現：派出者拖期一年未歸，驚呼「花了錢，賠了本」！

國外有關資料表明：亞太地區一些國家的留學生回國率只有百分之十幾。這已成爲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普遍問題。

國內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我國再派留學生，將像蘇聯當年歸返猶太移民一樣，索取高額教育培養費。

西方記者的新聞鼻嗅出了異味：估計中國留學生政策可能開關……

中國門，開，還是關？一聞千鈞，關係重大！

歷史的聯想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十時，一架波音七四七凌空而起，國務院中國留學生工作組一行十二人乘機飛往美國。半小時後，左側發動機發生事故，飛機迫降東京機場。

工作組中，最年輕的成員是天津外經貿委研究室副主任杜厦。此去大洋彼岸，唯有他身兼雙任：考察、招聘。

天津對外開放，深感人才匱乏。胡啓立同

志在津視察時建議：可到國外去招聘我國自費留學生。這是一個巨大的人才寶庫！

東瀛，這個對杜厦來說不期而至、曾接納過我國第一代留學生的國度，引發了他對歷代中國留學生的無數聯想……

第一代留學生，毫無疑問，是「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國人。嚴復乘梓西去學習英國海軍；秋瑾東渡日本求索救國之途；孫中山棲身美國，兩度檀香山求學。殊途同歸，第一代留學生先後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嚴復一部「天演論」喚醒了千千萬萬昏睡中的中國知識份子；秋瑾操刀反清，成就一代女俠；孫中山團結起一大批留學生，成爲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這一代留學生，以「睜開眼睛看世界」始，以推翻帝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終，歷史功績，彪炳千秋。

第二代留學生，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震撼中動身。以周恩來、蔡和森、朱德、陳毅、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留學生奔赴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故鄉；以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爲代表的投向「赤光一線」的赤都；以魯迅、郭沫若爲代表的青年赴日留學……這一代留學生的優秀份子，大都成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國革命的領導者，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国的創立與建設，譜寫了與日月同輝的燦爛篇章。

第三代留學生，以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和華羅庚、茅以升、李四光等爲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他們看到：一個愚昧、落後的祖國無力在世界爭強。新中国誕生後，這些在國外已負盛名、生活優裕的科學家，衝破重重阻攔，義無反顧回到祖國，爲中華科技、教育、文化的騰飛盡了最大的力量，成爲領導新中国科技、教育事業的中堅。

第四代留學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歌聲中奔向蘇聯、東歐，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本領。原子彈、氫彈爆炸，火箭、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水，無不凝聚著他們的汗水；我國獨立的鋼鐵、石油、機械、紡織、汽車和化工工業的發展，無不以他們爲骨幹。中國的現代經濟，與第四代留學生的卓著貢獻相連。

……歷史的回顧使人感奮，現實的輿論令人擔憂。杜厦一時心潮難平。

舊金山機場到了。工作組就要面對第五代留學生了。

西海岸濕潤而夾帶著寒意的海風撲面而來，杜厦步下舷梯，大腦中是一個未知的符號：「第五代——？」

具有中國特色的排列組合

爲了解答這偌大的「？」，工作組十二位同志的足跡走過美國二十二個州，六十六個城市，九十八所大學，召開大會四十九次，同七千多留學生見了面。召開座談會六十六次，參加人數七百五十二人，與四百四十八名已經畢業或即將畢業的研究生作了個別談話。杜厦尤爲活躍，精神抖擻地穿梭於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底特律、華盛頓和紐約間，深入各大學講壇、圖書館、實驗室、宿舍——他常常就睡在留學生宿舍的地板上，從深夜談到天明，結識了衆多的炎黃學子，獲得了五彩紛呈的印象，又加以嚴格的檢索、歸納……

印象之一：耿耿報國情

國內某些輿論認爲：公費生身受國祿，可望歸國；自費生有相當的自由度，不會回來啦



孫中山棲身美國



秋瑾東渡日本

！甚至有人憤怒地指責這種現象為「投敵叛國」。

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哈佛大學，杜厦見到一位才貌出眾的中國女性——陳榮君。

她的父親原是哈佛大學醫學博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毅然回到祖國。「文革」中，他被關進了「牛棚」。為此，直到一九七九年，榮君還不能跨進國內的高等學府，不得已飛越太平洋，自費到美國求學。

臨行前，臥於病榻之上的父親把她招到床前說：「學成之後，一定要回來，為祖國服務……」

三十歲的榮君一直未婚。她在美國攻讀管理秘書學位——半工半讀。

在杜厦面前，她流著淚說：

「我是一定要回國的。我一定回去，一定！」

可能，像陳榮君這樣學業完成後決定立即回國的自費生目前尚少，申請到「綠卡」（永遠居留權）的也許會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留居美國。

但一位著名華裔學者說：在美國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師是華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師是華人。他們大都是留居美國的台灣留學生。這種現象帶來的是：台灣有了世界先進的電子工業。

現代科學已經沒有國界！

譚國興，原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後分別在倫敦理學院、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獲得學位，專攻酒店經營管理，現在美國一公司任職，待遇優厚。當他從美國當地報紙上看到祖國派人赴美招才的消息後，立即給杜厦寫了一封信。

「祖國對外開放，建了大批酒店但缺高級管理人才，不得不讓洋人來管理，想到此，我毛遂自薦。我有七年的管理經驗，我希望回國擔任合資酒店的中方總經理，或幫助祖國培養酒店管理人才！」

方紹鴻，斯坦福大學經濟管理博士生，留學生聯誼會主席，並被該校聘為副教授。為了祖國經濟的振興，他與許多自費留學生一道，決定為祖國在美國開設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並為此自費往返祖國多次。他們的計劃受到國務院和上海市等領導同志的普遍重視。

田克，舊金山州立大學半工半讀畢業生，現已在美國一家公司擔任經理。聽杜厦講到天津招聘人才的情況後，他說：「我將盡快回國

，全力以赴，赤膊上陣——一分錢報酬不要！」

雍恒，自費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經營管理學位，已在美國一公司擔任部門經理。聽說杜厦來美，他先後七次電話聯繫；見面之前，他在杜厦下榻的旅店等候了三個多小時。「天津市經濟開發區需要你這樣的專業人才，如果你同意，可在今年回去試工三個月，具體報酬……」

雍恒擺擺手，打斷杜厦的話：

「我決定今年夏天就到天津，報酬我分文不取。在我熟悉貴公司的情況後，我願擔任貴公司的駐美代表，為推進天津的對外貿易奮鬥一番！」

在杜厦接觸的三十位已經畢業或即將畢業的自費生中，已有十位決定來津試工。有的已經成行。

殷殷慈母願，耿耿報國情。

自費生同樣是炎黃子孫。

在祖國建設和對外開放中，他們將發揮特殊作用。

印象之二：為伊消得人憔悴

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面孔，架一副眼鏡——杜厦的摯友、在密西根大學進修的朱嘉明與杜厦不期而遇。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嘉明親自做飯招待。席間，杜厦得知這是朱嘉明到美國後第一次買菜做飯。為了節省時間用於學習，他幾乎每天都是啃麵包。因他是訪問學者，該校每月為他提供八百美元，他幾乎全用在自費進修英語和買書上。杜厦留心到，他出國時帶的那雙皮涼鞋，仍然穿在腳上；一問，果然並未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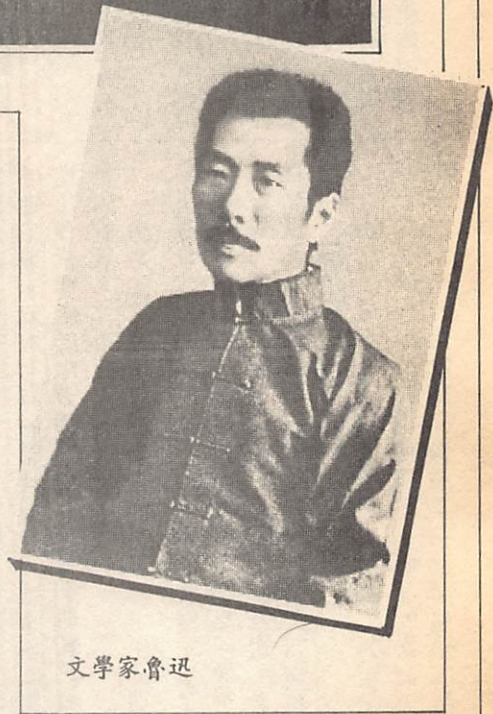


政治家周恩來、鄧小平

新鞋。

「幹嘛這麼苦自己呀？」

「中國留學生差不多都這樣。」朱嘉明淡然說。「公費生國家一般每月提供數百美元的生活費。同國內比，錢是不少。但在美國求學，住宿費每月至少得二百美元；倘想精通英文



文學家魯迅

，聘請個美國教師，一小時課程就得二十幾美元；與我國不同，美國大學實行淘汰制，學校裏沒有鐵飯碗。一個學期之中，教師要求學生閱讀的參考書往往多達上百種，而一本書至少得十幾美元。」

「爲了多學一點，再多學一點，只好艱苦些。」

公費留學生們知道：這是目前國家財力所能盡的最大的努力了。

自費留學生就更加艱苦，他們完全靠打工掙錢維持學業，白天拼命學習，晚間拼命工作。他們沒有節假日。

「國內有些人認爲我們在這裏吃喝玩樂，」一位留學生說，「其實，這種艱苦、緊張的環境，在國內呆慣了的人是無法體會的。」

印象之三：雙重人才效應

在馬里蘭大學，杜厦見到江姐的兒子彭雲。彭雲與妻子易小治熱情招待了杜厦，同他談了一個上午。

「談談祖國的建設吧！」
「談談祖國的改革吧！」

「談吧，談吧，別停下來，接著談呀……」

一直不停地談的杜厦偶而也閃過一個念頭：「應該說說國內對他們的傳聞，應該問問他們，你們不回祖國了嗎？」但他一直沒有問。

易小治原是北京某刊物的編輯，她一方面全力支持彭雲的學業，一方面已在成人補習學校畢業，又開始攻讀馬里蘭大學的正式課程，學的是她在國內的本行：信息傳播學。

他們將自己心愛的孩子留在了國內。

易小治低聲說：「我想孩子。可是這學習的機會，太難得……」

彭雲說，學業完成後，立即回國。

國內一種輿論認爲：博士後（取得博士學位後再進行十八個月科研的制度）政策使留學生拖期不歸。

彭雲便正在做博士後。

國內還有一種輿論：留學生還要帶老婆，說是什麼「伴讀」，這還能回來？！

易小治便是「伴讀」者。

對做博士後問題——

美國移民法規定：外國留學生畢業後可以繼續留在美國做十八個月的博士後研究工作，不必經過派出國同意。這種研究可使博士生增強獨立工作能力，拓寬知識，以便回國後適應國際高度競爭的局面。這使留學生獲得知識與能力雙重效應。

工作組同近五百名留學生進行了交談。明確表示取得學位後立即回國的八十八人；已經在做博士後的六十六人；打算做博士後的一百九十五人；未拿定主意的八十七人；由於與外籍人或台灣人結婚或已取得綠卡要留居國外的



李鵬也是其中之一。

十一人，只佔百分之二點五。
到一九八五年底，舊金山領區有二十三名
研究生取得博士學位，其中九人沒做博士後，
已回國工作；十四人做了博士後，其中七人已
回國，另七人尚未到期。

對「伴讀制」問題——
美國許多輿論的看法是：理解。夫婦遙遙
萬里分居若干年才不可理解。有的報紙甚至根
據國內傳出的某些小道消息攻擊說：「不讓配
偶出國，是扣為人質」。

據統計，今年畢業或即將畢業的四百四十
八名留學生中，有二百二十一人，配偶在美國
探親或留學。

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配偶在愛人身邊，不
僅可以互相關照，而且「伴讀者」同樣參加學
習，實際上等於國家花同樣一筆錢却使兩個人
進修——雙重人才效應，何弊之有！
我國駐美使領館人員及國際輿論都認為這
是一個深得人心的政策，呼籲不要關閉。

印象之四：群星燦爛

七年來，我國留學生的成就如何呢？

劉西拉，美國普度大學研究生，一九八五
年被美國土木工程協會授予雷曼瑞斯科研究獎，
這是專門為在土木工程科研中有突出貢獻者設
立的。他已在去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工作。

胡傳文，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僅用三年
零三個月即獲得核動力工程學博士學位，創該
系歷史紀錄，在畢業前一年就受聘到美國西屋
電氣公司工作。他已決定，放棄在美國待遇優
厚的工作，回國參加大型核電站的建設。

田匡宇，美國耶魯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年
方二十出頭。他通過實驗發現了一個新的負離
子，受到李政道教授的稱讚。

張欣，自費留學生，在勃克萊分校獲經濟
學碩士，又在密西根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並被世界銀行聘為助理研究員。他已下定決心
到天津市工作，利用在世界銀行兩年的工作經
驗及學識為祖國的對外開放服務。

陸具祁，斯坦福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的研
究生，專門從事「重子」研究，已發表論文二
十三篇，其中有三篇作出重要貢獻。他在這一
領域的研究成果，已達到世界最先進的水平。
他準備完成博士學位的學業後即回他的母校南
京大學工作。

中國留學生，群星燦爛。
李政道教授作出如下判斷：

二十世紀，世界科技是猶太人的時代。當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炎黃子孫將佔據世
界科技的領導地位，世界科技將進入中國人的
時代。

印象之五：

中美人民理解的橋樑

一九七八年，當開放後的第一批留學生迢
迢萬里來到大洋彼岸時，映入眼簾的是個複雜
、陌生的大千世界；這個大千世界也不了解他
們。隔絕了三十年，其間又充滿了無數歪曲和
偏見，「中國人」這三個字，使不少美國人惶
恐。許多留學生，尤其是自費生，想租寓一所
房間，比登天還難。一些房地產商認為：黃皮
膚的陌生人來到哪裏，謀殺、暴亂、搶劫就跟
到哪裏，房地產便要跌價！

但中國留學生用他們的行動，逐漸喚醒了
美國人民美好的回憶，播下了友誼的種子。如
今的美國，每到感恩節或聖誕節，中國留學生
成爲最受歡迎的客人；在中國的春節，美國人
也送上他們友誼的禮物。

一位博士生曾赴加州講學。一位馬戲團演
員獲悉此事，專程把他接去看戲。演出開始前
，這位美國人向全體觀眾致辭：今天是本團最
光榮的日子，我請來了中國人！於是，全體觀
衆起立，熱烈鼓掌。

簡·克里格曾留學中國。學業結束後，她
匆匆回國，途中才記起一只貴重的皮箱丟在宿
舍中。她焦急、後悔，誰知第二天，皮箱竟奇
跡般地送回她的住處。

現在，中國留學生們的到來使她心中友誼
的種子破土而出。

她趕到中美交流處，把那些陌生的英文拼
寫姓名一一抄上。每年感恩節，她把洛杉磯大
學裏所有的中國學生、學者請到家中作客。金
黃的玉米、噴香的火雞，陶醉著友誼的使者。
六年來，簡把愈來愈多的中國留學生介紹
給美國家庭。

她四處托人，邀請美國人做義務英語教師
，並成立了輔導班。一九七九年以來，輔導了
數百中國人。

她籌集捐款、組織旅遊，讓中國留學生從多方面了解美國文化，自一九八〇年以來，每年三次，無一例外。

——一天晚上，工作組成員杜厦住在一位美國老太太的故居中。

這是一座乳白色屋頂的二層小樓，位於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外的林蔭大道，現在是洛杉磯地區中國留學生活動中心。

一位來自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曾租寓在這位孤老太太家中。不久，老太太病危住院，想兒子，兒子沒來。這位留學生把她送進醫院，並在緊張的學習期間照料、陪伴她。彌留之際，老太太立下遺囑：

這棟房子，將來永遠用來接待中國留學生。

——一個個炎黃學子的身影在杜厦的眼前浮現、排列，組成一個個鮮明的判斷：

心向祖國的愛國之心，
承繼先輩的報國之情，
奮發有為的競技狀態，
感人肺腑的美好心靈。

這一切，構成中國第五代留學生的群體形象。

儘管留學生中也有極個別花天酒地之徒，但絕無礙於這一代的整體形象。

他翻開筆記本，寫上：
「第五代——！」

人的現代化

還有一個偌大的「？」，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提出的「？」：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座大熔爐，「第五代」即使全部學成回國，是不是已經成爲被「美」化的人，成爲「資本

主義化」的人？除了學識，他們會不會被西方價值觀念重新鍛造？這將意味著什麼？他們到底接受了什麼觀念？這些觀念被視爲「資產階級觀念」棄之如敝屣嗎？

杜厦尋求答案……

觀念之一：「人人爭當經濟人」

一個十四歲的美國中學生被評爲優秀企業家，因爲他開辦了一家商店，經營有術，大賺其錢。輿論界大張旗鼓地進行報導。

這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使杜厦驚訝的倒是中國留學生們的變化：

——許多公費生被派出時大都是數理化一類學科，但到了美國，幾乎全都兼學起應用學科，有的乾脆「改行」：專攻商業或企業管理。

——自費生由於可以自由選擇專業，所學大部分爲貿易、金融、工商管理、市場經濟、法律、秘書、工業工程和計算機等，都是適應經濟部門的學科。

——中國留學生在美成立的第一個學會是「經濟學會」。

這是爲什麼？國內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可不在經濟部門，而是在研究部門、教育部門、政府部門，總之——事業單位。

「同中國相比，不，甚至在世界範圍內，美國徹底改變了這種價值觀。」一位留學生說，「在現代史上，有福特、洛克菲勒做榜樣，另外像哈默、杜邦，還有發明漢堡包的麥克唐納，家喻戶曉，比總統更有名，當然也更有錢。這種追求觀使美國成爲一個舉國上下、老老少少都追逐利潤、爭當經濟人的國家，高等學府中第一流的學生幾乎全部投入企業；或者是企業家，同時又是科學家。」正是這一點，使

美國成爲世界經濟大國。

——中國留學生也要成爲經濟人嗎？

「是的。」在多次座談會上，留學生們都表達了這樣的看法，「我們學成回國後，面臨的是美國、日本這樣的競爭對手。倘若我們國家能像搞政治運動那樣，投入美國搞經濟那樣的熱情、力量和想像力，才能振興祖國經濟，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有說服力。」

一個沒有競爭的社會怎能面對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

觀念之二：競爭的唯一標準

競爭——究竟意味著什麼？

一位博士生回國前被邀在美國大學講學。

她想：「該向美國宣傳一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她講道：「我在美國看到，你們也不是什麼都好。比如大學中許多有過突出貢獻的講師、教授，一旦不出成果了，你們就解聘他。在中國就沒有這種現象，安全感很強。」

這時，講壇下的一位美國教授舉手要求發言。他不解地問：「一位不合格的老師，不解僱他，該怎麼辦呢？讓他繼續教課，不是誤人子弟嗎？」

講壇上答道：「在中國，也不會讓他再教學的。」

「那他幹什麼？」

「可以……比如說，可以把他放到圖書館嘛！」

台下哄堂大笑。

在美國，圖書館的老師是學識最淵博的人，他們擔負指導學生閱讀的重任。
不久前，一位國內的領導人訪美，發現給

他開車的司機竟是一位大學教授。

他不解地問：「在美國，大學教授也開出租車嗎？」

教授答：「沒有地方聘用我。」

一位中國研究生畢業後在美國某研究所就職。一天，室主任請他看一份規劃報告然後呈送所長。他看後認為「此報告不行，照此辦理，將一敗塗地。」他向所長談了這一看法。所長說：「他的不行，你拿份行的出來。」第二天，他寫出一份報告呈遞所長。第三天，他被提升為室主任，原主任被解聘。

這種激烈的競爭，有力地鑄造著中國留學生的新的價值觀念。

在歷次座談會上，杜厦都聽到留學生們談及這種真正的競爭，它有一個根本點：

起點均等，終點不均等！

——在「起點均等」的條件下，無論資歷，無視權威，無關黨、政，三教九流，車夫馬販，專家教授，都允許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向前衝刺。讓每個人都去試試。「允許失敗，但不允許不創新。」這就是美國的「文化」。在這裏，沒有什麼「資歷深的允許幹，先幹；資歷淺的不允許幹，後幹」。不，大家一起向前，競爭的起跑線對每個人均等。

競爭的這「半個觀念」正逐漸被我國一些有識之士所認識，有的單位正衝決種種障礙提供機會均等的種種環境。於是，有人以為這就萬事大吉了。但留學生們說——且慢！還有另外「半個觀念」：終點不能均等！

——在在一起跑線，無論何等人物、何種資歷，誰最先衝破終點線，誰就獲得最高榮譽，取得最高報酬，不會等那「資歷更高的，權

威更大的」或「照顧方面面的情緒」，大家在終點線上一起吃「大鍋飯」！

留學生們說：這種唯一的競爭標準，就是一個人的才幹！「起點均等」意味著每個人與他人有同等的權利和機會。而「終點不均等」意味著人人都有貧窮和富裕、保有榮譽和喪失榮譽的互變可能。

在這種情境中，留學生們怎麼能遵循我們的老祖宗總結出的必須「終點均等」的名言：「人怕出名豬怕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出頭的椽子先爛」、「高標見嫉」等等，等等。

留學生們說，中華民族在民族傳統與現代化的交融中，應該能夠「以不卑不亢的胸懷走向世界；同時，以兼容並蓄的氣度讓世界走向我們！」

觀念之三： 被視為「恥辱」的幫助

一個自費生，迢迢萬里來到美國。他走下飛機，踏上異國的土地，看到一個陌生的世界。他不知道怎樣問路，到哪下榻，在哪購物。他口袋裏只有三十美元。他甚至不知道怎樣投下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幣，打個電話與親人聯繫。

他想，親人一定會來接我。他有姑姑在美國，是她的一萬美元的保證金擔保他來美國上學的。

機場已經空無一人，姑姑却不見身影。一陣蒼涼感襲上心頭。他安慰自己：姑姑有急事。打個電話問問。

話筒內傳來姑姑親切的聲音：

「啊，你來啦！我們全家祝你平安到達。我已經給你聯繫好了工作，對，到餐館刷盤子。」

不，你不必急著回家來，直接乘車去餐館吧……

完啦。他目瞪口呆。在中國，即使平時來個客人，也要迎接一下，起碼也要四菜一湯招待一下。何況來自國外的親人！

他一怒之下，找到先到美國的一位朋友，訴說心中的不平。

朋友哈哈大笑：「你姑姑真好！她給你聯繫了工作。你快感謝上帝吧！」

在每日累死累活刷盤子的勞作中，在美國人的交往中，他明白了，這就是美國——

平時，美國人絕不主動去幫助別人（意外事故、親人生死婚喪等事除外）。他們認為：

主動幫助別人，是視對方為弱者，這是雙方都不能容忍的事情，那等於說：「我瞧不起你！」

中國留學生，尤其是自費生，在美國不得不陷入「不自立不能生存」的境地！靠父母、靠朋友、靠親屬——一句話：靠別人，不行了！

但他們同時認為：這對中國知識份子，是一個很好的改造。

他們在國內形成的對父母和他人的依賴感，被資本主義社會的「適者生存」碾得粉碎，從而鍛造出一種新的性格：不屈不撓，頑強奮鬥。

他們的生物鐘被重新調整。國內養成的睡午覺、聊大天、打撲克、逛大街等習慣都被拋到九霄雲外。每人都揣有一個小本本，上面是每週內以「分」為時間計量單位的活動日程表。

儘管如此，他們仍隨時感到「小舟傾覆」的威脅，非頑強地自主創造不能達到勝利的彼岸！

於是，當杜厦收到一份留學生決定在美

國創辦中國公司的報告時，他感到由衷的喜悅。他相信：祖國正需要這種精神！

觀念之四：貨真價實的高節奏

也許，是六十年代農場的勞作使他感到「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沉悶；也許，是七十年代在燈炮廠的機械動作使他的性格轉向另一個極端——余臨昌。這位自費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電機系攻讀碩士學位的留學生，現在在美國一數控機床廠任工程師。聽說天津市來人赴美招才，他立即找到杜厦。

「我有一個建議……」他說。

他的建議是：美國的機床市場十分薄弱。台灣的企業家看準這一點，來此大辦機床廠——運來台灣的機床，配上日本或美國的電腦，翻手就是成倍的利潤。他認為：祖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機床工業，完全可以打入美國市場，但需要有人來幹。

他說：「我會先後三次向祖國有關代表團和派出機構提出過建議，但……」

杜厦說：「你到天津去！天津市政府一定會採納你的建議！」

余臨昌一下子神采飛揚。

當夜，二人傾心交談，直至凌晨二時。

第二天，杜厦一覺醒來，余臨昌已經不見了，留下話：

「我已回國辦事！」

杜厦感慨萬分：這才是真正的高節奏！

* * *

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杜厦同工作組其他成員再度相會舊金山。他們交換了看法，得出

了一致的意見。

飛機凌空而起，飛向北京。

很快，一份關於我國留學生情況的詳盡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國務院……

據不完全统计，一九七八年以來，我國留學生共出國三萬八千人（包括七千自費生）左右。學成回國的已有一萬六千人——這已證明「百分之八十不歸」的提法不準確。在已回國的人中，已有一百七十多人取得國內重大科研成果獎，百分之七十八的人成爲 所在單位的骨幹或學科帶頭人。僅以清華大學爲例，回校擔任教師的留學生已爲研究生開出了一百六十七門課程，爲本科生開出一百五十五門課程，

其中許多爲國內空白……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導：

「國家教育委員會召開的留學生工作會議指出：通過各種形式派遣出國留學生人員完全符合我國對外開放的長期方針，今後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下去。『七五』期間由國家財政撥款公派的留學人員總數繼續保持現有水平，而地方、部門自籌資金以及與國外交換的留學人員，在現有的基礎上將會有所增長。」

「第五代留學生是完全可以使祖國感到自豪的！」

（原載「中國青年報」一九八六年五月廿四日第一、二版）

我依然徘徊（國內）林島

你去了，我依然

徘徊在夜的小亭

臨海，沐風，清冷中

一切都變得淒然

淒然中的思念。

淚

你，心中永不枯竭的源泉

你，肉體裏潛流不止的小溪

宛如潔白、輕柔的手帕

拭去那一——沾污心底的塵泥。

詩卷裏，你是微濕的滋潤，

柔軟的蔓延，朦朧我羞怯的詩句，

戀情中，你是細緻的安慰，

月般的清冷，凝固我燃燒的妬忌。

明眸中看到你，你是感情的瀑布，

睫毛上看到你，你是如夢的彩虹，

當我死去的時候，你將

化作雲霧、化作水氣

緩緩地，隨著魂靈，向無垠的空間飄移。



●文藝園地●

你帶走了最早的黎明，
只留下孤燈似的月影，
朦朧中，飛魚的翅膀，撩起
冰涼的水塵，一層層
淚般的潤濕，淚般的透明。

你去了，我依然
徘徊在夜的小亭
臨海，沐風，一聲聲呼喚
如絲帶，
隨波行……

使領館同情留學生

——紐約領事館的一次留學生會議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周少銘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我做為紐約地區某大學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聯誼會的負責人，參加了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召集的紐約地區留學生負責人會議。大約五十餘人參加了會議。會上，紐約總領事館教育組傳達了國務院留學生會議的精神，宣講了留學政策的新變動。會上也發生了幾件有趣的事。

留學生政策收緊趨勢

留學生政策變動的總趨勢是收緊。大部份內容早由「中國之春」預報了，領事館正式傳達的具體收緊政策有：

- ▲ 在校大學生不許出國；
- ▲ 大學生畢業後，二年之內不准出國；
- ▲ 國家不再派碩士研究生，碩士由國內培養；今後派遣的研究生，必須在國內取得碩士學位後而出國攻讀博士生；
- ▲ 今後派遣留學人員，并非以博士研究生為主，而是以短期訪問學者（一年）為主；
- ▲ 伴讀制基本取消。但出國在一年半以上的訪問學者，可考慮提出家屬探親申請（批不批不一定）；
- ▲ 博士後研究未講明禁止，但明文限制：要提早一年申請，并經部委一級的原派出單位

（如教育部、科委）批准，并需使領館提供意見；

▲ 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派遣留學人數不增加，基本維持現有水平；

▲ 美國校方和基金會給錢者，一律按公費派遣；

▲ 以上具體措施，自今年九月一日起生效，九月一日前拿到護照者，不受此限。因此，碩士研究生、大學生、伴讀家屬申請出國的，要趕快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爭取在九月一日前取得護照。

國務院精神也有令人安慰的一面：大學畢業生工作二年後者，自費出國不限。

留學生們多表反感

五十多位留學生聯誼會負責人，聽到留學政策收緊後，會上會下多表示反感。

大家說，「七·五」期間各項建設突飛猛進，留學生派遣人數本應大增，不增加就意味着政策倒退。實現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培養人才，為什麼政府對此一直不予重視？

有的人說，政府很多官員出國遊山玩水，撥出款來支援第三世界，浪費了不知多少冤枉錢。把這些錢用來培養研究生該多好！自己國家富強了，還愁沒有朋友嗎？

大家對派遣短期訪問學者的計劃，很不以為然。大家認為，做一年訪問學者，頭三個月熟悉環境，後三個月忙於買東西，做不成研究，學不到東西，白浪費錢。

領事館人員同情留學生

出席會議的紐約領事館教育組趙可斌等人，會上會下都表示同情留學人員。他們說，他們在國內官員面前，為留學生們據理力爭，有時竟成了攻擊的對象。他們夾在中間，的確難做。留學生們對他們不滿意，國內官員對他們也不滿意。我想，教育組的工作人員出國幾年，對民主自由的社會必會有些體會，他們身處海外，和留學生們處境有相似之處，因此，他們較國內的那些黨官僚們理解留學生，同情留學生。

關於博士後問題，教育組諸位都支持研究生們的意見——不應對讀博士後加以任何限制。他們說：「新政策規定，國家需要的專業才可批准唸博士後。依我們看，這裏的每一項專業都重要，國家都需要。我們也認為家屬伴讀制度是好制度，不應取消。今後讀博士後，要經過部委一級派出單位批准，部委將徵求使領館的意見。你們提出申請，他們徵求我們意見時，我們統統批准。」一位教育組的幹部私下對我說：「至於部委是否批准，就看你的活動能量了。」

留學生活動經費被砍

教育組負責人傳達國務院教委會決定：由於外匯吃緊，使領館運用於留學生活動的經費，今年比去年少三分之一。教育組說，往年領

館給些補助，大家可吃個年夜飯，今年看來不行了。

留學生們的活動經費被砍，也激起了與會者的不滿。我們這些留學生聯誼會當頭的人，本來就難當。現在經費少了，我們就更難做了。

有的留學生提議，留學生們應搞一個簽名上書活動，要求繼續放寬留學生政策，敦請政府重視教育工作。由於大家多多少少存有恐懼心理，此項動議未能獲得深入討論。但我想，中國民聯可以做此活動（民聯總部已做一編者按）。

教育組「動員」看中春

會上，提到了中國之春。紐約領事館教育組在會上就「中國之春」做了如下指示：「中國之春」鼓吹什麼留美派，又批判什麼留蘇派，還說李鵬、田紀雲爭奪總理白熱化，他們是分化瓦解，拉一派，打一派，大家要注意。不過，我們還是希望大家看看「中國之春」，看他們說了些什麼。」這番話，很值得玩味。

幾位與會的留學生聯誼會負責人議論說，中國政府對「中國之春」的態度應該改變，「中國之春」也是留學生搞起來的嘛！對國民黨還那麼客氣，何必對「中國之春」採取敵視態度？

一位和我關係不錯的領事館幹部對我私下說，他每期都看中國之春，他說有些文章很有道理。他說，中國之春挺厲害，能量很大，很多內部消息都搞得出來，很多消息與他聽到的相吻合。他還問我看不看中國之春，我說：「看啊，我們那兒的同學都愛看。」他那裏知道，中國之春份子就在他的身旁！

●香港專欄

富人政治的犧牲品——大陸醫生

（香港）紅與黑

謹以此文獻給遍佈世界各大洲的「大陸醫生」及中國在世界各地的留學生。

一、大陸醫生在香港

「大陸醫生」這一名詞，對於世界各地華僑及中國海外留學生，也許相當陌生，然而，在香港來說，這是一個對中華民族最具當代諷刺性的名詞。它既無情地嘲笑某些當代中國統治者的無知，國家的尊嚴受損害而仍置若罔聞，這比之李鴻章及西太后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也顯示出香港醫療制度存在着嚴重的壟斷性及殖民地色彩，是一種典型的「醫霸」作風。

所謂「大陸醫生」，是指一些從中國領得合法畢業證書的醫生，在九七年來臨之前的香港沒有註冊和行醫權利的醫生。

二、大陸醫生——

一國兩制下的犧牲品

近年來，「大陸醫生」進行爭取權利的鬥爭，亦受到國內執政者的支持，但自從提倡「一國兩制」以來，國內的大爺們為避免與富人政治的政策有所衝擊，對這個問題採取迴避和不負責任的態度。試問，一個地方的衛生權力機構，可以將其權力凌駕於屬全國性的中央衛生部之上，可以不承認國家發出的畢業證書，這種局部否定中央的情況，是任何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不應出現的現象。而我們的中央大員們，對這問題，視而不見，裝聾作啞。從哲理上

來說，這是為小集團謀利益的極度自私的表現，是對民族尊嚴極度不負責任的表現。既然這樣做，為什麼還要國內醫學院大量招收港澳留學生，難道讓他們畢業後回港轉業？這種誤人子弟，誤人青春的做法，極為要不得。

三、「考試」與榮譽

在香港「醫霸」委員會操縱下，對「大陸醫生」實行所謂「考試」，這種為達到既得利益集團的「考試」，充滿着不合理、不科學的內容，答案及試題脫離實際，無統一標準，試卷翻譯錯誤百出。更有甚者，獨自制定限考「三次」的標準，是誰給予您們這樣大權力來分裂和侮辱有中央衛生部發給合格證書的醫生，您們的「考官們」有沒有膽量接受「落第」的「大陸醫生委員會」考一考您們的「水平」？

在此，我們只聽說光復後的國民黨政府對日偽的學生們進行甄別試，而奇怪的是祖國的大爺們却對在自己領土上的個別人任意侮辱自己培養出的醫生却不聞不問，面對着自己的醫生受到殖民地的既得利益份子的侮辱，可以面不紅，心不跳，真不知他們的民族血性跑到哪裡去了？

四、我們的願望

我們希望將這個問題暴露於四海，使四海之內的大陸醫生及海外留學生對這一問題有所認識，為爭取我們的合理待遇，為爭取醫學在香港有法治的保障而努力，以利於我們在有生之年，服務於香港社會。

中共的「一胎化」人口政策剖析

本刊責任編輯（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張 森

人口問題的由來

世人皆可見，人口問題已成了當今中國的一個結症。在高度計劃化的中國，出現了一個結症，不能不說是對整個中國共產黨實行計劃體制的一種嘲笑。

毛澤東在嘲笑政治蠢人時說過一句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那麼中國目前人口問題的「腳」是誰砸的呢？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一方面把戰爭年代的部隊供給制帶了進來，一方面「邊倒」向蘇聯。供給制則非多勞多得，而是「多生多得」，有一張口，就有一份供給，于是在享受供給制的革命幹部中不說是為增加收入而增加「生產」，至少也覺得人丁興旺是一件好事。蘇聯在衛國戰爭中損失了十分之一人口，約二千萬人死于二次大戰。加之遠東西伯利亞地區，多年來亟須人力進行開發。因此戰後蘇聯積極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中國在建國後「一邊倒」，事事處處學習蘇聯，竟忘記了自己的國情，把蘇聯「老大哥」的人口政策也照搬過來，鼓勵生育；孩子生得越多越光榮，甚至樹立「光榮媽媽」的稱號，對生育十胎以上的母親予以鼓勵。對此，馬寅初先生曾提過合理的意見，但立即遭到迎頭痛擊，不但沒使共產黨正視起中國的人口現實，反而自己被戴上了「反動的馬爾薩斯

人口論」的帽子。

當然，將中國後來人口超膨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完全歸咎于五十年代共產黨指導政策的失誤，也不盡公道。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小農傳統意識濃厚的國家。幾千年來社會的經濟基礎主要是農業生產，而且是主要依靠人力的落後生產方式。這種以人力為主的舊時農業生產，必然需要大量勞動力，尤其是強壯的男勞動力（用牲口都是壯的有勁，當然人若像牲口一樣被使用時也不例外）的投入。這種生產的客觀需要反映在意識形態上，則是：人越多越好，家裏男人越多越富。從這點出發，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農村比城市出生率高（當然此外還有農村的宗姓觀比城市強烈，在單調的農村生活中，農民「除去酒精和性交外沒有其它的享樂」（恩格斯語）等其它原因。農村中重男輕女，甚至殺女嬰的現象比城市中嚴重；為什麼毛澤東——中國現代的農民領袖——會提出「人多好辦事」的口號；為什麼「大寨」、「大慶」會提出「人定勝天」，在沒有機器的情況下，照樣開山關嶺、造田引渠、拉井豎架。因為中國歷來就是勞動密集型的生產，而在缺乏機器的落後生產方式中也只有採用密集型的勞動。這也許就是毛澤東提出「人是最寶貴的財富」的道理所在。

因此，公平地說，中國的人口問題，既不

能完全歸咎于中國共產黨的人口政策，也不能完全歸于中國社會的歷史背景與傳統，而是這二者相互作用的結果。中國落後的生產方式以及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思想意識為解放後共產黨的人口政策提供了土壤，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由于其固有的農民烙印以及當時的政治需要，又把中國的人口發展推向了惡性的道路。

控制人口增長， 實行晚婚和計劃生育

中國人口的基數本來就很大，一旦受到錯誤人口政策的推進，便迅速膨脹起來。到了六十年代初，饑餓的事實使共產黨始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于是提出包括晚婚和計劃生育在內的減緩人口增長的政策。但此時共產黨並沒有承認和批判過去人口政策的失誤，而是馬上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宣傳起晚婚和計劃生育對個人有何等的好處來。（共產黨總是宣傳什麼政策就說什麼政策百分之百地好，從來不說自己過去的什麼政策有什麼不對，也不說現在這個政策可能會有什麼副作用。）這就使得人們對共產黨人口政策的前後矛盾產生極大的困惑甚至反感。加之傳統的作用，人們不能馬上「一百八十度地轉彎」，因此對新人口政策雖不敢明確反對，但暗中却極力躲避或消極抵制。



坐在自行幼兒車裏的小孩，跟着父親上日托。

于是共產黨便使出其慣用伎倆，採用強制手段推行。此時，共產黨雖然意識到了中國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但似乎並沒有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途徑，即：發展生產，提高國民教育。發展生產，提高更多的就業機會，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以滿足人民的需要；提高國民教育，使人民自覺地認識到人口增長與切身利益之間的關係。中共對此問題的政策像其許多其它的政策一樣，不是開源，而是節流，而且是強硬地節流，正如其自己所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執行」。因此，這時中共的人口政策，雖其動機是對的，但實稱不上是「上策」。也正因為中共沒有認識到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根本途徑，因此才會一面大力強制推行計劃生育以降低出生率；一面却又矛盾地鼓吹「人多力量大」，「人在生產中起着決定性

的作用」。

六十年代後半葉的文化革命，衝擊了中國的一切，自然也席捲了計劃生育領域。在那「誰管得着誰」的年代中，人們可擺脫了自己不理解、不情願，而是別人強制自己做的事情。于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國人口增長率呈現出解放以後的第二次高峯。這次高峯與其說是中國人民尚未認識到中國人口問題的緊迫性，不如說是人民對於強制措施的一種反抗，不如說是中共在高唱「好得很」、「一派大好，而且越來越好」時的又一失誤。

等到中共再次看到出生率曲綫上升時，它採取的仍是強制性的高壓手段，而且是以以往更強高壓。因為中共幾十年來只信奉一條真理，即：以高壓來解決一切問題。如果說前一次，中共只是「號召」男女青年二十五歲結婚；那麼這一次它却無視依然在法律上有有效的「男二十，女十八」的婚姻法，用行政命令要求男不到三十，女不到二十五不得開具結婚證明。如果說前一次對於婦女的生育還只是「號召」一晚、稀、少，「兩個不少，一個正好」；那麼這一次則是「一家一個娃」。如果說前一次還是軟磨硬泡地「動員」婦女節育，那麼這一次乾脆在你生完一胎後「幫助」你完成節育。如果說前一次對於超生的人只是「批評、教育」，那麼這次則是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斷你生路（每一個在大陸的人都知道超生是何等的大罪）。如果說前一次農村超生婦女只是在幾年中得不到孩子的口糧（孩子又有何罪？！），那麼這一次則是立即抄家罰款，免分田地。至于孩子，更是甯想上戶口，從降生日起就失去了上托兒所、幼兒園的權利，成了新中國的「非法居留者」，被剝奪了早期受教育的權利，甚至生存的權利（因沒有戶口就沒有口糧

），同時在有些地方，超生的父母是沒有申請住房的權利的，因此這種孩子也就失去了住的權利。而沒有吃、住這兩項生存基本權利的孩子怎能談得上有生存的權利？甚至可以說怎能談得上有做人的權利？如果說前一次超指標懷孕要「動員」你人工流產墮胎，那麼這一次不管你肚中是幾個月胎兒非「送」你去醫院墮完胎不可，而且還要附加停發獎金，免享受人工流產假等處罰，使你要麼手術後立即上班，要麼扣工資在家養身體。「多勞多得」這條普遍的權利對於這些雖然仍被寬大為「人民內部矛盾」的人來說已不適用了。如果說前一次超生受懲罰的僅是當事者一人，那麼這一次則是一人超生，全單位受罰，一人株連全廠、全村或全校，目的是使全單位的人集恨于你一人，使你成為衆矢之的。當然，話也得公平說，中共為控制人口并非單採取懲戒手段，除了滿街、滿店的微笑宣傳外，更有專門的婦女委員在青年們新婚時送上滿滿一包的避孕用品，有的甚至悄悄地「面授機宜」，唯恐「小青年們」有不懂之處。婚後，這些婦女委員們更是月月關心姐妹們的月經，以便一查知停經即按照「政策」及時處理。工作之細堪稱世界第一，值得聯合國的嘉獎。

中國共產黨控制人口的措施，無可非議，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正如中共的其它政策措施工一樣，由于沒有事先指出一個政策的副作用和該政策實施的合理界限，或者中共當局根本不願聽或聽不進別人的理性忠告，因此往往直到「好事變壞事」時他們才如夢初醒。

五十年代拒絕了馬寅初先生的建議，結果是七十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六、七十年代的晚婚政策，造成七十年代末以後出現大批待婚大齡「青年」（尤其是女青年），以及

超齡頭胎產婦的生育困難和新生兒先天殘疾率的上升。然而不論是「上山下鄉，支援邊疆」，還是「鵲橋會」，都沒能解決這些遺留社會問題。「上山下鄉」政策以失敗而告終，城市中的「待業青年」（據說中國沒有「失業人口」）有的仍在等待，有的只是「生產自救」，很少有像樣的工作；而「大齡青年」的婚事則發展到「急家長，愁親友」的地步，以致影響到整個社會，迫使中央不得不親自「關懷」。

「一胎化」政策的嚴重後果

那麼現在的「一胎化」政策將會給今後帶來什麼副作用呢？

首先，我們現在已可看到的是獨生子女性



只有在幼兒園裏，獨生子女才能享受童年伙伴的快樂。

會到這一點，而且，中共的報紙也已經提到了這個問題。由於這一代的獨生子女均無兄弟姐妹，因此他們也就不會有兄弟姐妹的概念，從而也就沒有愛護弟、妹，尊敬兄長的意識。而對幼小弟妹的愛護、對兄長的尊敬則是人愛人、人尊重人的啓端，沒有這個啓端，要讓他去愛其他的人就困難多了，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普遍認為今天的獨生子女比以前的孩子「自私」多了的緣故。同時由於家中只有這一個娃，不要說是父母，而且還有「姥姥疼、舅舅愛」，其結果孩子不但變成了太上皇，唯我獨尊、任性，而且缺少責任感，獨立能力大大降低。孩子是家庭、國家、民族的希望，如果在幼兒啓蒙時期就遭到了社會和中共政策給他們造成的這種變異，那麼當他們進入成年後，中國社會的人的素質就很令人憂慮了。

其次，由於中國現仍存在「重男輕女」的社會意識，由於農村經濟改革實行責任制後對於勞動力（尤其是男性強勞力）的客觀需求，殘殺女嬰或虐殺女嬰的現象重新上升。從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到，解放後中國大陸的嬰兒死亡率一直是趨于下降的，但到一九六〇年左右曾大幅度回升（專家認為這次回升可能是由於當時社會出現的飢荒造成的），其後穩定了一下，又接着下降；但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却呈現直線回升的現象，這次回升據認為則是與殺嬰有關。（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正式宣佈「獨生子女」政策）。如果說舊中國人們由於愚昧和貧窮而殺嬰，那麼新中國則是中共的「獨生子女」政策人為地促成了殺嬰罪惡的重新出現。當然，共產黨政府從來沒有直接鼓勵過殺嬰，甚至還懲戒過那些敗露的殺嬰犯。但是「一胎化」政策的必然後果之一就是促使殺嬰率的上升，且別說還有千千萬萬個已

經孕育了八、九個月而被墮胎手術扼殺在母體中的嬰兒（有的是超計劃懷孕被發現後強制人工流產的胎嬰，有的則是早期胎兒性別鑑定後發現是女嬰而「自願」流產的胎嬰）。殘殺女嬰的直接後果之一是男女的比例失調，大陸報紙偶而透露出來的統計數字最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而「男女都一樣」之類的口號也間接地表明了大陸殘殺女嬰現象的嚴重性。如果這個副作用不能及時得到有效的制止，那麼二十年後中國必然會出現一個新的婚姻危機，甚至社會秩序、人倫道德也會出現危機。

第三，「一胎化」政策的另一嚴重後果是對中國未來社會家庭結構的影響。如果說中國以前的家庭結構是正金字塔式，即：祖父母輩人數小於父母輩人數，而父母輩人數又小於本輩人數；那麼不難看出，「一胎化」後，中國未來的家庭結構將很快出現倒金字塔式，即：祖父母輩人數大於父母輩人數，而父母輩人數又大于本輩人數；更具體地說，將呈現四——二——一——式社會家庭結構，即：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四人，父母二人，本輩一人。這種社會結構無疑是一個人口老化的社會結構，老年人的人數大大超過年輕人。如果說今天中共「一胎化」政策的出發點是要加大成年生產勞動力人數與兒童純消費人數的比例，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加速社會發展；那麼明天「一胎化」政策的必然結果，則是加大了老年消費人數與成年生產勞動力人數的比例，從而降低了社會生產力，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因此「一胎化」政策實不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良策，而是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的飲鴆止渴式的民族自殺政策。如果到那個時候，中共還在中國當政的話，那麼，正如同中共今天的苦果是他自己早年親自種下的惡種一樣

，屆時中國社會老年化、生產力低下的問題將是中共今天政策結下的苦果。「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將不是別人，而是中共自己。如果說屆時中共已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那麼中共今天的作法實為「在我之後哪怕是洪水」的禍國殃民之舉。

此外，一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個國家的強盛、發達，除需有充足的勞動力外，更需有大量的高級人力資源，如科學家、藝術家等。隨着社會的發展進步，複雜勞動人力資源與簡單勞動人力資源之比將越來越增大，這我們在當代社會中已可明顯地看到。而天才的科學家、藝術家等很大程度上是沙裏淘金的產物，是在衆多普通人物啓發下產生出來的精英，沒有一定數量的同輩人口基礎，必然會降低這批精英的誕生機率。我們翻開各行各業的名人傳，很容易發現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他們絕大部份并非家庭中的長子，這就意味着如果當時那些家庭奉行了獨生子女的原則，那麼這些精英就根本不可能降生。由此推理我們可以想像，今天的獨生子女政策是否也已經扼殺了中華民族未來的許多精英的誕生呢？

一個國家的強盛——至少在未來幾十年的世界中——不可能與軍隊截然分開。「獨生子女政策」的另一後果將是給未來中國的兵源及全部由獨生子女構成的部隊的戰鬥力帶來很大困難。強徵獨生子女入伍，不但直接減少了生產戰線上的有生生產力，而且給其父母帶來很大的實際困難，這種困難不但直接影響其父母的生產情緒，從而影響社會生產力；而且會反過來影響在伍士兵的情緒，從而降低部隊士氣的穩定，降低部隊的戰鬥力。我們很容易想像，一旦戰爭需要有人犧牲時，這支由「獨生子女」構成的部隊，是有更多人挺身而出，還是

有更多的人退縮脫逃？而一支由怕死鬼組成的軍隊肯定是一支必敗的軍隊，因為它在死神面前不戰自潰。

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另一要求是由封閉經濟體制走向開放經濟體制。而開放型經濟的一個必然要求則是人員的流動，即人員流向待開發的生產部門和地區。獨生子女型的社會結構由於二比六的沉重老人負擔大大加重了流動的阻力，即使流向了開發地區，也會由於這種沉重的負擔而大大降低新區開發的速度和效率。而對於中國來說，新區的開發則尤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沒有新區的開發，單靠老區的改造，很難想像中國何時才能實現經濟的現代化。

中國人口問題的關鍵

中共「一胎化」政策將給中國未來社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對人口問題的放任也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的後果。那麼中國人口問題的出路何在呢？這裏的關鍵是社會最佳人口數值問題。正因為中共長期不懂這個問題，才導致其指導政策「不是忽左，就是忽右」，從而給中國社會造成不應有的巨大災難。

中共早年從其脫胎的農業經濟社會中素樸地意識到人的創造性作用，於是放任甚至鼓勵人口的增長。以期以人海戰術創造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結果遭到了失敗。今天中共又希冀通過「一胎化」政策來扼制人口的出生，從而降低社會人口的消耗，反托生產率的提高，結果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從長期來看，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原始社會時，全人類只有幾十萬至幾百萬，

生產力則是那麼低下，而現在人類已經成長為幾十億，然而生產力却發展到如此高的程度。這說明并不是人少就一定生產率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人多就生產率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低。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發展生產力。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目前的人口政策實際是為它自己的施政劣績開脫，企圖將自己施政的失敗歸之于中國人口的增長（實際上，我們從上面可以看到中國人口近三十年來的超增長本身也是中共早年政策的後果）。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人口的超增長對生產率增長的負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首先應研究的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某一時期的最佳人口數值，然後用疏導的方法使人口總數接近這個數值。也就是說，我們首先應該確定的是，中國這塊土地及其所擁有資源，如在正確的政策指導下，究竟能不能養活十億人口並使其達到世界現代的發展速度。其次是，如果由于以前政策的錯誤指導而需人民在一定時期內暫時實行（并非「長期國策」！）計劃生育，控制人口，那麼這種控制應是結合民族未來與眼前需要的統籌兼顧，而決不能是只治駝背不管命的自殺性措施；這種控制應是具有高度政治藝術的疏導，而決不能是違背人權的強制。「人有沒有生的權利？」這個在全世界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今天不幸又在中國產生，如果說有生的權利，那麼為什麼有人要來剝奪這一權利？不論任何人以何種藉口來實施這種剝奪，他都不能掩蓋一個事實，即：他在剝奪——「人的生的權利」——生產的權利、降生的權利——生存的權利。世界上人口與資源關係比中國更緊張的國家不止一個，有幾個在搞中國式的「一胎化」？世界上需要搞計劃生育的國家也不止一個，又有幾個在像中國這樣搞強制性的措施？這些情況難道不需要中國人深思嗎？

專訪陳必照教授



談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

●本刊記者 ●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編者按：

陳必照教授，一九三七年生，祖籍台灣台中市。早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後來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普林斯頓人口研究所工作。現任底特律 WAYNE 州立大學政治系教授。陳教授曾發表過「中國的公共衛生與計劃生育」、「中國的人口動態與計劃生育」等專著。近年曾多次訪問大陸進行研究和講學。本文發表前，未經陳教授過目，文責由本刊負。

文中「記」代表本刊記者，「陳」代表陳必照教授。

記：陳教授，今天的訪問是想請您談談中國的人口問題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據人民日報載，六十年代後期出生的一代，將在近年內形成一次更大的生育高峰。中國目前實行的一胎化人口政策，在海外引起許多爭議。請您從人口學的角度來談談這些問題。首先我想請您回顧一下中共建國以來人口政策演化的全過程。

中國人口政策的歷史回顧

陳：中國的人口政策就是計劃生育。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後，得出的數字是五億八千萬。當時公開的反應是：人口是一大資源。毛澤東就說：「人多力量大」。但在中共領導層內，也有人已經注意到了中國的人口問題。劉少奇在一九五五年主持了一個內部會議，討論人口政策的問題。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黨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出過人口控制的政策。周恩來在同年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上，也提出節制生育的問題。但是當時並沒有人敢說人口多了不好，唯一的理由就是保證婦、幼的衛生與健康。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七八年。因為一提高到人口控制的高度，就會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相對立。此外，中國的人口政策還受到蘇聯的影響，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全面照搬斯太林的模式。蘇聯不僅沒有節制人口，而且還搞母親英雄。當時有些人也考慮到中、蘇國情不同，但沒有人敢公然站出來，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後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馬寅初、吳景超等學

者，誠懇地出來講話，談到人口增長率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指出降低人口增長率，人均產值會自然上升。這是一個很穩健的學術觀點。但立刻在反右中變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馬寅初等一千人皆遭到一棍子打死的批判。當時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與馬克思主義是對立的。

陳：其實馬克思對人口論根本沒有研究，人口問題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不佔什麼地位，談得很少。馬克思只是說馬爾薩斯是資產階級的辯護人。

反右之後跟着就是大躍進，大飢荒。據世界銀行等機構的最新研究報告估計，大飢荒中餓死的人達二千萬至二千七百萬之多，從而死亡率（一九六〇年）由百分之二十五上升至百分之四十。而由於營養不良所致的流產，使得生育率也降到很低，從五八年的五點六七九，降到六一年的三點二八七，等於降低一倍。但到一九六二年便開始大幅度回升，達到六點零六，三年達到七點五，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生育率最高的一年。這是一種生態補償作用。大躍進幾年，很多人推遲結婚，推遲生育，故有六三年的高出生率。於是，政府開始提出計劃生育，但是很緩和，並不怎麼嚴厲，但工作做得很成功，到六四年，出生率便降至六點一七六。以後逐年下降，到八〇年降至二點二。這樣有效地降低生育率，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是很成功的。日本在四七年至五七年期間，曾破了人口史上的一項紀錄，使生育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但與中國六十年代的數字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了。（參見圖1）

一九七一年，國務院提出一個以「晚稀少」為方針的計劃生育報告，正式開始推行嚴格的一胎化人口政策。因此我們可以把五七年到六二年算為第一階段；六三年到七〇年算為第二

降低生育可能出現的 不平衡現象

階段；七一年到七八年為第三階段（晚稀少）；七九年到現在為第四階段（一胎化）。前兩個階段，計劃生育工作在城市是成功的，但農村生育率仍很高。從七一年起，開始在農村中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共則提出最嚴厲的「一胎化」政策，至今沒有修改，雖然一九八四年國務院第七號文件規定了幾種可生第二胎的情況，但總的政策仍是「一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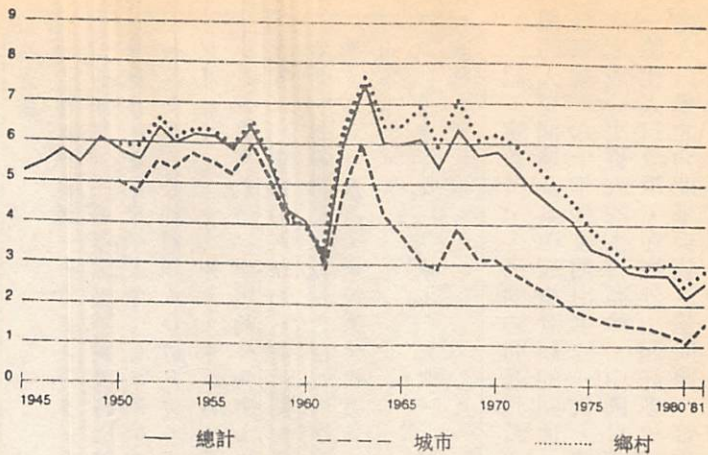


圖1 中國城鄉1940至1981年總生育率（每個婦女生育數）

- 注意：(1) 三面紅旗時期生育率大降；
(2) 文革期間生育率大增；
(3) 一胎化政策後，生育率顯著下降。

記：好！您剛才回顧了中國人口政策演化的過程，現在請您談談中國人口政策的現實和問題。我想，客觀地講，中國的人口政策是成功的，得到了聯合國的褒獎。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許多嚴重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陳：中國的計劃生育從結果上看，的確很成功。一九八三年生育率降到百分之二點一，這是人口保持靜態的數字。但是，隨之而來也會產生一系列問題。第一就是人口老化。許多西北歐國家也存在人口老化的問題，但它們生育率的下降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因此不會引起社會的不適應。目前人

表一：中國大陸各省市1981年出生嬰兒的性別比例（男比女）

省市	性別比例	說明
西藏	101.3	此數是一個謎，可能基於文化背景，少報男嬰
上海	105.4	這些省市性比例正常，正常範圍為105-107。這些省市多為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和上海、北京文化高的城市。少數民族地區計劃生育控制較鬆，北京、上海的文化程度較高，因而，在這些地區，殺戮女嬰的情況較輕，性比例維持正常。
新疆	106.1	
雲南	106.1	
青海	106.2	
寧夏	106.2	
甘肅	106.3	
貴州	106.8	
內蒙	106.8	
黑龍江	106.9	
北京	107.0	
湖北	107.0	這些省市的性比例偏高，可能是與殺戮女嬰有關。
遼寧	107.1	
湖南	107.6	
天津	107.7	
吉林	107.8	
江蘇	107.9	
江西	107.9	
四川	107.9	
河北	108.2	
福建	108.6	
浙江	108.8	
陝西	109.2	
山西	109.3	
山東	109.9	
河南	110.3	
廣東	110.5	
廣西	110.7	
安徽	112.5	
平均	107.7241	高於正常

口保持恒定的國家，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中國的人口結構，照如此發展，到二〇〇〇年，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可能達到百分之十。到二〇二〇年可能達到百分之十五。人口老化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心理問題、扶養問題，等等。

記：我想，另一個較嚴重的後果是性別失去平衡。因為中國傳統意識是重男輕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男子是壯勞力，養子防老。

陳：這種現象在其它工業化前國家也都存在。只有工業化、經濟發展、社會福利設施完

說明：中國大陸實行一胎化政策後，男、女出生性別比例明顯高於台灣地區。這可能是殺戮女嬰的現象造成的。

表二：中國大陸1953年、1964年、1982年
0-4歲嬰孩的性比例（男比女）

年歲	1982	1964	1953
0	107.63	103.83	104.88
1	107.83	105.31	105.85
2	107.35	106.38	106.59
3	106.71	106.96	108.62
4	106.19	108.69	109.38
0-4	107.14 (偏高)	105.71 (正常)	106.86 (正常)

說明：實行一胎化政策後，1982年嬰孩性別比例出現異常，可能與殺戮女嬰有關。

表三：中國大陸和台灣男、女出生率的比較
(選擇性年份)

地區	中國大陸 (1981年)	中國台灣 (1976-83)
性比例	107.72 (偏高)	106.79 (正常)

善以後，才能解決重男輕女問題。以前中國搞的人民公社，集體尚能照顧一下老年人，現在一切靠個人收入，農民等於國家的佃農，國家就是大地主！農業現在每年增長百分之七到八，相當高，解決了吃飯問題。但這種情況下「一胎化」就很難執行。現在的政策，老了全靠自己，當然要養兒防老了。所以現在大陸經常發生強迫墮胎，計劃生育干部被打、被殺，女嬰異常死亡等現象。據資料顯示，近年來一至四歲的女孩死亡率比男孩高，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自然情況下，男孩的死亡率總是比女孩

要高。這也許不是直接殺嬰造成的，但讓女嬰慢性折磨至死就更殘忍了。全世界只有中國具有這種情況。將來二十年後，就會有百分之一到二的小伙子娶不上老婆。(參見表一、二)

自然狀態下，中國人的性別是平衡的。出生時，男嬰比女嬰要多百分之七至八，但男嬰死亡率也要高出百分之七至八，這樣男女性別比例就拉平了。從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統計看都沒有這類反常現象。(參見表三)

我個人認為，如果生育率控制在二點一的話，就很好了，不要再搞更嚴格的生育控制，如「一胎化」，那樣造成的社會經濟代價會相當巨大。

我的觀點是，今後十五到二十年中，最嚴重的問題不是控制人口的增長，而是如何解決失業率過高的問題。六五至七五年中，平均每年生下二千八百萬嬰兒，現在逐年進入就業年齡，結婚年齡。過去就業的問題只是城市的問題，鄉下青年就是種地，不許到城市來，城鄉不能自由移民。但是以後問題不會那麼簡單，農村人口將同城市一樣出現過剩。解決的辦法有：一、維持高速經濟增長；二、發展勞力密集型工業與服務行業，少花資金，多投入勞動力。

國際社會

對中國人口政策的反應

記：最近美國停止對聯合國人口組織每年一千萬美元的捐助，其理由針對的是中國的墮胎問題，你有何評論？

陳：美國每年給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捐款一千萬美元。而聯合國每年給中國的計劃生育援助也是這個數字。今年美國國會否決了這項捐款，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是強制性的，而美國不願與強制的計劃生育有任何關係，所以停止了對聯合國人口組織的捐款。在美國國會，對中國應當降低人口有一致的共

識，但認為不能用強制的辦法，認為這是不人道的，違反人權的。

聯合國的有關組織反應是這樣的：雖然美國少給了一千萬，但並不意味著少給中國一萬萬，他們只是從亞太地區的總數中減少一千萬，給中國的錢還是原來那麼多，所以實際影響並不大。而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的確花了很大一筆錢，按人均計算是全世界第一位。即使外界減少捐款也不會形成什麼影響。聯合國的錢主要是用於培訓人員和生產計劃生育用品，如在天津就辦了一家避孕器廠。這對中國是有幫助的。我也反對計劃生育採取強制手段，但我不認為停止捐款會於事有益。我在美國國會向一些議員表示過這種態度。美國國會的意見也是不一致的。另一方面，日本對聯合國人口組織的贈款這幾年一直在增加，而雷根當局則是削減各項對外援助。

記：西方的反應大都出自人權的角度對不對？

陳：從一般西方民主國家的觀點來看，中國的計劃生育完全是強制性的。他們的人權標準是很高的。精子與卵子一結合就有人權。但中國人並不太注重人權，在西方國家認為是不可忍受的政策，在中國就能推行下去。西方國家認為政府根本沒有權利替老百姓決定何時結婚，何時生育及墮胎等。這對美國人來說是剝奪人權。而中國的統治者一向是無視人權的。

人口問題對社會、經濟和教育的挑戰

記：我想，中國人最終決定問題不是考慮人權，而是考慮經濟。例如現在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政策，人口就意味着土地多寡，意味着勞動力和金錢，所以農民們強行超生的就很多，實際上是中共的經濟政策刺激了農民的生育

陳：中國現在面臨幾個挑戰。隨着國民經濟中小型產業的發展，一定會形成城鄉人口的移動。國內已經在重視這種現象了。以前實行的戶口制度，使得人民無法移動，農村人口要待在農村一輩子，它的好處是保證不對城市形成人口壓力。但要發展新型經濟，必須允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適應產業變化的需要。

記：其實這種流動現在已經開始了，而且規模很大，近年有幾千萬農民已經放棄農業，進入城鎮，從事第三產業的開發。

陳：但目前的政策還是離鄉不離土，戶籍還是不能變化。都市化是一個趨勢，第三世界的都市發展很快，但不諧調，是沒有工業化的都市化。都市發展後，貧窮仍大量存在。

內部移民與都市化，是第二個挑戰。人口不能流動，會造成城鄉差別。故這幾年有個趨勢就是發展大城市的衛星城市。國內已經在做這方面的工作，這是好的轉變。

還有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人口素質提高的問題。毛澤東雖然講過人是最寶貴的財富，但教育的投資實在太少了。西方很重視人才的投資，東南亞國家亦然，比如台灣。西方學者研究，單從經濟學本身很難解釋四小龍的經濟繁榮，其很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在五十年代就在教育上大量投資。統計顯示，大陸十八到二十五歲的青年中，只有百分之一點五大學生，而台灣相同年齡組則有百分之二十三點四個大學生。在中小學方面，五十年代台灣的初級教育普及率就達百分之九十五。從師生比例上看，目前大陸一個教授只教四個學生（五十年代是一比七），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而台灣，一個大學教授要教二十點五個大學生。再看美國，最奢侈的學校也是一比十，比大陸高一倍多。大陸師資匱乏，辦教育又這樣低的效率，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這個數字還不包括

非專業的行政人員和黨務人員。

記：教育的確是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教育不僅可提高人口素質，而且可以改變傳統觀念，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問題。

陳：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大陸教育投資僅佔國民收入的四點三。台灣去年政府教育投資佔國民收入的四點五，但民間的教育投資則大得多。大陸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四項投資近年大幅度提高，從文革時的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七，但投資的效率明顯上不去。總之要發展經濟，就要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育效率。

記：教育上不去，觀念無法改變，就免不了要強制。很多人說，與其生下的孩子讓他餓死，不如不生下來。大陸也有很多人認為有一定程度的強迫少生也是必要的，但不要矯枉過正。

陳：聯合國也支持人口控制，但反對強制政策。對於一個農業國家怎樣才讓人民滿意呢？也許三、四個孩子會使人滿意。比如台灣，人們認為理想的子女數字是二點九，最近調查，理想數字還是兩點七。但實際上，總生育率只有兩點一、二左右。台灣農民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農民的非農業收入約佔一半，可以說是個工業化社會了。可是傳統的觀念還是斷不了。由此可以想像，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業人口的大陸，要搞計劃生育有多難了。

西方人口理論的簡要介紹

記：陳教授能否談談西方人口理論？比如馬爾薩斯人口論，大陸人都聽說過，批判過，但具體是怎麼回事，也不盡了解。

陳：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核心原理是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料只按算術級數增長，這就會導致戰爭、飢荒瘟疫，通過自然強迫

作用降低人口，以維持平衡。馬爾薩斯的學說產生於產業革命開始的時代，而產業革命初期社會動盪，人口問題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記：你能談談新馬爾薩斯主義嗎？

陳：新馬爾薩斯主義則是不強調人口過剩和人口密度與生活水平的靜態關係。它只是證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數量的相對降低，會使國民經濟發展更快。它用人均所得來研究人口與經濟的關係問題。當年列寧對新馬爾薩斯主義進行過批判，五十年代中國也進行過批判，都是認為只要有了新的社會制度，人口問題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的，這是制度決定論，即社會主義制度是萬能的。這是些獨斷之見。

當然，我們不能過份強調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舉例來說，台灣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是八百四十多萬，到一九八零年達到一千八百多萬，增加了一點一九倍。一九五三年大陸人口是五億一千七百四十四萬，到八二年增至十億零三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八十二，只增長了零點八七倍。同一時期的人均所得呢？台灣增加了三十七倍；大陸只增加了三點四五倍，可見人口也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不是只有一個障礙作用。

記：在新馬爾薩斯主義之後，西方人口學有那些進展？有什麼最新的理論提出來嗎？

陳：有一個形式人口學，是一種比較研究，以數學變量的形式表達人口的關係，它們的統計數據和計算公式都很科學。其它新理論也很多，關鍵在於你要接受。中國目前已經由聯合國資助，向美國派了三十多名學生學習人口學，主要是在經濟學系和社會學系。

中國的人口預測學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如航天部自動控制研究所，他們用新的數學算式，重新歸納出一套中國人口的預測方式，得到了國際公認。他們都是數學家 and 自動控制學者。但中國的社會學家却十分落後，他們還在

糾纏着十九世紀的理論、思想、方法和概念，找出馬克思有關人口問題少得可憐的字句奉若神明，做些註解，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個諫言：

生兩胎同樣可以控制人口

記：中國的計劃生育，從結果上看是非常成功的，但從過程上看，包含着各式各樣強制成份。目前西方的關注，也只是停留在批評的地步。最後想請陳教授從科學的人口理論上提出一些指導意義的理論或具體辦法，以供中國政府參考。

陳：我對這麼大的問題尚難提出什麼具體辦法來。不過關於一胎化以及這種政策必然遭遇的抵制，我倒有一些軟堅利導的辦法。目前城市由於教育提高、勞保制度、享樂主義等因素，一胎化已經推行起來，而農村的觀念仍然很舊。農村在實現機械化以前是需要勞動力的；在農村有傳種接代的觀點，還有養兒防老的考慮，這些都使得農村一胎化政策的推行，遇到了很大麻煩。因為一胎化等於不給人選擇的機會。尤其農村人要男孩。只讓他生一次，生下女孩，他們自然要想辦法再得到生男孩的機會，所以女孩的命運就會很悲慘。如給人兩次機會，你還生不出男孩，那也只好認命了。

我的一位朋友提出一種解決辦法：可以允許每個育齡夫婦生兩個孩子，但把生第一胎的年齡推遲到二十五歲以後，把生第二胎與第一胎的時間間隔延長到六年或更長。這樣，按照他的計算，到公元二千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口還是可以控制在十二億之內的。但實際上，為什麼非要強行控制在十二億呢？也沒有什麼意義和根據，這種人為訂數字的方式是不科學的。而且它的社會代價和負作用面的影響會很大，會引起一系列的人口問題。上面的方案可以



使人口不致於迅速老化。我的朋友一共提出六個方案，這是其中之一。他把這些方案帶到了大陸，給中國政府看，我希望能被接受。

中國人口控制，成效值得肯定

記：中國的人口政策還是有成就的，但要不斷改善，減少強制性及各種嚴重後果。

陳：對於中國的人口問題，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有一定責任，但我想還是應該正確地評價這一問題。中國的計劃生育無論如何，成功地降低了人口。人們說：「錯批一人，多生三億」。這種說法，不盡全對。與世界其它發展中國家比較來看，比如說印度：從五三年就開始提出計劃生育，到六十年代真正實行起來，但並不很成功。中國從五六年開始提出計劃

生育，其間有很多波折，但從六四年開始人口增長率下降，這還是比較成功的。儘管共產黨的政策嚴厲，但也不可否認它的成就，文化大革命提出「面向農村」，派大批醫療隊下鄉，農村也培養「赤腳醫生」，這些做法還是很值得肯定的。如果沒有普及計劃生育的措施，這麼大幅度的降低人口是根本做不到的。光靠命令也是做不到的。我在北京郊區參觀，「赤腳醫生」能做簡單的上下環手術。我想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是個災難，但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建立了農村醫療網，這點是一個正面貢獻。我也常和大陸的訪問學者辯論這個問題。他們不同意我的看法。

記：農業與人口的關係怎樣？

陳：最後我還想說一點：中國許多人把經濟發展緩慢歸於人口，實際上這誇大了人口問題。我前面舉了很多例子，就是要證明，中國的人口控制是成功的，因此，不能從這裡找藉口說經濟發展不起來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人口問題也不值得過於緊張，非要嚴格實行「一胎化」不可。

比如說，中國非要實行糧食自給，好像不這樣國家就要垮掉，而糧食又牽涉到人口的問題。實際上發達國家沒有幾個是糧食自給自足的，台灣、南韓不是，日本也不是。因為現今世界糧食是很便宜的，現在世界上是糧食過剩，賣不出去。可以通過國際貿易來買嘛。

記：中國領導人總是有一個舊的觀念，以為歷史上國家興衰都與糧食有關，「無糧必亂」，陳雲就這麼說過。

陳：不能這樣說。認為中國是個獨立的單元，一切都要自給自足，這是落伍於時代的觀念了。現代社會就是貿易和互補的社會，中國要實行現代化，首先應從觀念上現代化，特別是領導人的觀念要現代化。

記：就談到此，謝謝陳教授。

中國人口問題座談會紀要

(本刊編輯部)

編者按：中國共產黨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與此政策相關的強迫墮胎及殺嬰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在此問題上，有兩種極端的觀點：

- 一、把一切責任都推給共產黨；
- 二、把問題推給中國的傳統習慣，為中共開脫責任。

如何看待中國的人口問題？中國的人口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如何解決？

本刊編輯部特邀了在紐約的幾名來自中國大陸的醫生，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舉行了一次座談。這幾位醫生，在國內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計劃生育的工作。他們是中國人口問題的見證人。現本刊將座談會的重點整理出來，予以發表。

美國國會及國際人權組織十分關注中

遲：我們今天請大家來座談中國人口問題，主要包括下述幾方面的內容：中國大陸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情況及其所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發生的原因，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盡可能地避免強制墮胎和殺嬰現象的發生。人口問題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日益引起國內外的關注。今天出席的各位都是大陸近年來美的醫生，

國大陸計劃生育的狀況，希望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提供第一手資料和具體事例。如讀者有資料提供，我們將把它轉給美國國會及國際人權組織。

參加本次座談會的人有：

胡曼國：醫師，曾任江蘇省某醫院院長。

葉知秋：醫師，畢業於東北某醫學院，曾任遼寧省某醫院醫師。

王北燕：醫師，出國前，在北京某醫院做臨床工作。

林玲：醫師，來自貴州，曾在某醫院從事基礎內科研究工作。

遲效：醫師，畢業於東北某醫學院，曾在北京某醫院任職。

受本刊委託，座談會由遲效主持。

對中國計劃生育的情況有着親身的了解，希望大家能夠提出一些可行的見解，引起中國政府政策導向上的重視。

城市計劃生育工作

組織情況與存在的問題

王：計劃生育政策在城市的長期推行，已經取

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一胎化」政策是一種過份嚴格的政策，盡管城市的教育程度尚可，人們仍很難接受。因此常常出現一些問題。我出來前在一個研究所工作，一年只下幾個生育名額，由大家評，名額給誰，評出後由領導批准。如果誰沒有得到名額，生了孩子，就算超生，這會帶來無數麻煩。我有一個街坊，生了一個計劃外的孩子，盡管領導在女方懷孕期間就天天動員墮胎，他們夫婦倆還是生下這個孩子並決心要把他養大成人。結果小孩沒有戶口，沒有糧食，兩夫婦的工資也降了一級。這還不是大問題，孩子長大後不能入托，上學也有麻煩（因為沒有戶口）。倆口子長不了工資，又受到領導壓力，大人也很痛苦。這種例子是常有的，並不新鮮。

葉：我們單位有這麼一件事，一對夫婦得到了生育指標，但必須在規定的年份生出，過期作廢。結果兩人沒開好，懷孕晚了些，產期拖到了下一年，于是指標作廢，不許出生。他們這是第一胎，也不行，因為下一年的指標屬於別人了。結果倆人生下小孩後，算計劃外的，夫婦受到行政處分。王：定額生育一般是，個人申請，上報後輪流排號。上級下了指標後，方可生小孩。我們單位每次都貼出來，公布誰家可以生小孩了。這樣別人就老盯着可以生的女同志，看她肚子大了沒有。

林：各單位一般都由二把手，比如黨委副書記親自掛帥，任生育辦公室主任。各個科室都有委員和宣傳員來負責落實工作。各級都有領導小組，工（會）、青（年團）、婦（聯）都有成員參加。這樣就能全面控制情況，建立檔案，包括青年有否對象，

何時結婚，甚至何時來月經等都記入檔案。工作做得很細，教已婚女同志如何避孕，並且監督避孕情況。

遲：在生了一胎後，緊接着的工作是動員絕育。男方女方都動員。有的人離婚後，子女判給另一方，再婚後還得接復（如男子輸精管）。當然這方面的工作在不斷改進，不過還是會造成了身心負擔。中國的宣傳工作是很行的，有好多科技報專門宣傳這方面的知識，全國性的有「健康報」、「科學畫報」等。但對性知識的教育並不普及，比西方國家差多了。還有些封建的性畏懼、性骯髒觀念。

胡：人口問題，包括計劃生育，墮胎殺嬰，實際上有很多前因後果，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國家人口過多，要計劃生育，這本身是絕對正確的，必要的。聯合國也希望並支持各國降低人口。一般說，發達國家的人口已經不成什麼問題，總是保持着平衡，這與生活保障及教育程度有關。而落後國家的人口問題都很嚴重，中國則首當其衝。

定「指標」方法的利和弊

胡：在中國，城市計劃生育較易開展，這也與教育水平有關。青年人現在也考慮到自己的生活娛樂、家庭負擔、子女教育等，因此不願多生很多孩子，這是現代觀念下的自願選擇，一般看法兩個就夠了。而農村就不行，沒有實行機械化，勞力人手很重要，而且老年後沒有什麼保障，客觀要求養兒防老。從東西方比較來看，美國人就認為生育是個人的天賦權利之一，別人是無權干涉的。而蘇聯戰後採取鼓勵生育的



辦法，因為蘇聯亞洲地區要開發，急待人口增長。中國五十年代是仿效蘇聯，也鼓勵生育，搞「光榮媽媽」，誰生得多，就給獎品、戴紅花。但後來，突然發現人口太多了，生產、生活水平都跟不上，於是又突然走向另一極端，嚴格地限制起生育來。這樣就出現了「定指標」等操之過急的作法。這是共產黨的一貫作法，並不局限於計劃生育一個事情上，它總是希望一個晚上就解決問題。例如「指標」，在大陸我們聽得多了，反右有指標，大躍進也有指標，現在生育也有指標，打擊刑事犯罪也有指標，這是很不科學的工作方法，也是會引起嚴重後果的做法。所以我想指標應該打破，從其他角度來解決問題。同時這些指標往往沒有科學研究和統計的基礎。如今年結婚人口多少，育齡青年有多少，應該給多少指標，是否非要控制在十二億不可等等，我們都看不到有研究報告。

從醫學人道方面講，節育或墮胎，都是反人性的，反生態的，更不用說殺嬰了。因為胎兒出生前就已有生命。

王：過去搞「光榮母親」，現在搞「不生獎勵」，即不生孩子就有獎勵（雖然獎金幅度不等），還可以優先提級、長工資、入黨等。可笑的是有些有生理缺陷的人，不能生孩子，也得到獎勵，這樣完全失掉了獎勵的意義。

中國人應建立

「人權」「隱私權」的觀念

王：在中國，人們沒有「隱私權」的概念。中國人往往春節結婚，第一個來道喜的就是街道計劃生育幹部，還沒入洞房呢，就通知你不許懷孕，因為生育指標太少，剛結婚的根本排不上號。結婚以後，就更麻煩了。每個月都有人來問女方的月經情況，如果懷孕，馬上讓你去做人工流產。

遲：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沒結婚的人去做人工流產，要通知派出所，要單位介紹信。現在只要你來做人工流產，沒人管你。一方面醫院要掙錢，交錢就給做；另一方面政府也把道德問題放在次要地位了。只要你不生下孩子，一切都好說。

農村計劃生育問題多

葉：在中國農村，強制性很厲害。醫療隊一到，大隊廣播喇叭便開始叫名字，然後民兵們開着拖拉機到處跑，把不來的指標外懷孕婦女都抓來，拉進醫療站去，強制做「人流」，而且往往消毒也不認真，洗洗就做，很容易感染。農村的赤腳醫生水平很差，

運·

只上過一兩個月的訓練班，就去做「人流」全無衛生觀念。

一胎化的另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就是社會男女性比例失調。在重男輕女的農業社會，大家都想要男孩，但機會是一半。這樣人們生女孩就不甘心，總想再生一個男的。我在農村時見過一農家，連生十個都是女孩，最後一個取名「滿桌子」，就是說吃飯的桌子都坐滿了，實在生不出男孩，只好死心。但只給一胎，人們就想盡辦法生男孩，頭一胎不是便減女嬰。要接「戶口本」，否則家系就沒了。一胎化的這些後果的原因很複雜，有封建文化的因素，不能完全算在共產黨的賬上。

葉·

我看農村就要有一定的強制，否則于國于己都沒有好處。生多了養不起，餓死更糟。當然教育、醫療避孕措施要跟上，那就不會有許多墮胎與戮嬰事件發生了。另外，還要有勞保制度。在農村，沒男孩誰來幹活？誰來照顧老年人？現在都是獨生子女，誰來當兵？這都是很實際的問題。一胎化的問題是很多的。

要重視婦女健康問題

運·

中國農村的醫療水平實在太差，但農村人口又占全國的百分之八、九十。毛澤東講「婦女能頂半邊天」，干嘛，就是讓婦女承擔和男人相同的重體力勞動。我知道農村婦女有一半以上都有子宮脫垂，宮頸糜爛等病。春季農忙時，下水田插秧，來月經也要去。冬天，修水利，也有婦女隊，還宣傳和男同志競賽。子宮脫垂的主要原因就是勞累過度，還有生育過多。中國的

王·

男女平等，實有些不尊重婦女。婦女在生理上與男人是不一樣的。中國農村婦女的勞動力太大。國家應增加農村的福利投資。搞「赤腳醫生」，完全沒有科學態度。但派城市醫療隊，是個好辦法，值得肯定。

現實地說，靠正規大學培養的醫生，相當時期內還滿足不了農村的需要。培養基層醫療人員也是可行的，但不能沒有限制地讓他們幹不懂的工作。如結紮手術，培訓了幾個月就做，連消毒常識都沒有，這樣不行，會害人的。可能出現盆腔炎等後遺症。農村用天花粉引產就不錯了，還有用負壓瓶引產的，走家串戶，在農家炕頭上做，太草率了。因此慢性盆腔炎很多，事故率相當高。做人流要做子宮位置檢查，正規的非婦產科專業醫生都不見得能掌握，要有經驗。受孕後子宮壁非常柔軟，判斷位置錯誤的話，引產吸頭一下子就可能戳穿子宮壁，一點阻力都沒有。所以有些手術絕不能讓未受正規訓練的基層醫療工作人員作。

林·

在農村，我認為強制墮胎也是有必要的，因為沒有誰願意只生一個孩子，有了女孩，想要男孩，有了一個男孩，想要第二個男孩。農村為了保證上面下達的指標，不僅動用黨和行政的力量，而且動用民兵，有時對不願意墮胎的孕婦進行虐待。農村的各級幹部都是土皇帝，地頭蛇，土王法多得是。為了討好上級，什麼辦法都用。反過來，老百姓對計劃生育幹部也實行報復。我認識一個搞計劃生育的女孩子，因一個計劃外生育婦女產後死亡，其丈夫就說是她逼的，因為當時這女孩子也在場做工作。于是在威脅下，她被迫和那死了妻

子的男人結婚了。這男的又說他已有了孩子，讓這女孩子去結紮，而做了結紮後，這男的又要和她離婚，存心整這個女孩子。計劃生育幹部也不好做，經常出些人命案的。

改變農村經濟結構是當務之急

胡·農村的問題關鍵是農業結構本身。農村人口佔百分之八十多，若生產方式還是與幾百年前大同小異，農民的封建意識就無從改變，計劃生育就肯定會出現強制的現象。我在五十年代下鄉搞過消滅血吸蟲病的運動，就很成功。但計劃生育就很不成功。所以如果中國農業實現了機械化，就好辦多了。因此問題又歸結到了經濟改革，改革就是要改變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我想農

中國現代婦女內心苦悶何處訴？



村現在包產到戶比以前好多了，但還要投資機械化，普及教育，要把眼光放遠些，這錢再大也不虧。中國在航天工業、原子工業上花那麼多錢，而整個社會結構又那麼落後，必然會引起不協調。周恩來說過八〇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現在已是八六年了，什麼時候能實現，還很難說。

林：中國農村計劃生育難，殺女嬰現象也傳聞很多。李先念主席訪美時對此加以否認，是不負責任的。農村人口的控制應該想些治本的辦法，光靠行政力量強制不行，農民犧牲太大。中國農民之苦是外人難以想像的。要改變農村面貌，墮胎，強迫節育都不是好辦法，副作用很大，最好是在避孕方面下功夫。文革後，一切制度都打亂了，做手術，誰有膽量誰就做，不管技術如何。應當有限制。六十年代做手術很注意，生怕出了問題大家都不來做了，現在完全是命令，共產黨的老毛病改不掉。

多想辦法解決計劃生育 負面影響

王：計劃生育同三峽工程一樣，有一種共產黨幹部好大喜功的因素在里面，急于弄出個成功的數字向世界宣佈，這樣在方法上就隨便了起來。前幾年衛生部長錢信忠獲得聯合國人口獎時，就有幾位大陸訪問學者給「紐約時報」投書反對，提到這個問題。這種迅速用「指標」降低人口的作法，只有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能做到，這可以算優越性之一。

葉：至于超額出生的孩子，可以讓一些不能生育的人去領養，不必用各種方法讓其死亡，這樣會人道些。我下鄉時，大知青點附近

經常會有丟棄的死孩子。知青們很苦悶，發生關係後，又不能結婚，一結婚就回不了城市。似乎應該辦個機構負責把超指標的嬰兒送給沒有孩子的家庭。醫院里排隊要孩子的很多嘛。

胡：其實，共產黨的明文政策，也是不允許殺嬰的，但下面層層「落實指標」，逐級放大，誰都想報功。大陸報紙也常登載某某殺嬰被繩之以法的事，民憤很大，出了問題，共產黨總會找替罪羊出來，這是一貫作法，不光表現在殺嬰問題上。

總之，計劃生育出現的問題，我想與下面幾方面的原因有關：一，與共產黨「一胎化」的嚴格政策和「訂指標」的作法有關，與中國農村傳統文化中的男權主義，輕視女性的傾向有關，這不是一兩年所能解決的問題；二，與農村的現實經濟政策有關。包產到戶，有勞力就行。那麼男性顯然比女性強。而且勞動力越多越好。四，共產黨和人民都缺乏人權觀念。精卵結合後就算有生命，生下來的嬰兒更不能隨便弄死。從我記事起，就沒有感到有過人權，說抓就抓，說關就關，說殺就殺。這種作風甚至帶到海外。一九八三年在羅徹斯特大學，即鄧小平兒子所在的學校，有一個女留學生懷孕了，生下個小孩。她就把孩子包起來，扔進了拉圾桶里。結果拉圾工人發現後沿着血迹找到了宿舍，報告警方，以二級謀殺罪起訴這位女學生。可見中國人如何缺乏人權觀念。

人口與經濟發展關係探討

王：現在有一種論調認為，中國的人口太多了，

只能強制節育，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國內有一種說法，中國的人口如果不降下來，國民經濟就不能發展起來。所以人民要做出犧牲。甚至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不是制度問題，而是人口問題。

遲：我想，這個提法是對人口問題的一種誇大。人口的確是中國的一個很大問題，但它與經濟的關係問題，則要客觀分析，不能說人口過多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據我了解，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國家是荷蘭和比利時。在亞洲，最密集的地方是日本東京、大坂一帶，台灣也相當密集，因為台灣島的東半部是山區，人口都居住在西邊沿海一帶。中國大陸的江蘇南部是最密集地帶。而這些地區的經濟並不落後。就拿台灣來說，台灣的人口增長率並不大陸低，但台灣的經濟增長率還是相當高的，並沒有被人口拉下來。我想主要問題還是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不可否認，人口多了平均所得會降下來，但原因和結果不能顛倒。尤其是中國，人口政策的前後矛盾，和國家沒有民主生活有關。經濟上不去，教育也上不去，舊的人口觀念就沒法改變，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共產黨是執政黨，要負大部份責任。

要靠民主法治杜絕強迫的現象

胡：人口問題和其他問題一樣，最終取決于經濟與政治的改革是否能搞好。如果是民主法治的社會，不會出現這麼多強制現象，也不會出這麼多的問題。也不能說人口多，就必需用一些違反人權的強制手段。這樣無助于問題的解決。關鍵還是改變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從而提高教育水平，改變文

化意識。

葉：中國人口要控制，但不見得會有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從目前來看，我覺得適當的限制是必要的，到了強制墮胎和殺嬰的程度當然不行。但對今天的比較落後的農村地區，不採取一些強迫也是不行的，會導致不可收拾的結果。人口不控制，對經濟會產生影響，盡管不是主要原因。總之，沒有十全十美的辦法，怪毛澤東，他死掉了，掘了他的屍也沒用。

我想，要幫助農民解決他們的具體問題，才能讓他們願意少生，對封建意識，當然要教育轉變，但主要的還是前面提到的許多具體困難。勞力，老年撫養，「接戶口本」都是具體困難，困難不解決，大家就不情願，再好的政策都會變成強制性的。

像美國這樣，一個農民養四十個非農業人口，他就不需要很多勞動力了，而是需要高效率的機械設備。

王：我想問題還是制度，前面提到荷蘭，它的名字意思是低地。它的五分之一土地是圍海造田造出來的。它的人口密度比中國要高得多。這麼一個彈丸之地，每年鮮花和奶酪的出口量佔世界第一。人均產值八千美金，在世界上是名列前十幾名的。可以看到，人口問題並不是一個根本問題。人口是要控制，但要人道。

改變文化落後與政策導向糾正

林：我看農村適當的強制現在不可避免，如果等到八億農民覺悟了再計劃生育，可能又要強制十六億人了。我下過鄉，邊

遠地區的農民，你把他們形容成「植物人」都不過份，太窮、太落後了，不可想像這是五千年文明古國的人民。最近看了大陸影片「黃土地」，里面的人物憨憨的形象非常逼真，農民就是這個樣子。比如說，我一次隨醫療隊下鄉，晚上到的，第二天早上一開門，門口圍了一大羣人看城裏來的人，好像馬戲團到了一樣。我非常同情農民，一想起來，就想哭。他們這麼窮，這麼沒有文化，他們多生一個孩子，只是「鍋里多添一瓢水」而已，什麼都不想。發給農民避孕套，小孩都拿去吹汽球玩。有個農民更行，發的避孕套，不知怎麼用，也不好意思問，就放在鍋里煮了吃。懷孕後，才來怨我們發的藥不靈。

王：我想很重要的是政策。中國的政策常常是只想著達到目的，而不仔細考慮怎樣達到目的。這是沒有民主和法治意識的必然結果。中央做什麼，沒人來反對，也就不必考慮方法了，反正達到指標就行。下面也就不擇手段地去完成指標。

其實，可以考慮通過政策的制定，消除強制現象的出現。例如對重男輕女，可以制定有利于女性的政策，如獨生女升學優先，工作優先等。使人覺得生女兒會有利益，有好處。現在正好相反，女性升學分數比男性高，就業機會比男性低。

要注重現代生活觀念的引進

王：中國文化是一種虛偽的文化，把性的觀念搞得十分神秘，很多人完全沒有性知識。我在大學的婦產科老師講過一個例子，有

個農民來看病時說生不了孩子，經過反復誘導，才講出真情，他聽說女方來月經時同房才能生下孩子，正好鬧反了。在美國時，有位中學生回答什麼是性時，她說：「性是一種隱私」。我看可以拍一些性知識的電影給大家看，特別是農村地區。我下鄉時，只有兩部電影，「地道戰」和「地雷戰」，演多少遍農民都去看，也可以搞一些紀錄片，介紹西方的現代生活觀念，東歐，蘇聯的也行。人知道得多了，就不會守舊。也許比費力強制的效果要好得多。

林：八一年中國拍了一部電影，是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日本農村的紀錄片，對中國人影響十分巨大。農民更是恍然大悟，原來農民可以這樣生活，而且生活得這麼好。王：有一個辦法就是把困難告訴人民，讓人民自己討論，一方面人民更清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增加參與感、責任感。中國歷代統治者都認為「上智下愚」，搞愚民政策。有個寓言很好：一個國王召來一批智者，問他們怎樣才能把國家搞好。一位智者說，只要國王把權力給我，讓我辦教育，讓人民的聰明變成智慧，國家就會興旺。國王聽後笑一笑，出去找了幾個衛兵就把這個智者殺了。臨殺之前，國王告訴智者說，「我比你聰明，人民都智慧起來，要我做國王幹什麼」。

總之，人口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人口需要控制，但要注意科學方法與政策導向，還要注意文化觀念的改變，樹立人權觀念。可以說，計劃生育政策是必要的，但工作做得不是很好，造成負面影響很大。希望中國政府聽取各方面意見，努力避免和糾正各種強制現象的發生。

我目睹的「計劃生育」

(中國大陸訪美醫生) 伍正則

一九七〇年我從醫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陝西省某地接受再教育，直至一九七八年，曾先後在公社醫院及市一級醫院工作，對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有第一手的資料。

中國的人口問題，完全是中共錯誤政策造成的直接結果。中共大肆鼓吹「人多熱氣高好辦事」，而在農村，更實行錯誤糧食政策。自從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以後，中國農村日益貧困。社員辛辛苦苦勞動一年，分不到多少錢。然而社員的口糧，却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不管成人幼童，一律平等，每年大約二百餘斤。這點糧食，尚不夠成人半年所食，而在幼童，則綽綽有餘。因而在農村，以生孩子為生糧之道，小孩越多，糧食越有餘；沒有小孩，則沒有飯吃。

以至到了七十年代，人口問題日益嚴重。中國為緩解人口日益膨脹所造成的困境，便強制實行計劃生育。

人民公社是過去中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單位，公社醫院則對該公社的計劃生育工作負主要

責任。對於一個公社的計劃生育工作進行剖析，有助於全面瞭解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

我所在的公社，共有十六個大隊，總人口約有二萬餘人。各隊均有赤腳醫生和婦女隊長，專門負責計劃生育工作。由於各隊社員，全都集中在一個村裏，所以婦女隊長和衛生員對於該隊婦女的情況，瞭如指掌。每個婦女的月經，都有記錄在冊。任何婦女錯過了月經期，立即就會被發現。

公社和各大隊的人口增長率，均由上級派定。譬如一九七六年，公社黨委決定該年的人口增長率必須控制在〇·一%以內，則該年公社的總生育人數大約為三十餘人（除去同年的死亡人數）。公社幹部當然近水樓台先得月，爭先得到生育名額。各個大隊，每年還分配不到一個名額。有幸得到生育名額的，便千方百計爭取懷孕，而絕大部分婦女，可就遭了殃了。

已有兩個以上子女的婦女，必須進行絕育手術。由於農村的無知，丈夫一般都不接受絕

育手術，所以絕育手術的對象都是婦女。公社採用的辦法大致如下：

集中全部婦女絕育對象舉辦訓練班。由婦女隊長、衛生員和支部書記等人，反覆說教，輪番作戰，以黨的號召為壓力。如不服從，便有不響應和擁護黨的號召的嫌疑。直到這些婦女同意接受絕育手術，訓練班才告結束，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辦法之二是，生產隊不得給不接受絕育手術的婦女分配生產任務，或不得記工分。這一招甚是厲害，因為雖然工分不值幾個錢，但對於糧食分配卻極有影響。每年不積累一定數量的工分，是連基本口糧也分不到的。大部分婦女都不得不屈從於這一壓力。

辦法之三是對婦女的丈夫和父母舉辦學習班，實行社會主義連坐法。婦女不忍看着丈夫和父母受折磨，往往同意接受絕育手術。

已有一個子女的婦女，全都須接受一種節育手術。最簡單的是放置子宮內避孕環，這是當時本公社的標準方法。由公社醫院派出醫療隊，來到各大隊，集中全部應戴環的婦女，關起門來，每個人都戴上一個環。屆時隊裏真是如臨大敵，由黨員或爭取入黨的積極分子，帶領民兵，站崗放哨於各交通要道，令婦女們無處逃遁。

尚無子女的夫婦，如無生育證，是不准生育的。通常，某婦女一旦懷孕，立即就會被發覺。該婦女立即就被停止分配生產任務，由各有關人員進行說教，先由婦女隊長進行說服，如不同意，則由支部書記進行說服，如仍不同意，則由公社幹部進行，直到該婦女同意進行流產手術為止。農村婦女積多年之經驗，深知個中厲害，生下非法子女，沒有戶口，沒有口糧，可不是鬧着玩的。農村比不得城市還開

明些，公社書記、大隊支書，比當年的土皇帝更有實權，他們的話，是不敢不聽的。

流產的方法，對於早期妊娠，採用吸引刮宮。術後婦女能享受二十天假期，每天還照記工分。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不由你不聽從宰割。刮宮以後不管你同意與否，立即放置避孕環。不少婦女由於子宮腔內纖維化和粘連，以至後來無法取出避孕環。

中期妊娠一般使用水囊引產。水囊由導尿管和避孕套製成，放入子宮腔內，引起流產。

而我當時所在的公社，則採用一種草根，略以酒精浸泡以示消毒，隨後放入婦女宮腔內。這種方法，併發症極多。有一個婦女懷孕五個月，被迫接受草根流產，術後三天併發破傷風，救治無效，第五天即死去。死狀極慘，目不忍睹，所以至今仍記憶猶清。可憐的丈夫在煤礦挖煤，聽到消息，暈厥在礦井底下，險些喪失生命。

晚期妊娠的婦女，則進行人工剝膜，即用手指造成羊膜和子宮內膜的分離，然後，等子宮口開大後，用胎頭穿刺器刺入胎兒凶門，摧毀中樞神經系統。這種手術，一般不在公社醫院進行，而送到縣一級或市一級的醫院進行。

中國農村的重男輕女習俗，是由農村的經濟情況造成的。農民到了晚年，除了自己的子女，無人進行照顧。女兒一嫁出去，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是不能收回來的。所以只有兒子是農民晚年的依靠。因此，在中共強制實行一胎化政策下，農村殘殺女嬰的現象屢見不鮮。

我所在的公社，有一個當地「名中醫」，自稱能憑脈預測胎兒的性別。這種「中醫」，一般各公社都有。那些有幸得到生育證而又懷孕的婦女，紛紛前往診斷胎兒的性別。一旦被診為女性，立即自動進行流產，因而能得另

一次懷孕的機會。

大部分婦女，均避免到公社醫院分娩，而在自家炕頭生產。如果生下女嬰，立即溺殺。由於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包括丈夫、公婆和一般無知群眾），因此婦女生下女嬰，自己也覺抬不起頭來。所以在農村，殺害女嬰往往不會造成什麼大風波，一般是不了了之。

我在公社醫院時，曾親手搶救過一名八歲女童。父母因要一個男孩，竟將女童用敵敵畏（一種殺滅蚊蟲的藥品）毒死。該女童被送至醫院，早已救治不及。終因此事影響太大，其父母最後以殺人罪下獄，農村殺害女嬰的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本期專題

中國的人口政策

中國大陸殺嬰慘聞

（澳洲）朱林英

筆者去年十月回大陸，探望分別十九年的鄉親，聽到不少新奇事物。其中，殺嬰慘聞最令我震撼。

一般人都想有一個男孩子，但國家的人口政策，每對夫妻只能有一個孩子，不論第一個是男或是女，如有敢懷第二胎的，一定要強迫墮胎，反抗的就要強硬拉去打墮胎針。有些因第一個不幸是女孩，爲了要得一個男孩，就在妻子懷孕三、四個月時，千方百計找一隻漁艇，把妻子送到江的南岸蘆葦叢中，扮作漁婦直至孩子出世後再作打算。在廣州我的親戚還悄悄告訴我一件驚人的慘案：郊區有一家現役解放軍家庭，家中已有一個女兒，夫妻都很想生個男孩，不久妻子果然又懷了孕，臨產時居委

中共當局矢口否認無視人權，強迫實行墮胎，強制推行一胎化的政策。其實，稍知內情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值一駁的。上面祇要給一個指標，並指明不管「手段」，則下面的黨委書記、支部書記，便有恃無恐，什麼事幹不出來?!各地更定期召開計劃生育積極分子大會，獎勵那些採用最殘忍手段，因而取得最好指標的「積極分子」，互相交流經驗，使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能按中共的意圖「順利」進行。中國的嬰兒何罪，中國的父母何罪，而要遭此劫難?!

我希望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起來制止殺嬰暴行，救救孩子!

主任要陪她去醫院，誰知孩子就在途中出世，果真是個男孩，母親歡喜萬分。陪去的居委主任藉故背著孩子的母親把嬰兒扼殺死了，母親知後瘋狂號哭，立即奔回家中告知其解放軍的丈夫，其夫聞悉，悲憤過度，失去理性，最後將那居委主任的兩個男孩全部槍殺，以作報復，該解放軍事後被判入獄。據說此事流傳頗廣，中央亦大受震動，但嚴禁流傳。此後當局對這類事件就暗中放寬。

據中共人口資料顯示，解放初期中國人口只有五億多，後來由於毛澤東提倡「人多好辦事」「人多力量大」，因而一躍到今天十億五千萬，既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大陸歸來談統一

● 人物專訪 ●

鄭保羅先生訪問記

● 本刊記者·陳洪林 馳遠整理

擋不住的民主·封不住的民聯

● 編者短評

鄭寶羅先生，河南省人，美籍愛國華僑，原在一家電腦公司任職，現因健康原因退休。為促進中國統一，他發起「中國民主統一促進會」，主張以推動海峽兩岸的民主化而促進中國的統一。中國之春運動發起後，他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後來加入中國民聯，決心為推動中國的民主和統一，與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大陸人民共同努力。

中國駐美使領館對鄭先生一直進行統戰，並勸阻他不要與中國民聯來往。鄭先生據理力爭：「你們叫我去聯絡國民黨的官員，為什麼我不能與民聯來往？連民聯都不能容忍，你們的統戰怎麼能夠自圓其說？何以取信於民？」鄭先生曾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文章，以行動拒絕了中國使領館讓他迴避民聯的無理要求。當然，為了工作上的方便，鄭先生並未公開暴露他的民聯成員身份。

中共對鄭先生的統戰不遺餘力，終於促成了鄭先生去年秋季的大陸之行。臨行前，鄭先生與民聯總部曾多次磋商。鄭先生帶着促進中國大陸「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決心和信心，踏上了國土，展開了一連串的推動中國民主的活動。在去

年「十·一」的人民大會堂國宴上，鄭先生與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葉飛將軍進行了非正式的會見和交談。鄭先生向葉飛副委員長義正辭嚴地表達了廣大華僑（當然也是中國民聯）的意見：中國大陸只有促進民主和法治，才能有效地推動祖國的統一。

中國民聯並不是單純由大陸留學生組成的團體，民聯中，也有很多像鄭先生這樣關心中國民主進程的華僑和港台留學生。擁有外籍身份和港台身份的盟員，可以發揮獨到的作用。我們熱切盼望大陸、港台留學生和華僑聯合起來。

現在，鄭先生公開了他的民聯盟員身份，他希望今後仍能赴大陸參觀、訪問。中國駐外使領館能否再給他簽證？這無疑是對中共統戰誠意的一個考驗。我們順便告勸北京當局：民主是不可阻擋的潮流，你們企圖孤立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一切努力都終將是徒勞的。因為，每年、每月、每天，不知有多少鄭先生式的愛國華僑，出入中國大陸，為中國的民主化默默做着工作。我們在此謹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敬意。

記者甲：鄭先生，您最近回國一定有很大的收穫。您是什麼時候回去的，在國內住了多久，去了哪些地方？

鄭：我是去年九月中旬應僑辦之邀，作為一個擁護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促進民主和平統一的個人身份回去的，主要行程表排在北京。回去之前擬訂有幾種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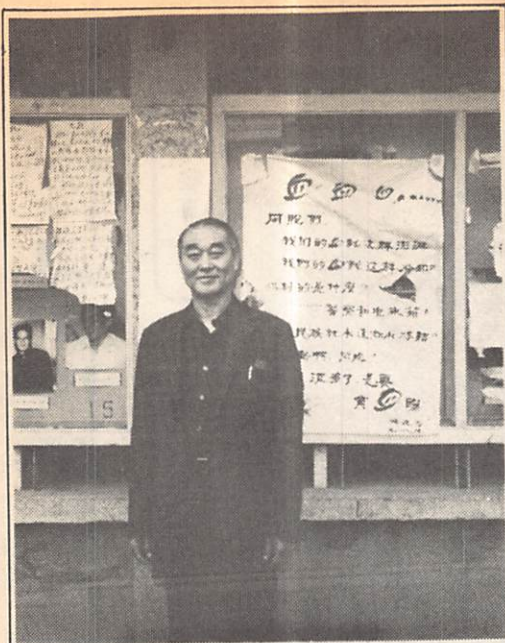
- 一、想親自去看看國內改革的真實情況。
- 二、想對國內追求民主、法治之民運青年（魏京生、傅月華、劉青、王希哲、徐文立等）說幾句公道話。促請司法、監察部門重作處理，提前釋放，並反映海外一般人士的看法。
- 三、就個人欲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目標和作法與國內有關人士交換意見。
- 四、介紹台灣真實情況，並作客觀平實的分析與比較。
- 五、建議中共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並探討國內對於和平統一之誠意。

記者甲：是否可以談談國內改革之情況？

鄭：回去幾個星期與上、中、下，工、農、兵、學、商各界均有所接觸。目前農村改革是相當成功的。以我的家鄉河南農村為例，八〇年我回去時，農村大鍋飯、集體勞動，生產搞不上去，農民生活很困難。這次回去，農村面貌全然改觀，每人平均約一畝半田，可是，家家戶戶都吃白麩，沒有吃窩窩頭的了。衣着方面都很整齊，再也看不見補丁了。如果不是親自目睹，真是不敢相信。城市建設，成也斐然可觀。以北京為例，市政建設，突飛猛進，充滿欣欣向榮的氣象。我看可與台灣六十年代情況相比擬。農村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雖然歸功於「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而在我看來如以「對外開放、對內鬆綁」來形容則更較恰當。至於經濟改革，問題仍然很多，

例如，最近海南偷運大量汽車進口案，和福建省的傾銷假藥案，都是涉及面很廣，並且均有後台。高幹黨員犯了法，有的甚至只給個黨紀處分就算了，法不上大夫。因而無形中形成了一種特權階級，對這類集體經濟犯罪的行為，只在問題揭露後才「抓」一下是不行的，必須要實施民主監督和依法懲治才是正道。換言之，經濟改革之成敗，取決於民主、法治基礎之確立與鞏固。其次，只是開放沿海城市也是不夠，還應當把門開得更廣一些，在城市改革中也要堅持鬆綁，例如，有很多幾千人的工廠，

鄭寶羅先生參觀北京大學時，正趕上去年「九、一八」大學生遊行事件。鄭先生在學生們所貼的大字報前留影。大字報上寫道：「血、血、血……同胞們，我們的血就這樣澎湃，我們的血就這樣冷卻？得到的是什麼？——警察和電冰箱！中華民族就如此凍結？奮起啊，同胞！血流多了，是要貧血的……！」



根本沒有和外商接觸之權利，甚至連商談本廠產品價格，也均由省級政府包辦。所以國際貿易方面，與自由貿易地區比較，相差甚遠。河南省八千多萬人口，抵得上歐洲好幾個國家，可是對外貿易額，却不能與一個西德相比。要改變這種情況，非得鬆綁不可，把權利下放，逐漸實行自由貿易體制，只有這樣，才能把經濟搞活，也是消滅貪污腐化特權的有效方法之一。另外，大陸的官僚機構體制也非改不行，否則，中國無窮盡的資源與廣大的人力優勢將沒法發揮。

記者甲：剛才談到了民主法治與經濟改革之關係，現在能否談一下國內經濟改革與民主統一的關係？

鄭：我不僅是民主統一的擁護者，也是民主統一的積極促進者。今天的統一問題主動權完全操之於大陸，如果大陸經濟改革成功了，人民生活接近台灣生活水平，將來統一就很有希望，但是，如不以民主、法治支持經濟改革，則經濟成效是沒有保障的，統一也是非常遙遠的。

記者乙：通過各種接觸，了解了很多情況，您對大陸改革有沒有信心？

鄭：我對大陸實行改革，不是完全沒有信心，而是存在許多疑問，只有從根本上健全民主和法治，才能保證改革的成功，否則就是捨本逐末。據說，大陸為了改革，促進四化，強調照顧知識份子，可是，據我所瞭解，很多祇是口惠而實不至。從人民日報經常報導知識份子的待遇可見一斑。

記者甲：您作為一個華僑團體的召集人，這次回去，是否也宣傳了你們對國事的主張，並就這次回去的幾種想法與有關人士探討過？

鄭：不但探討過而且還坦誠長談過。我們

在一九八二年八月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愛國朋友們成立了「中國民主統一促進會」，本會宗旨見中春卅一期。我一向主張「心平氣和論國事，攜手合作建中華」重新建立一個真正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大中華，以達到民有、民治、民享的目的。並主張軍隊國有化，反對內戰。他們對於我提出的主張，並無異議，而且還說，他們正朝着民主、法治這個方向走，祇是由於多年來受極左思想的束縛和影響，沒有海外僑胞想的那麼快。我非常歡迎他們這種坦誠的態度，於是，我順便提出海內外中國之春問題。我會問他們：中國之春所主張的目標和我們的主張全一致，你們既然接受我的看法，為何又把中國之春打成反動呢？他們回答說：「你是愛國僑胞，談話誠懇、坦率；」而中國之春却是藉此要來打倒我們，當然我們就不得不有所防備。「這樣的答覆似難自圓其說，當然也就缺少說服力量了。我說，中國之春這些愛國青年，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的觀點可以說和中國民主統一促進會的看法毫無二致。例如：(一)他們堅決主張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二)反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三)不主張推翻共產黨；(四)主張台灣應與大陸溝通。假如連你們自己培養出來的青年所提出的這些最客觀的見解，你們都不能容納的話，而國民黨則是要打倒共產黨的，你們却要與他們談判、合作，他們怎能信任你們的承諾呢？這就是你們對實施民主容納缺乏誠意的表現。因此，我不得不大聲疾呼，要為海內外從事民主運動人士講句公道話。我是站在公正的立場，實話實說，台灣現在很多黨外雜誌批評國民黨非常激烈，有的甚至直接評論蔣經國先生，措詞非常尖銳，國民黨都能容忍，而你們對待中國之春提出的批評意見，却

不能容忍，有什麼理論不恰當之處，你們可以批評，但不能動輒以「叛國」、「反動」等大帽子相威脅。我告訴中共官員，我們這些憂國憂民的人士，願為統一貢獻一份力量，願到台灣去做工作。可是，我們到台灣後，國民黨如果問我們，中共連國內的民運人士都容忍不了，怎麼能容忍國民黨？怎麼能相信中共的統戰誠意？我問中共官員，我該怎麼回答？

記者乙：想了解一下中共對從事民運人士的態度，例如你要求釋放魏京生，他們有什麼反應？

鄭：我所接觸到的，例如：人大常委、政協副主席，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等，或者說：權位雖高，但無權過問這一類具體問題，或者是：對於這樣敏感問題，諱莫如深、誠惶誠恐、怕擔風險。最後總是一句話：願把我意見向上轉達。

記者甲：有沒有談到最高領導人有什麼指示？

鄭：沒有，當然沒有，這一點他們就更不便談了。這就是說，國內在民主深度及素養方面，遠遠落後於台灣，需要大踏步地向前邁進，不能只是在假、大、空方面做文章。當然大陸也有許多卓越成就的一面，例如尖端科學、各項運動成就和國際地位都比台灣強的多。

記者乙：你是否直接向下層宣傳過你的主張？

鄭：我去過北大和清華，去的目的並不是想鼓動學潮，而是想就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問題，真正了解一下青年們心裡是怎樣想的，因為國內幹部是不肯或者不敢說真心話的。據我與學生們接觸體驗到的，他們都想瞭解一下台灣的自由、民主、法治之尺度。很坦白地說，也沒有全為台灣說好的，只是反映真實

情況：在台灣大學生可以自由轉學、轉系，可以自由生活、自由找職業、自由遷居，如果想當官，須經政府考試合格才行。其它，只要不犯法，批評政府，也沒有誰管。他們以驚奇的眼光對我說：你說的如果真實的話，那我們這里可差遠了。我們大學畢業後：(一)自己不能找職業；(二)在國內很少有發揮個人才能的機會；(三)分配工作還要走後門。所以，青年們除了在學校上課時，也經常受到不必要的困擾。這是學生親自說的。

記者乙：你對將來國內實施民主、法治有信心？

鄭：儘管我對將來國內實施民主和法治有憂慮，但我是有信心的，因為：(一)實施民主、法治是全民一致的要求，為什麼？海內外中國人逐漸認識到一條道理，即在民主和法治制度下，人人都可以監督政府施政。例如選鄉長、縣長，選民對他有相當了解才投他的票，任職以後，選民也不時要對他的政績加以考查，即便他有違法亂紀的念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他也不敢輕舉妄動。這就是實行民主的最大優點。但在極權體制下，一個鄉長、縣長在甲鄉、甲縣貪污腐化、民怨沸騰，無法繼續戀棧，他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只要有後台，受到上級的賞識，他又可以調到乙鄉、乙縣，依然故我，好官我自為之。就全國來看，接班人不經人民選拔和監督而由上級圈定，是否真能承擔重任，也大成疑問。這就是極權體制的最大弱點。(二)國內青年朋友對我說，他們不再「文革」時期那樣上邊說黑，就是黑，說白，就是白的青年了。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對週圍事物具備了自己的判斷力。他們熱愛自由，對民主、法治和人權有強烈要求，青年們



鄭寶羅先生(右)在天安門廣場馬恩列斯像前憤怒地舉起拳頭，表示抗議。他說：「馬列學說禍害了中國，我們要驅逐馬列，恢復中華！」

是將來實施民主、法治的主力，所以我對將來也是充滿信心的。

記者甲：你這次回去正值人民代表大會開會，能否談談這方面的情况？

鄭：我只是看到表面現象，例如大會期間接待海外歸來的華僑和外籍，開歡迎會等，接待工作做的不錯，至於內部情况我是不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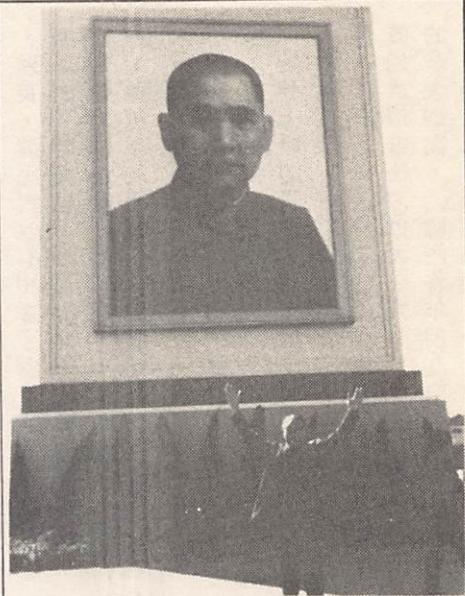
記者乙：有無列席會議？聽到什麼信息？

鄭：在極權體制下，記者都不讓參加，何況外人。愛國僑胞回國來(有的是應邀去參加國慶的)除了農村改革、實行開放政策所取得的成績外，還想知道的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幾十年，究竟為人民謀了那些福利？在實施民主

、法治方面，除了人大制訂了一些有關的法律外，是否已採取依法辦事的具體行動？在保障人權方面，又做了那些事？待已取得相當成果，然後再進行宣傳，則較易取信於人。我在北京期間總是聽他們談宏觀問題，這根本是畫餅充飢。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講的：「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橋樑」中國順着天梯已經上了天堂，結果又如何呢？毛說的天堂却原來是這般模樣，還不如資本主義的「地獄」好。馬、列主義要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的話，毛澤東在大陸上統治了幾十年之久，早應跨入先進國家行列了。談到這裡，我要提出一個許多愛國僑胞非常反感的問題，即在天安門廣場把馬、恩、列、斯像，和中山先生遺像並列，大家都感到很刺眼。如果國民黨在雙十國慶時掛起華盛頓、林肯、邱吉爾的像，北京又做何感想？一定罵台灣賣國。我已向北京建議，中山先生是全國人民愛戴和尊敬的一代偉人，希望下次回國時，不要再見那些洋鬼的像和中山先生遺像並列，何況斯大林的像在他本國都早已摘下去了。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光榮之歷史和文化，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援引中國先賢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義，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又如：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治國建國之宏圖方略等等，這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所能望其項背的。我們炎黃子孫要尊敬的人多的很，如古聖先賢、歷代民族英雄、現代抗戰名將比比皆是，又怎麼能讓外國人侵佔天安門廣場呢？

記者甲：我們也想聽聽您關於統一問題的意見。

像每一位僑胞一樣，鄭寶羅先生對孫中山先生無比景仰。這是他在天安門廣場孫中山先生像前舉手敬呼。



鄭：關於統一問題也是我這次回去談話的重點之一。我是堅決反對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訂新憲法，達到和平民主統一。鄧小平先生說：「一、我們放棄武力統一，等於中國永遠也不能統一，台灣可以高枕無憂。二、台灣問題屬於中國之內政，不能在美國壓力下，來放棄我們的統一。」我個人認為：（一）順應海內外的民意，與美國壓力無關，這是中國內政；（二）如果放棄武力統一，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國內，對北京都有很多好處。就國際方面來說，擁護和平也是北京三大政策之一，這也是符合愛好和平的主張，亦可阻絕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就國內來說，可以爭取台灣人民的向心力和信任。這無異是：鬆弛了千千萬萬海外華僑。（四）可宣佈和平使用台灣海峽，從而把有形力量推到台灣海峽對岸。反之，如果要武力解決台灣的話（胡耀邦對日本訪問團說過：到一九九五年左右，一定要統一台灣），那將遭到全民的反對。假如北京真的要武力統一中國的話，我認為應首先把在中俄戰爭中失去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大片土地（有幾十個台灣大）收回來，然後再統一台灣，好在台灣仍是中國人自理的嘛！而國、共又是兄弟黨，君不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還是共產黨起草的呢？

記者甲：您這次回去談到一國兩制問題嗎？

鄭：這是我個人代會葉飛副委員長所談的主要內容，他是極力推崇一國兩制的。我說，一國兩制的構想不錯，但不能做為先決條件，因為台灣情況和香港又不一樣，也可以稱之為一國三制，或多制。鄧小平先生說過：談判要以平等地位進行。然而，「四個堅持」的存在，台灣就沒有談判的興趣。因為四個堅持中有一條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那和所謂平等或對等談判不是有矛盾嗎？

記者乙：大陸說過台灣可保持六十年不變，你對此怎麼看？

鄭：這種保證就不是國家走向長治久安應走的道路。所以，一國兩制在台灣看來是不可靠的。侈談什麼保證若干年，也是一種偉大的空話。你說六十年，那國民黨也未嘗不可提出，再過一百年你若實行民主法治，我也向你保證如何、如何。我認為北京在這方面給人的印象還是缺乏一些誠意。

記者甲：您對台灣的三不政策，有何感想？

鄭：台灣的三不政策（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是最蹩腳的低下策。因為（一）台灣的前

途是在大陸，國民黨也知道這一點。應該主動地和大陸溝通，並積極地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主張。可惜國民黨當局沒有這種智謀和魄力。國民黨領導人應該效法中山先生當年北上參加國民會議的勇氣，主動向中共建議，邀約各黨派民主人士及華僑代表召開國民會議，制訂新憲法，使中國走向民主法治的坦途，才是建國之基本道路。(二)現在時代潮流是朝着這一方發展，如果再堅持三不政策下去，只有使自己處於更孤立的處境。(三)既然台灣當局對於目前成千上萬的人，取道香港、日本、美國，回到大陸上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為什麼不正式開放呢？正式開放還可以爭取民心呢！(四)就目前狀況來說，溝通是對於台灣有利的，因為台灣在實行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權方面雖然仍有許多缺陷，但比大陸強的多。溝通以後，可以使大陸人民了解到台灣的真實情況，會要求更多自由民主，迫使大陸更開放。這個有利的因素隨着時間的推移，也許逐步消失。所以說，時不我予，現在正是台灣當局勇敢面對現實改弦易轍的時候了。(五)再就通商來說，大陸是個很大的市場，現在日本、韓國的產品都進去了，而台灣產品並不次於它們的，為什麼還不主動爭取呢？

對於統一問題，就海外僑胞來說，大家應當來做一個公正的評判員而不要做搖旗吶喊的啦啦隊，因為啦啦隊只片面地站在一邊。公正的評判員是：兩邊正確的都應肯定和鼓勵，錯的就要堅決客觀批評。雖然目前我們扮演的這個角色是不受歡迎的，但是希望總有一天，兩邊的球隊在公正裁判員的評判下，順利圓滿地完成這場歷史性的比賽，所說歷史性的比賽就是國家的民主統一。我在去年五月份「中國之春」第二十三期上，曾呼籲在金門、廈門分別

成立通訊站，先從兩岸人民互通着手，消除隔閡，建立互信，爾後再談統一問題，或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希望台灣當局能善納忠言。

記者乙：我們現在正在提高我們雜誌的素質，廣泛地徵求意見，希望您給予批評和建議。

鄭：目前「中國之春」是越辦越好，這是大家所公認的。希望大陸不要把中春再往國民黨那邊推。對於愛國青年應當多開導和容納，不對的地方，及時給予批評，更不可採取「文革」時期的那種壓服手段，你不聽我的，就給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台灣也不要再把「中國之春」說成是中共的改良派。

我個人來看，「中國之春」批評大陸並無惡意，有時措詞尖銳一點並不為過，所說都是事實，你們經過十年浩劫之後，認識到唯有力行民主法治，才不會再出現四人幫之局面，才是富民強國之正途。你們都是愛國青年，這一點我是了解的。正是由於我了解你們，所以我願借此機會向你們提幾點建議。(一)在中國民聯吸收成員方面，希望再開些，凡是愛好自由民主人士都應該主動邀請他們參加。以免外界誤解民聯只是一個大陸留學生的民運組織。(二)對於台灣方面，「中國之春」的青年朋友們是缺少了解的。因此，提出某類批評，更應慎重，千萬不可以偏蓋全或一筆帶過，那是不公平的。(三)我們提倡民主，在一個民主團體中，大家有不同意見也很正常，分裂也在所難免，但要有限度，像這次林希翎女士不負責的言論，對「中國之春」影響就不小。知道林為人的，當不致受她的影響，但對於不了解她的人，對她的言論就會感到迷惑不解。希望你們今後對類似事件要多加小心，免再鬧笑話。

記者甲：我們都是剛來不久，希望您簡單

地做一下結論。

鄭：(一)大陸方面：我們希望它繼續開放、鬆綁，好的地方我們要鼓掌、叫好、加油，不對的地方要批評建議。民主、法治體制之建立，才是國內改革當務之急。關於統一問題，我曾致函鄧小平先生，促請公開宣佈和平統一可行方案。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我曾詳作分析比較，對中共有很大的利益。那麼，中共有什麼顧慮呢？是不是中共欲保留此一問題，作為將來內部權力鬭爭的一步棋子，就不得而知了。假如鄧先生再活二十年，國內開放，改革持續下去，我對和平民主統一，具有堅定信心。不過，當前關鍵問題在中共指定之第二、三梯隊，是否具備治國之才，萬一鄧先生百年之後，極左與極右派是不是會進行反撲，則前途未敢預卜。

(二)台灣方面：萬不可再堅持三不政策，現在已是勇敢面對現實作明智抉擇的時候了。民主統一，兩岸互通，這是時代潮流所趨，也是人心所向，如再堅持三不，必然使本身陷於更不利地位。台灣前途在大陸，這是不必爭論的共識。國民黨為了本身利益，也應主動地與大陸溝通，何況台灣地區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權保障方面，均較大陸領先一着，一旦溝通，還可對大陸的民主法治改革起促進作用，從而造福於全民，又何樂而不為呢？

(三)華僑方面：呼籲海外愛國僑胞們認清時代潮流，現在是「華僑為救國之母，和平行進救中國」的時候了。大家一起來擔當一位公正裁判員，不再做一面倒的啦啦隊。這對中國民主統一、和平建國，將起到極重要的作用。

最後，願借一位名詩人克倫思吉先生的話：「人們敞開的手臂將帶來和平。」作為對國共兩黨的建言。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國內民運團體工商組織 不斷發展

中國民聯國內某些分支機構及其它民運團體，利用去年的經濟改革形勢，建立起一些商業、貿易和小工業組織。這些工商組織以個體或集體企業的面貌出現，具有如下作用：

- 一、聚集民運骨幹人材；
- 二、為將來民運的發展和合法活動籌措基金；
- 三、以合法方式與其它民運人士和民運團體聯繫；
- 四、以實際效益顯示私有經濟的活力，吸引國營企業的幹部脫離原來企業，這樣，既能解決一部份國營企業幹部過多的問題，又壯大了民運力量。

西德聯絡站致函胡耀邦

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問西德。中國民聯西德聯絡站於六月十一日向西德各界散發了一封致胡耀邦的公開信，

要求在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與此同時，國際特赦組織西德支部的成員，也在胡耀邦訪問西德期間，散發傳單，呼籲釋放魏京生和徐文立等在押的民運人士。

中國民聯西德聯絡站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先生鈞鑒：

首先我們——群來自海峽兩岸，在西德進修的留學生——對您前來西德訪問表示歡迎！

我們都知道，近年來您和其他中國政府領導人一直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為了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您個人也付出了相當的心血，多次出訪一些先進的工業國家，比方說：日本、英國和美國。我們相信，從歷次的這些訪問當中您一定也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令我們擔心的是，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從這些訪問中清楚地認識到現代化國家的行政管理技巧和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今天我們中國所缺乏的正是上述兩項先進國家賴以強盛的長處。做為一個曾經生活在民主和民主兩種截然不同社會裏的人，我們深深地體會到，民主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不過却是至今所能找到的最理性的人類生活方式。這一點我們相信有很

多人都可以跟您提供見證。因此我們深信，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不是經濟、科技或是軍事的不足，而是中國落伍的政治。我們也始終相信，沒有民主政治，您的心血將是白費；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中國終將是落伍的中國！

根據以上的這些信念，我們誠懇地向您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請多收集有關民主國家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國家行政管理方面的資料，並加以閱讀、吸收！
2. 請盡力協助釋放在押的民運人士，例如：魏京生、徐文立、劉青……等！
3. 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條款，允許「中國之春」在中國出版、發行！
4. 請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的條款，允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中國合法註冊，公開活動！

最後我們在此祝您這一次歐洲之旅收穫豐富！

旅途愉快！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西德聯絡站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

「美國之音」就徐文立案 發表社論

美國政府官辦電台「美國之音」，六月卅日以前「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為題發表社論，闡述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人權問題和經濟改革的看法。這篇標明「反映美國政府觀點」的社論，特別強調了徐文立案，值得人們注意。「美國之音」在發表該篇社論前，中國民聯曾送去

一批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社論全文如下：

自毛澤東的統治十年前結束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有了相當的改善。但是，最近二名北京大學的學生，因致請政府改革而判刑七年的事例說明，中國十億人口所享有的自由真是微不足道，而這些自由，在民主社會中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該搭學生被囚的事件表明，中共當局對待那些批評共產黨或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毫不留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生被囚事件正好是在北京領導人宣佈放寬學術討論——新「百花齊放」時候發生的。新「百花齊放」運動使人們回想起五十年代中期一段相似的言論相當自由的時期，它被毛澤東於一年之內予以禁止。這也使人們想起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允許人民大鳴大放而將大字報貼到北京「民主牆」的事。正如鄧在一九七八年所言：「如果群眾有怨氣，我們必須讓他們發出來。」但在一年之內，鄧改變初衷。一九七九年末，民主牆被關閉。稍後，鄧小平宣佈：貼大字報的權力必須從憲法中剔除，因為「反革命分子」利用它破壞「安定團結」。

民主牆時期的兩名被囚者最近又上了新聞。那時，魏京生貼出大字報，揭露政治犯遭受刑求。他甚至走得更遠，要為中國的民主而獻身。魏京生被判刑十五年。徐文立亦被判刑十五年，他的「罪狀」之一，是抗議對魏京生的嚴厲判決。徐的妻子近來報告，徐被囚於單身牢房並不許與家人見面。這種額外的懲罰顯然是徐文立的「獄中手記」偷運出獄造成的。

鄧小平在禁止大字報時，曾指稱，言論自由對其經濟發展的計劃構成了威脅。然而，全世界的經驗表明，個人自由為經濟發展創造了

條件，而壓制自由則限制經濟的發展。那些想造成經濟起飛，却同時又壓抑民衆政治權力的人，兩種目的都不會達到。如果基本的民權和政治權力獲得保障，如果民衆再一次像西單民主牆時期那樣獲得表達的自由，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會出現一個飛越。

留日學生閱讀中春受阻 留學生致函抗議

日本最近發生了一件令廣大留日學生深感氣憤的事，那就是，中共當局與日本親共人士勾結，阻撓中國留日學生閱讀中國之春雜誌。中國公費留日學生被控制得較緊，大家集中在官方認可的宿舍樓集體居住，購買中春雜誌很不方便。此外，他們生活費有限，一般無力長期訂閱中國之春。

由於華僑捐款支持，民聯日本分部定期給一部份公費留學生寄贈中春，受到留學生們的歡迎。由於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在留學生中的影響日益擴大，使中共黨內保守派大為恐慌。他們串通日本左派親共人士，在中國留學生集體宿舍樓收發室大作手脚，把寄到的中春雜誌收集起來，不放在留學生的信箱中，而是成批偷偷扔掉。這種偷偷摸摸的行徑，引起了廣大留學生們的不滿，他們向中國民聯總部和日本分部反映情況，要求把中春雜誌直接寄到所在院系。我民聯日本分部已應留學生的要求，做了相應安排。

下面，是一名中國留日學生揭發此一事件而致中國民聯的信：

民聯：

自你們成立以來，我們一直關注着你們

的活動和發展。從你們日益成熟的表現，我們看到了我們苦難的祖國在未來實現民主的希望。我們雖然未能公開加入你們的行列，但我們回國後，會在各個崗位配合你們的工作。

這裡，我要向你們揭發一件令人氣憤的事：你們給我們留學生宿舍定期寄的中春雜誌，被傳達室集體暗中沒收，統統丟入了垃圾箱裏。據同學們傳，這是中共與日本親共派串通幹的，目的在於隔絕民聯與留日學生的聯繫。然而，隻手遮不住太陽，我們需要你們的刊物，需要民主、自由的精神食糧。有的留學生半夜裏又從垃圾箱中撿回中國之春雜誌，偷偷在留學生中流傳。

為了保障中春雜誌能夠及時到達我們手中，我建議你們將中春直接寄到各個院系。

願寄一些留學生的名單。
民主必勝！

留日學生 歐陽凱

六月廿九日

香港居民發起簽名運動 反對建立大亞灣核電站 民聯香港分部積極參與

北京政府關於在香港附近大亞灣建立核電廠的決定，最近在香港引起一場政治風暴。一百多個民間團體（包括中國民聯香港分部）聯合組成「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發起香港居民簽名運動，截止目前，簽名人數可能已經超過百萬。這次反核行動，促成了香港左中右各派大聯合，及時反映了香港民意，

是香港居民自覺意識覺醒的重要標誌。

這次香港居民的反核運動，對中共當局是一個巨大考驗。北京是否在一九九七年之後尊重香港民意？這次大亞灣核電廠興建與否，成了一块試金石。如果英國當局尚未撤離香港之前，北京就置香港民意於不顧，那麼，北京關於一九九七年之後的一切承諾，就變成完全空的空頭支票了。

中國民聯香港分部呼籲民聯各地分部、支部、聯絡站及廣大盟員，通過一切手段向北京當局施加壓力，停止修建大亞灣核電站。

中共高層內部，對是否修建大亞灣核電站存在嚴重分歧。據可靠消息，趙紫陽和田紀雲極力反對，而李鵬却力主興建。

爲了表達中國民聯對香港民意的全力支持，本刊特發表香港一百多個社團組成的「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致全港市民書。

請簽名支持停建大亞灣核電廠
致全港市民書

(一) 為什麼要求停止興建大亞灣核電廠？

(1) 蘇聯發生核電災難後，世人認識到核電廠確實存在着極大危險，一旦發生意外，人命及財物損失浩大，為禍數十年以上。蘇聯已劃出核電廠週圍三十公里為極度輻射地帶，絕不能再適合人類居住。而三十公里以外也受着略低程度之輻射污染，相信再沒有人在附近定居。反觀本港沙田、馬鞍山、大埔、粉嶺、上水等地祇距離大亞灣核電廠三十三公里，而尖沙咀也祇有五十公里，故當發生重大事故時，全港皆被波及。況且本港人口密集，沒有措施可以緊急疏散市民。而當有意外時，必有大混亂，居民祇能向西南方向逃亡，除了大嶼山外別無地方棲身，但大嶼山也祇距大亞灣七十公里，並不顯得安全，而大嶼山也不可能容納全港

五百五十多萬市民。

除了人命傷亡外，核子意外對本港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實為鉅大。今次蘇聯有大片土地因核子意外而成為荒地。若大亞灣核電廠有大意外，全港絕大部份商業中心、高樓大廈、經濟建設將不能再使用，本港將成為廢墟，再無法有今日之繁榮。

故此，本港因為地理環境、人口密集、建設集中、祇要有一次核子意外，便會造成永遠不能補救之禍害。本港實在經不起單單一次的核子意外。雖然核電廠發生重大意外的機會不高，但因為本港因意外而要付之代價太大。核電廠對本港將構成極大之威脅。

(2) 有關方面至今仍然未公開核電廠的安全資料，令市民沒有確實的安全保證。以美國為例，一家公司欲興建核電廠，必先呈交一切建設工程及安全設施的文件與由政府委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經審核通過後，再召開公開聽證大會，由政府委任裁判團，聽取公眾人士之疑問及核電公司之答辯。假若裁判團判決核電廠能滿足公眾安全要求，核電廠才得以興建。而建成後再由政府獨立委員會檢查核電廠確實按合約興建做妥一切安全設備，而又一切設備合格及操作正常，這才批准核電廠正式投產。反觀大亞灣核電廠完全沒有經過獨立委員會審查其安全標準，也沒有公開聽證會向市民交代，一切安全文件皆保密，實難令市民對安全有信心。

(3) 除了嚴重意外，核電廠會經常發生小事，故，引致輻射氣體或液體外漏，污染周圍環境。輻射並無絕對安全水平，任何輻射皆可能損害人體內細胞及遺害後代。有些輻射物體之活躍危險期更達幾十年至經百年之久。當輻射洩漏日積月累，便嚴重污染本港水域、食水、海

產、蔬菜、家禽等，長期損害市民健康。

(4) 本港電力充足，且可繼續發展安全可靠之煤電廠，無需購買大亞灣核電廠七成電力。本港市民祇獲保證核電售價在頭六年會比煤電為低，而未能獲保證以後之核電比煤電便宜。故此大亞灣核電廠在經濟方面是否對香港有俾益尚成疑問，但對本港安全却構成嚴重威脅。

(5) 由開始至今，香港政府完全忽略安全問題。現時港府所聘之顧問公司，就大亞灣核電廠之各種大小意外之可能發生機會，及各大小意外對香港之影響，與及發生意外時之緊急應變措施這幾方面，還未完成報告。可是港府早已批准「香港核電投資公司」成立，作為該公司向銀行貸款五億港元之擔保人，並且承諾向核電廠購買七成電力。本港市民安全健康全被忽視。

基於以上五大原因，我們要求立即停止興建大亞灣核電廠。

(二) 簽名運動是否能夠改變有關當局之決定？

每個政府都為人民利益健康着想。負責任的政府都會聽取民意，執行市民同意的政策，不會一意孤行而引起大眾對政府之反感及敵意。若本港市民齊心不贊同興建核電廠，有關當局必再三思，不會草率執行違反當地人民意願之政策。雖然已簽好購買核電廠設備的意向書，但最後合同還未簽妥。況且中國政府可以另覓地點興建核電廠，而沒有任何損失。

可是有關當局要肯定香港市民是否都不贊成在大亞灣建造核電廠。故此要有全港市民的支持，才能改變建核電廠之決定。你的簽名，是十分重要的。請簽名支持，並邀請其他人任簽名，爭取本港不受核子輻射威脅。

香港「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
謹啓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

對否定的全面否定與再否定

文化大革命運動二十年



中國內陸研究生·美國一蔡可風

編者按：一九八六年，是文革發動廿周年，結束十周年的紀念年。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評毛和評論文革是無法分開的。本刊自刊出懇求評毛和評論文革的廣告以來，收到熱烈迴響。由于稿件較多，本刊特開辟「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的「連續專題」，準備連續數期發表有關方面的文章。讀者有何新的見解，本刊仍歡迎來稿，凡有關文革、毛澤東、「五·一六」及有關

從一九六六年發佈「五·一六」通知而掀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經是二十週年了。文化大革命，無論在中國共產黨內還是黨外、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國外，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時期。但是，在中國現今條

問題的學術論文，評論，資料，回憶錄和文藝作品等，本刊均表歡迎，予以陸續發表。

我們之所以特別提及「五·一六」問題，乃因為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案，是文革中期波及全國的一個大案，受害的人不計其數。對於這樣一個大案，中共從未給予正式平反。我們在此強烈呼呼，凡受「五·一六」之害的人，都應站起來講話，討回社會的公義。我們盼望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件下，對於這一問題，仍欠缺一個適當的環境、條件去做充分、認真的討論。

在中國大陸，對這場文化大革命的評價，總起來說就是：前十年是由全面肯定到肯定大方向正確的時期；近十年是由否定其大方向至

全面否定的時期。前十年的肯定，是由於中共統治集團的主要成員，是文化革命獲得權力和利益者，他們靠運用權力去控制輿論、掩蓋事實真相，結果，隨著「四人幫」倒台，這種努力立刻在被揭露出來的大量事實面前徹底破產。近十年對文化革命的否定，最初是由中共黨內外的黨員及群眾，以他們的親身經歷來控訴「十年浩劫」的禍害。後來，當這種控訴逐漸擴大、深入到追根問底，觸及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采用了快刀斬亂麻的辦法——全面否定文化革命——一方面為文化革命作了結論，以避免人們把控訴提高為批判和探討；另一方面滿足了人們對十年浩劫所受的冤屈之發洩。

假如，我們把林彪、毛澤東及四人幫對文化革命所作的完全肯定，和近十年來鄧小平對

文化革命之全面否定對照起來研究，就會發覺：這兩個「全面」，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套一句唯物辯證法的術語，就叫做：「對立統一」的規律。當年壓制輿論，強迫人們去宣揚文化革命之偉大成就，實質上是為後來人們的控訴和揭發埋下了伏筆。而今對文化革命作全面否定，把一切意圖對文化革命作深一層探討的人打成「四人幫之餘孽」，以封閉人們洞開中共的本質之門路，將來又會換回什麼？是否會給真正的四人幫份子及其後人留下翻案的機會？當年，深為人們所不齒的林彪，現在也有獲得「恰當的評價」的機會，何況是一段影響很大、持續十年的歷史時期？可以預料，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人就要對這被完全否定了的文化革命重新提出來討論。中共將來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也必然會與這個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

由全面否定而產生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可以說，是一種基於「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潮為基礎的。

在一九六五年之前，毛澤東及其親信們，就想藉助於一次新的政治運動來奪回日漸被削弱的權力。為了製造輿論、運動群眾，就授意戚本禹等人（這些人都成了文化革命早期的中央文革小組之成員），對羅爾綱等人關於「李秀成自述」及對李秀成本人的評價展開了批判。

我們說，對李秀成這樣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能作廣泛的討論評價，在學術上是一件大好事情。奇怪的是，不少對學術毫不感興趣的中共官員，也湊起熱鬧來大寫文章，對「叛徒」兩字翻來復去，大談特談。這當然引起



一九六六年，周恩來陪伴江青一道接見紅衛兵。

中共黨內不少曾經被捕、有「叛徒」嫌疑之當權人物的警覺，很快地，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派迅速把這個討論控制在局限於「學術」的範圍之內，在這一回合中，毛澤東想要發動運動的企圖被壓制下去了。

李秀成是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國起義的一員將領。在太平天國覆滅，忠王李秀成被俘之後，李秀成於在押期間，寫了一篇約兩萬字的「自述」。內容是陳述了太平天國起義之始末，同時，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希望「老中堂」（註：即曾國藩）能放他出去，以便能

對太平軍之殘餘勢力、將領進行說服，免作無謂的堅持……對於李秀成的這項提議，自然成為後人對人物評價之焦點。一種觀點根據這點來證實李秀成是太平天國之叛徒；另一種觀點，却認為李秀成企圖誘騙曾國藩放虎歸山，讓他收拾舊部以重整旗鼓。由於曾國藩沒有放過李秀成，很快就把他殺了，事情就只能按推理來辯論了。

到了六五年十月間，毛澤東的親信（可以說是批判李秀成自述之舊班人馬），又開展了對「海瑞罷官」和「海瑞罵皇帝」的批判。由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在上海市的「文匯報」首先發難，並對「北京日報」、「北京晚報」開始發動進攻。

「海瑞罷官」及「海瑞罵皇帝」，是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寫的歷史劇和短文。文中，把明朝的一位清官海瑞大大頌揚了一番，至於是否以海瑞比喻早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被罷官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一般的讀者實在欠缺如此豐富的想像力。吳晗是否有心於此？只有吳晗本人明白。不過，彭德懷這隻「死老虎」，劉、鄧及其同伙們實在沒有為他洗清冤枉、重新掌權之意向。捨棄一個吳晗，加上幾個被株連的人物，他們是不會動心的。「棄車馬而保將帥」之下，吳晗及為吳晗辯護的一群人物，就很快被打下去了。然而，毛澤東之意不在此，立刻來個借題發揮，發佈「五·一六」通知，於是，以彭真為代表的北京市委整個被牽涉進去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牽連在一起，成為「彭羅陸楊」修正主義反革命集團。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不少當時當權的主要人物，又一次重施歷次黨內權力鬥爭的慣技——捨棄朋友以求自保。他們自欺欺人地以為毛澤東只是把打擊對象

局限在「一小撮」，而自認是屬於「百分之九十五」的團結對象。然而，這個「彭羅陸楊」集團，却關係到黨委、軍委、文化部、外交部、經濟等各個部門，實際上，這預示著對中共黨內以往的全面否定。只是當時的所謂「劉鄧派」、「周派」的大小人物，都不敢正視，只求自己不要粘上「黑線」之邊，這自然造就了他們全被分化、瓦解而被各個擊破的後果。總起來說，當時的中共各級黨政幹部，都在否定了別人、也否定了自己。比及八月十二日的「文化革命十六條」發佈——把幹部劃分為四大類：好的、比較好的、犯有嚴重錯誤而仍不算是反革命份子的及死不悔改的修正主義、反革命的當權派——之時，也只希望將來能被劃歸第一、二類，甚至被劃歸為第三類。他們已無法以法律、黨章去衡量自己，到底這幾年來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是對的還是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的經典著作已無人感興趣，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是能否與毛澤東一伙的「革命路線」搭上關係。中下層幹部只能寄望於自己的老上司屬於毛澤東為首的司令部的人，否則，烏紗帽乃至頭顱也就難保了……。這種全面否定，也否定自我的情況，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動起來的思想基礎。

文化革命就是全面否定一切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頒佈公報「十六條」以前，只能稱是文化革命之引發及初始階段。顯然，八屆十一中全會遠遠沒有達到毛澤東和林彪這些人的要求。相反，他們的慾望受到很大的節制。從不少大專院校在六月初宣佈停課兩週、

後又延長停課兩週，到後來由各級黨委派工作组組進入學校指導運動來看，當時中共各級黨員幹部都只把文化革命和當年整風反右相比擬，並且致力於控制運動的方向、範圍，隨時準備做這次運動的收尾工作。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公開號召紅衛兵造反，要他們以「破四舊、立四新」為名，去否定一切舊的東西，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此時，紅衛兵們對這個「全新」的世界之幻想，比起以往對共產主義社會之幻想更加虛無，他們都相信這「全新」的社會，是毛澤東早已擬好、安排好了的。只是被這些該死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干擾，而推遲了它的實現。紅衛兵在毛、林的撐腰下，他們以瘋狂的行動把文化革命推向了全面鋪開和全面否定的新高潮。

「紅衛兵」中有許多是北京的一些中共高級幹部之子女，他們得到毛澤東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信任。他們在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他們時，就登上天安門城樓，獲得特別的榮耀。為此還特製了一種寫著「紅衛兵」三個字的臂章以抬高身價。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更把一個「紅衛兵」的臂章套在毛澤東的臂上。毛不但接受了，還問了宋彬彬的名字，當他聽到她的名字叫「彬彬」時，立刻說了一句：「要武哇！」，從此，「紅衛兵」就以毛澤東為最高統帥而得以揚名，紅衛兵的「要武」之宗旨也就這樣奠定了。（事後，不少人都悟出了，毛澤東這一招是從「戰爭與和平」故事中，拿破崙自承為那個為逞英勇、不惜被大水沖走而涉水的騎兵團的名譽團長 那一節中學來的。）

上面提到，早在文革之誘發、初始階段，中共各級幹部都表現了既不敢相信別人，也不敢信任自己的全面否定之心態。他們的子女，

即「紅衛兵」之骨幹們，自然繼承了他們父輩的這些心態，但他們到底是年輕人，富有幻想，幻想把希望寄託在這位古往今來、全世界唯一的最完美的神——毛主席身上。衆所週知，神的誕生，是人類自我否定的產物。正如費爾巴哈所說：不是上帝創造人，而是人創造上帝，人把自己的本質、自己的智慧、才能、美德都賦予上帝了……。人對上帝的肯定，就是對自身的否定；人對上帝肯定得愈多，他對自身的否定就愈多。創造了上帝的人，反過來又成為上帝的奴僕……。毛澤東正是由中共各級黨員幹部在自我否定之中，創造出來的「神」。

給毛主席帶上紅袖章。右側為宋任窮之女宋彬彬



以往的神，如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等，他們的形象往往是在他們已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才日漸造就的。「神」的誕生，往往是在一個災難的地域，一個災難的歷史時期，人們在下心茫然、百般無奈下所祈求、所幻想出來的形象。毛澤東在否定了一般宗教之諸神之後，竟把自己置於爐火之上，自承為一個活著的神。他把千百萬盲目的中國人的希望幻化在自己的身上，憑著人們的迷信心理，去左右中國的政局。然而，全國人民在主動或被動的情況下否定自己、膜拜毛主席的時候，毛澤東本人也不得不事事留心，不敢公開隨便講一句話（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成爲毛主席語錄而受到無法限制的亂用）。事實上，毛澤東在八次接見紅衛兵中，能公開對群眾講的話就只有前面提到的「要武哇」，及「人民萬歲」、「同志們萬歲」這幾句話而已。可以猜測得到，毛澤東對自己的一般言論、對自己的思想、能力是缺乏足夠的自信的，換句話說，他實際上已在暗暗地否定了他自己。

當文化大革命進入到「十月革命」（即一九六七年一月紅衛兵在全國各地奪權）之時，紅衛兵以「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姿態，把中共各級機關、各級領導大權奪過來，成立第一階段的所謂「革命造反委員會」。紅衛兵中一些富有權力慾的人，從此取代了「舊的」國家機器，成爲新的統治者。但從他們竟然能在極短的期間之內，風靡了全國、維持了好幾十天來看，他們是需要有精神力量和中共中央的上層人物支持的。毛澤東及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支持了紅衛兵的舉動，而紅衛兵的精神支柱是對以往的一切，姑且莫論其屬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劉少奇的黑線或是其他路線……一概作全盤的否定。

「毛主席語錄」中，有一段提到：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先破後立，破就要講道理，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澤東主張的破，實際上就是對以往的否定。毛澤東的這段話成了當時的「最新最高指示」，其用意在於：先把以往的一切全盤否定，之後，按照他自己的選擇，隨心所欲地要保留的就保留，不想保留的統統抹倒。可是，紅衛兵大體上只懂得「破」，「破」之後的「立」都不甚了了，而且對那些曾經被「破」掉了的東西，又重新被恢復啓用，例如恢復使用舊人物、舊制度，認爲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復辟」。這當然忤逆了毛澤東的心意，因此，一九六八年對紅衛兵的鎮壓，是勢所不免的了。

一九六七年五、六月間，全國逐漸由「文鬥」的形式演變爲「武鬥」的形式。在「武鬥」中，任何一個派別的人，口裏喊著同一的口號——保衛毛主席，高舉著同一的旗幟——都是印著毛主席頭像的大旗，瘋狂地向「扛著紅旗反紅旗」的對立派作殊死的搏鬥。這些事實，曾經使當時的局外人（包括一切不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無法理解。不少外國的評論家只好生硬地把全中國各地的不同派別組織劃分成：某某組織是保劉少奇、鄧小平一派的；某某組織是屬毛、林的「造反派」；某某組織是周恩來式的騎牆派……等等。他們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裂成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派系的劃分方法，引用到中國內部來了。在共產主義國家之間作這樣的劃分，倒也不失其大概，但在中國內部作這樣的劃分，就未免太可笑了。當時，所有的群眾組織，無論其成員是工人、農民、機關幹部、職工、或是學生，都不願意甘當「保守派」去「保」劉少奇。每個人都很固執地自認爲自己正在拚命地保衛毛主席

、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如果說，他們之中有些人能在當時就有勇氣去考慮：應該保衛劉少奇的「司令部」，這些人倒可稱得上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還沒有完全否定自己的存在。

延續了一年多的、禍及全國各地的「武鬥」，最初是紅衛兵派別之間的鬥毆。逐漸地，工人、農民、城鎮內各種職業、行業的大衆也都捲入了，最後，由於要「揪」出各地的「譚震林式的軍內之反革命份子」，使軍隊也捲入了這場武鬥的漩渦裏。軍人的捲入，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武鬥的破壞性，另一方面，將導致全國軍閥割據、各佔一方的不可收拾的局面，這是毛澤東本人最忌諱的。故此，才不得不下令整軍——讓軍人進入各機關、學校工廠、企業單位內實行軍事管制，設立軍管小組，拉上一些工人、農民作陪襯，美其名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平定各地的動亂，恢復秩序。「軍宣隊」和「工宣隊」的進入學校，是公開地、全面地否定了「紅衛兵」，否定了中共精心培養出來的一代年輕人。從此，中國的知識青年便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隊、紅衛兵革命小將淪落爲要自覺接受軍人、工人、貧下中農改造的「臭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地位也排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八類人之後，以「臭老九」來爲自己解嘲。這一代的青年人，稟承了毛澤東的旨意，摧毀了中共數十年來艱苦經營的成果，同時也毀滅了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毛澤東雖然藉文化革命取得了極權統治，但他在黨內外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也消失殆盡。林彪集團的人物估計到這一點，才敢於籌劃政變。並且，準備在政變之時喊出：「打倒封建暴君！」的口號。

七九年，大學生們在中南海門前示威抗議部隊強佔校舍。



文化革命之功績——否定的思考

中國共產黨一向強調正面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國的青年學生絕大多數都對共產主義的說教深信不疑。他們對自己的歷史任務——在全球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有著一種使命感。因此，對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先行者、不要說毛主席、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即使

是一個普通的黨員幹部，都或多或少地沾上了神聖的光彩。無論是老一輩的人還是中國共產黨一手培養的年輕一代，都把思想傾向共產主義、跟隨共產黨走的人冠以「進步」的美名。似乎，共產主義思潮完全代表了當代最先進的歷史潮流，共產黨人也成了代表最先進階層的特殊材料了。

基於用這種思維方式去判別是非，共產黨人獲得了中國人民的信任，共產主義就成爲中國人民的信仰，共產黨能在中國取得政權，也就理所當然的了。有些過去或現在自稱爲「反共」的、或咒罵中國大陸人民爲「愚昧」的先生們，是否要反躬自問：有沒有自覺或不自觉地支持這種判別是非的標準呢？是否直到現在還糊里糊塗地把思想傾向共產主義的人稱爲「思想進步」呢？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在經歷了文化革命之後，已有了很大的改變。

在文化革命高潮過去之後，不少紅衛兵小將的頭腦開始冷靜了下來，首先是湖南「省無聯」及楊思光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疑問。在毛澤東還在世之時便公開地提出這些疑問，無疑是對文化革命的否定。其次，是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大頭目之一的韓愛晶曾向毛澤東討教：當主席百年之後，中國將會怎麼樣？毛澤東也感到無言以對，只以：地球還不會不轉動來搪塞。之後，韓愛晶當然遭到了康生、陳伯達等人的一頓臭罵。

到了六八年底，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接受畢業分配或上山下鄉，中學生幾乎全部被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際上這爲這些年輕人創造了一個獨立思考的心理環境和地理條件。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青年無不感到壓抑，從而產生思想波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和層次上：

最普遍的是自怨自艾，感到毛澤東及共產黨中央欺騙了他們，在利用他們完了之後便把他們一腳踢到農村去，以犧牲他們來結束文化革命。他們對失學和繁重的農村勞動而不得溫飽，牢騷滿腹。名聞全國的張鐵生便是一實例，張鐵生在繁重的勞動、沒有時間去唸書而面對投考大學的試題感到極大的諷刺時，便把多年來的牢騷往試卷上發洩出來了。事實上，有同樣牢騷的人又何止千千萬萬，但他們認識到在中共統治下沒有任何言論自由，便都抱著明哲保身的態度。張鐵生被抬高爲「反潮流的英雄」，只能說是毛澤東、四人幫之流在政治鬥爭方面的需要，當初把他抬高及後來把他打下去、判刑，都是同樣的無聊和可笑的。張鐵生的「白卷」，只不過是中國青年面對被封閉的前途所作的一聲微弱的呼喊罷了。

其次是沉淪。青年人在生活受到威脅，在農村無法支持下去之後，便出現了大量倒流回城市的現象。如果原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尚可以讓他們待在家裏去熬日子。如果家庭經濟條件不好，或整個家庭被遷到農村去的，這些年輕人在城市就連個住宿的地方也沒有了。很明顯，這樣的情況只會迫人去犯罪。故此，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後不久，全國各大小城鎮都出現了大批的流氓、暗娼及投機倒把、盜竊集團。在邊疆地區，則出現大量的知識青年外逃、偷渡到別國或港澳去求生存的現象。這些犯罪活動由小到大，由暗到明，遍及全國。中共當局面對這些事實，找不到適當的解決辦法，只能以殺、關、管、放去糟蹋他們，這只能使他們來個「破罐破摔」，越發不可收拾。可見，中共的政策不但糟蹋了這一大批青年，而且直接影響了社會風氣，降低了中國人的思想素質。

面對生活之困窘、社會的變化而能夠冷靜思考、分析的青年人，在數量上是極少數，但他們却成爲中國將來之希望，也就是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中堅。由於他們親身接受了文化大革命之洗禮，他們曾經希望通過文化革命能徹底改變中國的現狀，却不能不對文化革命之後，中國墮入更深一層的專制、暴政而感到失望。中國文化革命之後，全國的萬馬齊瘠的局面，使他們不得不冷靜下來，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爲作一番檢討。「紅衛兵」既然從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墜入「臭老九」的行列，他們已不可能靠誰來撐腰去辦事，而只能靠自己獨立思考，謀求新的道路，挽救中國的命運。

一九七四年在廣州市中心出現的「李一哲」大字報，是對當年「紅衛兵」向被稱爲具有絕對權威的毛澤東及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次公開批評。雖然，現在看來，他們的言論、立場近於改良主義，但是，在「秋後算帳」、「一打三反」之後不久，中共黨內連一個敢於冒死向毛澤東進諫的忠臣逆子也找不到時，居然有幾個「臭老九」，在廣州街頭暴露身份，貼出大字報來，這實在要有荊軻刺秦皇的勇氣。因而，他們立刻得到了全廣州乃至全國各地人們的反響。一時間，廣州市中山五路、北京路貼大字報的地方人山人海，在人們心目中，「李一哲」不但不反革命，而是一個敢於爲民請命，敢於公開說幾句心理話的英雄。儘管中共會把他們抓回本單位分而治之，送到各工廠企業單位去「接受批判」，組織一群筆桿子去圍攻，但都只能自暴其醜，反而提高了「李一哲」的聲譽。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在處理此事時倒也十分乖巧——提交中央而絕不私自去碰這個燙手山芋。

「李一哲」大字報的出現，暴露了中共統

治集團的窘態，大大地刺激了中國青年對時局、對將來作更深入的思考，增強了他們的鬥志。到了一九七六年爆發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數以萬計的中國人敢於集結在首都天安門前，去表露他們反對暴政、要求民主的心聲——儘管他們以悼念周恩來爲題去掩飾，也不能逃避中共當局的血腥鎮壓。從而，「四·五事件」便成爲當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民主運動的起點。

「四·五天安門事件」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是，他們使那群追隨毛澤東、被毛澤東所重用的政治投機份子，如華國鋒、汪東興之流，不得不爲自己在毛澤東死後的出路重新考慮一番。如果他們繼續倒行逆施，充當「四人幫」的打手去鎮壓人民，就只能成爲「四人幫」的殉葬品。天安門前人們表露的懷念周恩來的情景，使他們直覺地要去投靠那些原屬於劉、鄧、周恩來等人的勢力，以保持自己的地位。所以，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政變，在思想上和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及民主思潮的壓力有著極大的關係。「四人幫」被推翻，應該說，中國當代民主運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只是中國人對民主之觀念仍十分模糊，民主運動仍缺乏應有的理論去指導，因此，在當前的條件下，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否定之後的再否定、 促進民主運動的新高潮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十年浩劫」的結束，是一個中國人對以毛澤東爲首的統治集團從寄希望到完全否定的過程。不過，中國人對共產主義、共產黨的認識仍很不足，多年來的「思想改造」，使中國的知識份子

思考問題、處理事情時，都是以馬列主義理論、唯物辯證法爲出發點的。近年來，以鄧小平爲首的統治集團在內外交困的情勢下，不得不採取對外開放的政策。對外的開放，當然要打破唯物主義獨佔中國天下的局面，但這樣做，將危害中共的根本統治。因而，必然對內要採取政治、思想收緊的做法，並且在讓步到一定時間、一定程度時，要作好「算總賬」的準備。中共各級幹部對極權、以及「四人幫」式的胡作非爲並沒有深惡痛疾的認識，他們對「十年浩劫」的怨恨，只不過是因爲自己所受的骯髒氣。因此，他們對文化革命十年除了完全地、絕對地否定之外，還能作什麼更客觀地評價？中國的大部分知識份子以唯物主義爲思想基礎，去批判中國的唯物主義的祖師爺——毛澤東，也脫離不了共產黨人的思想桎梏。近年來，中國的民主運動似乎已墜入沉悶、憂鬱的低潮之中，原因就在於：中國人仍在以唯物主義去思考問題。仍沒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去再次否定自己，沒有一種新的思想理論去取代自己頭腦中的共產主義思想理論。

在當前的中國人認識水平之下，即使再來幾次宮庭政變，甚至由一些打著民主旗號的人去執政，也難免要走向共產主義的老路。中國要實現民主，還要走一段很漫長的道路，做一番民主思想、民主理論的建築工作。

目前，中共對文化革命的完全否定，正爲以後把文化革命的功過作重新評估留下契機，也爲中國的民主理論在中華大地上獲得廣泛、深入討論、傳播製造了機會。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這是毛澤東在發動文化革命前的詩句。現在的沉悶空氣，是否正是我們致力於民主理論研究的大好時機？

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

(美國)劉安第

一、從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 決議說起

一九八一年六月舉行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在歷史上的功過作了正式評價。對此，中共曾大張旗鼓地加以宣揚，但大多數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士，普遍反應不佳。不僅一般群眾對中共新當權派關於毛的評價感到失望；就是一些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共黨員幹部，也對決議很不滿意。在六中全會閉幕後，中共中央立即號召各級黨委，要把「認真學習決議作為全黨下半年的中心任務之一」，不但要組織黨員幹部學習，而且要向人民群眾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希望「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決議的基本結論上來」。在學習過程中，黨員幹部們議論紛紛，有的否定對毛的評價「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基本結論；有的指出以往多年的實踐，毛澤東思想給中國人民帶來無數的災難，早已失去指導思想的意義，從而主張全盤否定毛思想。

為此，「人民日報」在一篇題名「認真學習決議」的社論中，嚴厲警告黨員幹部「不可在一些歷史事件的枝節上糾纏，更不要對具體歷史是非去進行群眾性的辯論」，社論還特別

定出一個框框：「對待歷史問題，應該貫徹宜粗不宜細的方針」。這可以反映出，中共關於評價毛澤東的決議，是很不得人民群眾甚至黨員幹部的贊同的。

其實，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評毛決議，主要是出於鄧派對凡是派奪權鬥爭的需要。由於毛澤東的統治不得人心，特別是在文革十年浩劫、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和彭德懷事件中犯了嚴重錯誤，因而決議不得不輕描淡寫地提了下來，或者把責任推給林彪、四人幫，藉以打擊凡是派的兩個凡是方針，藉以籠絡人心，竊取政治資本。然而，決議既不交代毛犯這些錯誤的過程，也不說明造成這些錯誤的性質和根本原因；反而玩弄辯證唯物主義的詭辯，把毛思想與毛澤東一分爲二，全盤肯定毛思想的正確、偉大，繼續把毛思想作為長期指導中共行動的指導思想；它還把文革時期造神運動中崇揚毛的四個偉大（即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偉大統帥），搬來了前兩個，強加給中共全黨和全中國人民。六中全會決議固然爲鄧派奪權提供了砲彈，但它却無助於解除新當權派的「三信危機」。

因此，以客觀、公正的歷史科學態度（不是主觀、偏私的個人感情用事），對毛作出嚴

肅、正確的評價，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毛澤東思想的實質

那麼，做爲中共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

民運戰士王希哲在一九八〇年著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剖析毛的前半生走的是梁山泊聚義的道路，鬧的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式農民革命；「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畢其餘生之二十年，是以捍衛斯大林主義爲職責的」。

斯大林主義又是什麼樣主義呢？王說：「它在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名義下，把中世紀的一切最黑暗、最反動的東西都復活起來。它把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宗教化，然後復辟了中世紀式的政教合一；它把黨凌駕於社會之上並使這個黨的領袖成了任意擺佈人民命運的至高無上的主宰；它實行了最殘酷、最野蠻和大規模的警察恐怖，來消滅忠於人民民主事業的真正共產黨人和無辜人民……總之，它是一種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旨意下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實行官僚特權階級專政的社會法西斯主義。」

這位可尊敬的民運戰士對毛一生思想、政治的剖析，並非創見。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有人說毛是當代的宋江、李闖之流了；吳晗「借古諷今」，把毛喻爲明朝的壞皇帝而藉海瑞之口來罵他；文革期間，毛江推出「新生物」的時刻，我的一位尊長就告訴過我們，那只是把中世紀最黑暗、最反動、最野蠻的中外貨色，從歷史垃圾堆裡挖了出來，拼湊一番，貼上「新生物」的標籤，藉以騙人、整人、害人而已。

儘管王希哲不是歷史學家，但他對毛思想的評析，却有一定的水平，頗有可取之處。

較早以前，也有一些民主青年大膽揭露：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的空想加巴黎公社的神話加斯大林的殘暴專制。有趣的是，更有人考證出，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論調，是原封不動抄襲自「紅樓夢」一書；毛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三句話，是從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不稱王」篡改的。

毛思想的三個法寶：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還有最著名的「老三篇」，實為愚民政策與蒙昧主義之典型。雖然它也提到一點人民民主，但他從來就把民主當作一種手段

，當做他愚弄他人、裝點門面的手段，當做他達到專政目的的手段；他又把民主分為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兩類，以誣衊、反對真正的民主，實行以他為主的社會主義民主。

三、毛澤東的作風

從毛澤東思想的實質，可窺知毛澤東的作風。朱（元璋）毛之流所謂「不稱王、不稱霸」，實際就是要稱王、要稱霸，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一個野心家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總是要用動聽的言詞、口號作掩飾以免被人識破。朱元璋說不稱王，結果不但稱王稱

帝，而且稱帝以後神經十分衰弱，動輒殺戮功臣，凌辱戰友，至於對曾經擁護他的人民群眾的死亡，則更是在所不顧的。「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幾百年後，人民對專制暴君的「偉大功績」，仍是記憶猶新！

毛澤東為了騙取人民的信任，奪取政權，曾經高唱「新民主主義」，並把「工農翻身，當家作主」、「四個朋友」掛在嘴上。一旦取得政權，黃袍加身，就立即改變說法：「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形式，同十月革命後俄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沒有區別。」俄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列寧告訴人們：「專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毛在反右鬥爭、三面紅旗和文革中的作為，正是他「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的突出表現。

有人為毛在文革中打擊大批紅色官僚、批判官僚主義而大唱讚歌。其實，毛在文革中批鬥走資派，絕不能證明他是官僚制度的敵人；事實恰恰相反，毛在文革中提拔的那些「新生力量」，一個個都成了文革暴發戶——一批紅色官僚。

早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中，就有「成堆」的知識份子紛紛指出，中共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三大害」，都是來自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且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這個社會主義社會，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是掌握在幹部手裡，幹部的命運掌握在國家手裡，國家的命運掌握在黨的手裡，黨的命運掌握在領導集團手裡，而毛澤東是這個領導集團的最高領導人，他對全黨具有最高的權威，形成金字塔式的統治系統。因此，幹部的官僚化，已經不是一種作風，而成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發表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旁坐者為周恩來。

為一種制度，就像元朝統治中國那樣，把社會各階層分為幾等人，層層節制，接受最高權威的專制獨裁。

與此同時，毛澤東自然也像歷史上任何一個官僚制度的最高統治者一樣，對他下面的官僚幹部必須加以約束，不能聽任官僚幹部去肆無忌憚地欺壓群眾。因為幹部的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必然發生尖銳的衝突，衝突又必然給他的統治帶來不穩乃至崩潰的危機。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爆發後，中國的工人、學生也紛紛上街，反對共產黨（毛著「論人民內部矛盾」）。這使毛大為震驚，他不僅大力支持蘇聯對匈牙利人民的武裝鎮壓，而且在一切壞事嫁禍給幹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上，號召「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幫助」中共整風，且信誓旦旦地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結果却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把四十萬大鳴大放者打成右派（其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曾昭倫……等民主人士至今沉冤未伸，沒有得到鄧小平的平反），毛還以引蛇出洞的「陽謀」得逞而沾沾自喜。他嘻皮笑臉地說：「你們說我們是秦始皇，說對了，但是不夠，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毛澤東不但稱王稱霸，而且對於稍微尖銳一些的原則性批評，就馬上翻臉，進行殘酷鬥爭和打擊，實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暴力統治。為了進一步鞏固、保持其既得的統治，竟然神化自己，他的每句話、每個字都是絕對真理，只能贊成，不能反對（見劉賓雁著「第二種忠誠」），儼然成了救世主。「陽謀」得逞以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的聖歌更聒噪了，宗教式的個人崇拜更狂熱了。

有個別的人為毛的神化問題提出異議，說毛的神化不是他自我形成的，而是他人的因素佔主導地位（中春三十一期），並舉出延安時期毛在藍蘋（江青）問題上的讓步為證。但是，應當知道，毛在同藍蘋搞男女關係時，張國燾事件仍有餘波盪漾；王明還高居中共領導階



六七年四月，北京舉行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會，主席台上有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楊成武、姚文元等。

層，毛同王之間的誰勝誰負尚未真正解決。在此客觀形勢下，毛豈敢以個人私慾跟全黨相抗？如不讓步怎能爭取全黨擁護？

此後，隨著國民黨全力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毛得以放手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在國內戰爭中贏得勝利，毛在黨內的威望便大大提

高。加上劉少奇錦上添花，提出把毛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並把它塞進黨章裡；郭沫若逢迎吹捧毛是「紅太陽」；林彪繼又「高舉毛思想偉大紅旗」。這些吹捧，都抬高了毛的地位。

一九五九年開始的三年大災荒、大飢饉，明明是「大躍進」造成的，彭德懷只是對此作了客觀反映，建議搞集體威信，不要搞個人威信，毛澤東立即暴跳如雷，把彭、黃、張、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三年國民經濟困難」剛剛結束，接著毛就悍然推翻延安時期的承諾，讓江青出來干政，先在文藝界收集黑材料，網羅打手，以吳晗的「海瑞罵皇帝」作首靶，揭開了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又親自發動「評水滸」運動，把自己封為現代晁蓋，認為被現代宋江架空了，要挖出「混在中央和地方中大大小小的宋江式人物」。

與此同時，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劉冰對毛安插在清華的親信遲群、謝靜宜的胡作非為，非常反感，上書毛請求處理。毛頓時暴跳如雷，十一月三日親自答覆道：「劉冰要打倒遲群和小謝，矛頭是對著我的。」那個大學黨委書記的命運可想而知，連當時的教育部長周榮鑫也受到牽連。

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後，廣場上的血跡尚未完全洗淨，毛就急急忙忙在四月七日關起門來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兩項決議」，把華國鋒拉上來，把鄧小平打下去。這「兩項決議」，在「人民日報」也公開承認是出於毛的「個人建議」。毛對華說「你辦事，我放心」，毛的個人意志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又一次明顯地表現出來。類似



華國峰從權力夾縫中上了台。

的例子，舉不勝舉。不僅毛本人專橫霸道至極，連他的親信爪牙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四、毛的對外路線

毛在批鬥彭黃反黨集團時，加給彭、黃、張、周的一條罪名是「有國際背景，裡通外國」(劉少奇也曾緊跟毛的調子，在七千人大會上如此評價彭德懷)。

但從歷史事實來看，一個從來高唱國際歌，高喊工人無祖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在黨內鬥爭中把「國際背景，裡通外國」作為加給對方的一條罪狀，是極為可笑的。早在二十年代「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時期，包括毛在內的所有中共領導人，就把他們的國際背景赤裸裸地展示給世人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毛把中共同蘇共的關係、中國同蘇聯的關係，進一步建立在如同一個老子黨同兒子黨、老大哥同小兄弟的不平等關係上，實際上毛在那個時候就承認和接受了「新沙皇」的權威。「一邊倒」向蘇聯，「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是毛「

理直氣壯」的口號；除了口號，還有實際行動，他不顧中國人民遭受長期戰爭的苦難，唯斯大林之命是從，驅使中國人民參加朝鮮戰爭，並甘受蘇聯軍火貸款的高利盤剝，榨取中國人民賴以維生的糧食和農產品，去換取三十年代蘇聯倉庫中的陳舊武器，使「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遭致極大的傷亡(埃及驅逐蘇聯軍事顧問後，中共曾大吐當年向蘇聯軍火貸款的苦水，以控蘇援埃)。

爲了維護斯大林的亡靈，毛與赫魯曉夫鬧翻以後，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與法、意、日、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建交，進入聯合國。爲了進入聯合國，竟不惜花費億萬勞動人民的血汗成果，去換取幾十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同意票。特別是在共產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同蘇聯爭奪領導權中，更不斷以大量金錢、物資援助東歐、亞、非各國，其中僅給北越的就是二百億，給阿爾巴尼亞的是六十億(均爲人民幣)，後來都反目成仇。而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遠遠低於那些受援國家的人民。

當年毛在爭取與美國建交時，曾對內宣傳乒乓球打來了尼克松的彎腰訪華。實際上，毛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一開始就是讓給美國人聽的，強烈暗示他統治下的中國，可作美同蘇對抗的一張牌。毛死後，鄧派繼續執行毛的外交路線，極力爭取美國的好感和信任，對越南發動大規模的「懲罰」戰爭，對中國人民的尊嚴、生命和物資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近年來，中共新當權派在對外關係上，同日本搞得十分親密，對日依賴日趨加深，甚至一再被日本坑騙了也毫無悔意。北京等各大城市學生舉行愛國反日示威遊行都被壓制下去，主要也是沿襲毛在抗日戰爭中那條對日路線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北京舉行反美大示威，支持蘇聯對美的立場。鄧小平並在會上講話。



緣故。據當時蘇聯派駐中共的顧問在「延安日記」一書中透露，中國抗日戰爭之際，中共與日本侵略軍却在背後搞和平共存，彼此派出代表，暗地交往，互通消息。毛在抗日戰爭時期選對黨內指示「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蘇聯顧問的此項揭露確有可信之處。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在會見日本社會黨領導人佐佐木更三時，親自道謝「沒有你們皇軍侵

佔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對外路線，既是地道的共產國際路線，又與帝國主義有所勾結，只要對中共的黨和政權有利，就是犧牲了重大的民族利益也在所不顧。因此毛澤東絕不是民族主義者或愛國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罪人。

五、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評毛決議的基本結論是：功績第一，錯誤第二。如果從「新階級」的觀點和立場出發，這個結論是無可厚非的。試想，毛領導一個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數萬殘餘隊伍，不僅生存下來，而且發展、擴大迅速，使中共成爲全世界黨員人數最多的第一大黨，統治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也使它的黨員幹部從一無所有和一無所知（除了階級鬥爭以外）到權力無邊。除非是良知和血性特佳的黨員幹部，才不同意那個評毛決議。同中共新階級的觀點立場相反，作爲一個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國人民，來綜觀毛的一生，那就絕非只有一些缺點錯誤，而是大半生的極大罪惡。缺點可以諒解，罪惡則不能寬恕。我們要以極爲嚴肅、冷靜和客觀、公正的歷史科學態度來評毛。要實事求是地評毛，決不能像中共新當權派劃定的框框那樣「宜粗不宜細，不糾纏歷史是非」，如果那樣，就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避全就偏了。

由於毛澤東主宰了中國二十七年之久，又曾是國際上的風雲人物，因而有人說他是一個歷史上的傑出人物；還有人把他比作法國的拿破崙，甚至以美國的華盛頓、傑克遜、林肯、



「向井崗山進軍！」，畫出毛澤東雄霸一方的決心。

羅斯福這些傑出領導人來隱喻他。稍具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拿破崙是以一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和天才軍事家而受到法國人紀念。拿破崙的對外侵略和對內稱帝，對當時的法國社會是具有鼓舞和促進作用的。法國人至今爲拿破崙而感到自豪，實際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

至於將毛喻爲華盛頓等美國偉人，就更加不倫不類了。華盛頓他們崇尚的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給他們的國人帶來的是世世代代的幸福；而毛澤東却要取消幾億個大腦，迷信「槍桿子裡出政權」，迷信「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頑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一窮二白是好事」……這已經使我們民族空白了一代，如果讓毛澤東思想

萬歲，中華民族遭受的災難就會更加深重。儘管在毛統治的血腥恐怖歲月裡，中國青年仍然敢於鼓起勇氣，在小匈牙利式的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中，前仆後繼，怒吼著「秦皇的封建專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其實，毛澤東能與秦皇相比嗎？如果把他算作歷史傑出人物，那也只能歸類爲斯大林、希特勒、朱元璋一類而已。但這類人物之傑出，並非在正面，而是在其反面。正因爲毛是個傑出的反面人物，這就有必要將他作爲反面教員，讓人們有所殷鑑。

六、為何出現毛澤東這樣的人物

中國之所以出現毛澤東這樣的人物，不是因爲他們的先天本性特別壞，而是因爲他們是後天的「特殊材料製造」的（斯大林語）。這就是說，這些反面人物，完全是特殊的意識形態和特殊的社會制度的產物。不僅在中國如此，在蘇聯、越南……都是一樣。斯大林死後的蘇聯，曾經大鞭斯尼的赫魯曉夫，後來也走向了斯大林主義；繼赫之後的所有蘇聯頭頭們，其間差別只在「新瓶裝舊酒」或「換湯不換藥」而已。至於南斯拉夫的鐵托，在專制極權程度方面就好一點，但基本上仍然實行如前南共第二號領導人吉拉斯所指的「新階級」統治，南斯拉夫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仍極有限。

吉拉斯對共產黨的統治曾有如下的揭露：「新階級是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形成的。這個新階級植根於一個特殊的黨，……共產黨製造了這個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又依靠黨作爲自己生存、發展的靠山。」吉氏所說的新階級，就是人們熟悉的紅色官僚階級，亦即共產黨統治

階級。

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後，他們牢牢掌握著兩大武器：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現階段叫社會主義所有制）；二是無產階級專政（或叫人民民主專政）。衆所周知，這種生產資料公有制，名爲生產資料爲全體勞動者所共有，實則爲一小撮統治者利用權力化公爲私，變成紅色官僚所有制。這種紅色官僚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佔有方式出現，而是在公有制的掩蔽下，以紅色官僚集體壟斷，共同佔有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們爲了保持自己的階級特權，一方面用「長遠利益」一類的口號欺騙、麻痺群衆；另一方面亮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刀子，強化官僚軍事機器，實行恐怖專政。誰不接受他們的特權統治，就把誰打成階級敵人。

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是商品，可以自由買賣，可以自由受僱、解僱；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廣大勞動者不但沒有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也受到壟斷，連勞動者本身也成了統治者任意擺佈、支配的奴隸，長期處於人權受踐踏，生活無保障的屈辱困苦境地。但人民群眾總是不願做奴隸，要做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的，這就形成了那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最大矛盾，經常衝擊著共產黨的統治。

在紅色官僚階級內部，雖然他們有著壓榨、剝削人民的共同利益，但是他們當中的各個派別又有著自身的特殊利益，他們無不爲自私自利、貪得無厭的「階級本性」（借用共產黨語言）所驅使，企圖奪取最高統治權，保護既得的利益，並爭取更多的利益。這就勢必不斷地相互傾軋，相互爭奪，這是紅色官僚階級內部的最大矛盾。

這兩大矛盾都是社會主義制度製造的，當

然不能在那個制度下得到根本解決；加上某些特殊的主客觀因素，就必然會出現毛澤東這樣傑出的歷史反面人物。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揭批他的「偉大導師」是懷疑狂、虐待狂，實則每一個共產黨頭頭，由於他們的黨性和階級性，由於他們經常處身於兩大矛盾中，神經都很脆弱，至多在程度上稍有不同罷了。

七、中國還會出現毛澤東式人物嗎？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打倒「四人幫」不久，北京傳出一條消息：江青在垮台前曾在一個場合說：「毛主席去世後，大家都想撈一把。」其意是，在那個紅色官僚階級領導集團中，人人都有作毛二世的野心。

江青想做女皇帝，沒有做成；華國鋒做了幾年的毛二世，被鄧小平拉下馬來。

在華國鋒做毛二世期間，一切都是「兩個凡是」當頭，與「毛救星」生前沒有什麼差別。

鄧小平老謀深算，以他爲首的鄧派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工作重點向四化轉移」、「發揚民主」的新口號；接著又陸續取消「以階級鬥爭爲綱」、平反冤、假、錯案、改變「終身制」、制定了民、刑法，以至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改革，看來好像毛澤東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不少人對鄧充滿了幻想，有「鄧青天」之稱。

但也有很多人警告說，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個人身上，要著眼於制度，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鄧小平在六中全會上，在高唱「發揚民主」的同時，還拍著胸膛保證這個「政策穩定幾



鄧小平幾起幾落，在中國政壇上是很罕見的。

年不變」。不料言猶在耳，他就突然變卦。民主青年魏京生寫了「要民主，不要新的獨裁」一文，質問鄧「是怕追究毛澤東的錯誤追究到他這個過去的同夥身上呢？還是準備繼續毛澤東式的獨裁社會主義統治呢？」鄧對魏的回答是關牢十五年。迄今爲止，鄧製造了不少新的冤、假、錯案，包括迫害民主青年王希哲、徐文立、劉青、傅月華多人在內，已爲世人所悉知。這些民主青年，都曾對鄧估計過高，擁護甚力的。

鄧小平接著悍然拋出「四個堅持」，這更震驚了中外。這「四個堅持」，實際是壓在人民頭上的四座大山，正是魏京生所指出的毛式獨裁社會主義統治。從而人民的民主權利越來越少，鄧大人的威風越來越大，他的許願一個一個變卦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鄧對日本社會黨佐佐木良作表示「群眾貼大字報，是形勢穩定的表現。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嘛」；七九年三月，他又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會議上說：「大字報還是讓群眾貼」；並連同華、葉、李、汪一起作出決定，把「四大」繼續寫進第三部憲法第四十五條。但到八〇年元月，鄧大人却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大罵「四大從來沒有產生過積極作用」，非取消四大不可，終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中達到了這個目的。原來鄧當初肯定大字報，是爲了利用它作自己奪權的工具；一旦奪權到手，立即過河拆橋。

鄧派當權以來特權橫行，官僚主義稱霸，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無論元老一級或新提升的第二、第三梯隊幹部，莫不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在升學、出國、對外貿易各方面，都有或明或暗的特權，新衙內、太子黨之流到處伸手，絕不遜於文革暴發戶。爲了掩蔽自己，欺騙群眾，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現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曾撰文云：「全國地方副局長、中央副司長、軍隊副師長以上的幹部，全部大約八萬人，他們的平均工資只是全國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企圖以此說明這個統治階級並非特殊。這很滑稽。要知幹部之所以特殊於人民群眾，並非僅僅因爲他們的平均工資高過普通勞動者六、七倍，主要因爲他們在「四個堅持」保護下，特權無限，貪得無厭。他們手握專政權力，可以化公爲私嘛。

目前，仍有一些人對鄧抱有幻想，主要是寄望於他的「改革」。我們必須擦亮眼睛：一方面，鄧的改革，猶似清末的洋務運動（張之洞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鄧是社會主義爲體，資本主義爲用），希望通過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現代科技、現代設備及

管理方法，以改變它的貧乏落後，改善它的極端浪費和沒有效率，改變它幹部們的驚人無知和不負責任。因此它的四化只限於科技、國防（軍事）與工、農業生產技術，而不涉及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更沒有全面現代化。這四化只對強化共產黨的專政機器有利；而人民因爲沒有民主化的政治、文化生活，仍處於受專制、受蒙昧境地，即使四化實現了，人民仍無權享受其成果，反而更易受到共產黨的控制。同時，共產黨專政的物質基礎，紅色官僚們的特權享受，全都來自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如不提高經濟，提高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共產黨的奴隸們更易起來打倒他們了。歸結鄧的改革，不是出於救民，而是出於救亡的目的，即害怕「亡黨、亡國、亡頭」。

另一方面，鄧小平所以能三落三起，完全因爲他善於隨風駛舵，搞兩面派和機會主義。他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劉鄧司令部第二號走資派」，就馬上「自我檢查」，向毛、林、陳（伯達）認錯、悔罪：「我完全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伯達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自我檢查）；還發誓要「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和我爲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並把一切罪過推給劉少奇（同上）。鄧在被打倒後並沒有受到劉少奇那樣悲慘的遭遇，並且得以復出，是向毛立下「永不翻案」的決心書而得到批准的。毛死江垮以後，鄧又急忙向華國鋒上書檢討認錯，要求工作；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前夕的一次座談會上表態，歌頌文革「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保住了江山不變色」，罵劉少奇「不要社會主義，不要馬列主義」，又自我檢討「差一點被劉

少奇牽著鼻子走了」。因而得以過關，也贏得了一個「老檢討」的稱號。

鄧小平既是這樣一個反反覆覆的人物，大家對於此人的評價就可以充分理解了。魏京生說得好：「一切野心家都是在騙取了人們的信任以後，才得以爲所欲爲的。……鄧小平要民主嗎？不要。他不願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他不讓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野心家集團篡奪的權力」（「要民主，不要新的獨裁」）。魏京生早在六、七年前就預見到了今日的局面，看透了鄧小平的「民主」真相，並以極大勇氣敢冒危險，予以揭批。這是令我們特別懷念、尊敬和支持魏京生的原因。

繼魏京生之後，也有不少青年朋友，提醒王希哲說：「鄧小平與毛澤東、四人幫並沒有多大的差別，他們都不過是中國官僚制度的正式代表。因此指望他們能夠領導一場徹底的改革，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幻想」（王著：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確是不再愚不可及了。

總的來說，鄧小平現階段的改革，只是在四個堅持下的政策改革，而非體制改革（連改良主義也不是）。政策是既無連續性，更無固定性的。三十多年的經驗告訴了人們，共產黨總是形勢壞了定政策，形勢好了變政策的，有時形勢未好也變政策。在「四個堅持」下，更不會有什麼利於人民改變命運的真正改革。鄧派近幾年來的表演，已夠人們瞧的了；至於鄧小平死後又會怎樣呢？五十年代的黨員詩人石天河警告我們：「不要相信暴君的仁慈，只能相信人民自己的力量！」是的，除非中國政權完全從專制暴君手裡轉移到人民自己的手裡；否則，還不會出現毛澤東一類人物這個問題，現在就可得出答案了！

淺談蓋棺猶難論定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趙汝恩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談狐說鬼，其「陳楓崖光祿言」一則云：

康熙中，楓涇一太學生，賞讀書別業，見草間有片石已斷裂剝蝕，僅存數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折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陳若果於石上，而祝以狎詞。越一載餘，見麗女獨步菜畦間，手執野花，顧生一笑。生趨近其側，目挑眉語，方相引入籬後灌莽間。女擬立直視，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頰曰：「一百餘年，心如古井，一旦乃爲蕩子所動乎！」頓足數四，奄然而滅。方知即墓中之鬼也。

蔡修撰季實曰：「古稱蓋棺論定，觀於此事，知蓋棺猶難論定矣！是本貞魂，乃以一念之差，幾失故步。」晦庵先生詩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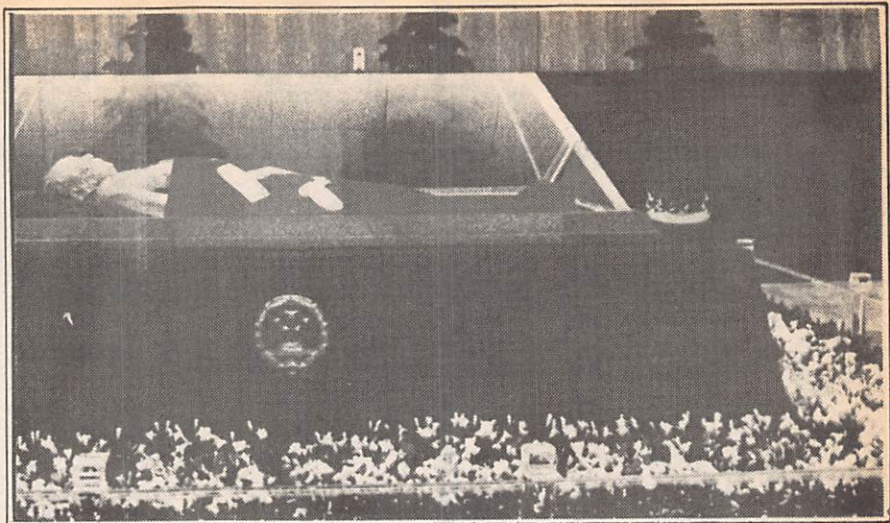
這一段麗女貞魂爲蕩子所誘，因一念之差，幾喪名敗節的故事，自屬荒唐無稽。然而作者對「蓋棺論定」一說提出了異議，儘管頭足倒置，陰陽易位，却仍值得稱道。人死了，死者對一生的所作所爲，再已不能增添什麼，減少什麼，其千秋功罪已無從更改了。誠然在人世間有的人開頭爲非作歹，壞事做盡，後來却又改惡從善，將功補過。如爲了圖謀賜九錫、登大寶而一度裝作「謙恭下士」的王莽。這類人死得早，死得遲，對其一生的名聲關係頗大。

。「警世通言」上說：「假使王莽早死十八年，却不是完名節第一個賢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好人麼？所以古人常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宋人有一首詩云：「少年胯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憐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滅文成。」這是來衡量每一個人的標尺。姑且不論，但他們主張要根據一生的表現，尤應注重晚節，却是完全正確的。

蘇聯的共產黨首腦赫魯曉夫，他死後葬身於莫斯科列寧山下的一座新聖母公墓，用不規則的黑白大理石裝合而成，是蘇聯雕刻家——應什爾斯基設計的。赫魯曉夫墓運用這樣的黑白大理石砌成，據說是表示他生前的功過是「對半開」。在中國曾經叱咤風雲、主宰神州幾十年而不可一世的毛澤東，今年九月九日是他死後的十周年忌日。他的一生扼殺人民民主自由，而爲一小撮高層人物服務。他心中早已沒有了「君以民爲本」的「龍心」。幾十年來他一黨專制統制下的中國，雖沒有那大幅度的「白骨散平原」之態。但君不忘：「在物質豐富之天府之國的四川省中，幾十斤糧票可以換一個女孩子；富庶的廣東僑鄉，只要三百元港幣便可買到個男孩。……人民的自由民主，法律大典完全沒有兌現。九年前華國鋒爲他死後

而奠基並提詞「毛澤東主席紀念堂」，九年後的今天，華國鋒今又落在何方？日月循環，乾坤輪轉由此可見，在階級社會裡，「蓋棺猶難論定」，階級偏見是一個重要原因。人們對歷史事物的認識，始終是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這個過程既不會因「蓋棺」而告終，也不會在墓木將拱時結束。特別是經過了一次社會制度和生產力的革命變革之後，人們的認識能力，就會進入一個更爲璀璨，更爲開闊的境地。

汪精衛於辛亥革命之初，貌似極端「革命」，他的「引刀求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也曾傳頌一時，但此人因搞暗殺而入獄之前，就跟清室重臣袁世凱掛上了鉤，心懷二志，後來異國入侵，他又立即變節投降，賣國求榮。前後一對照，人們就發現，他年輕時的「豪言壯語」，頗類「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亡命徒的聲口無異了。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一個人的性格發展，有其一定的規律，人們可以透過撲朔迷離的現象，抓住本質；從蛛絲馬跡之中，發現線索；根據他的過去和現在，推斷他的將來；從而作出確切的評價，特別是經過歷史的長河「沉澱」之後，「一時之譽」和「一時之謗」的迷霧消散了，本質和真相就會格外分明。中國在一黨獨裁下的近代史，是一本富於戲劇性的演唱提綱：「當林彪被毛澤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毛澤東這個暴君對他們的污辱。

東提議是可靠的接班人時，六九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一幅油畫上竟繪了他和毛澤東在井崗山上會師，當時氣煞了朱德；九、一三事件後，林彪機毀人亡，歷史又把平型關大戰說成了是毛澤東的親臨前線指揮；毛澤東到馬克思那裡報到去了，戲劇性的歷史又演出了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當主席，却可惜華是在中國一掠而過的流星；如今胡耀邦當道，目前解放軍報紙又刊登了胡在長征時的功績……」總之，

萬物應須經過了歷史長河的「沉澱」之後，那本質和真相就格外分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毛澤東說的，但還不妨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評價歷史的主人。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作用，就是評價歷史人物是非功過的唯一準繩。歷史是無情的，人民才是公正的。馬克思說：「拜倫和雪萊的真正區別是在於：凡是了解和喜歡他們的人，都認為拜倫在三十六歲逝世是一種幸福，因為拜倫要是再活得久一些，就會成爲一個反動的資產者；相反地，這些人惋惜雪萊在二十九歲就死了，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馬克思對拜倫和雪萊這兩顆英國詩壇的巨星，作了入木三分的相關分析。由於人們的時代和階級不同，立場觀點不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往往會迥然不同。國內的人們在背後常說：「假如毛澤東早死二十年，劉少奇多活二十年，周恩來或比毛澤東長命十年，中國人民就有福份了。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不正走了二十年前劉少奇提出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路嗎？」說來也是有些歷史的，唯物的。過去曹操就被當作奸雄的典型，所以往往在舞台上出現的曹操多飾扮白鼻子。王安石也被稱作「拗相公」，中國的農民起義英雄一向被誣爲盜賊，而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曾國藩，却有人奉爲「萬世師表」，賣國的慈禧太后，也成爲江青目中的「英主」。一個秦始皇，或褒或貶，衆說紛紜，吵吵鬧鬧地爭論了二千年，直到前不久「四人幫」搞「批儒評法」，還讓牠當了一回大棒，用來壓制民主，現在這個案終於又翻過來了，回到文革前比較正確的評價上去了。荆軻刺秦王，毛澤東說成了他是歷史小丑；而毛澤東又在評水滸一書中說及：「宋

江可惜的是只反州官不敢反皇帝，後來宋江給宋皇詔安變節了。」這豈不是他說話詞而反詞語嗎？荆軻刺秦王說是小丑，宋江受宋皇詔安反正又說是可惜。總之，圖畫的輪廓是受著歷史的條件制約的，而這幅圖畫描繪客觀地存在著的模特兒，是無條件地要低下頭去接受當時主宰歷史者的筆下「勾勒」和「著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蓋棺論定」，只表述了對相對真理的追求，「蓋棺猶難論定」，才表述了對絕對真理的雄辯。

「忠奸昧於一時，榮辱分於千載」，此爲千古不移之論矣。秦檜用「莫須有」的罪名，誅殺岳飛在前。毛澤東搞十年浩劫戮墓鞭屍，毀岳墳在後。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的詩句，秦檜像扔進了西湖使得湖水發臭的傳說，表達了人民最強烈的愛憎。魏忠賢一時炙手可熱，生前建生祠，死後享榮哀，但是到了清初，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瓊的一本題奏，他營葬在香山碧雲寺後的墳丘，就落了個「僕毀平鏟」的結局。張瓊有記事詩云：「堯舜除四凶，海內稱平章，誅惡及勝國，來者心自藏。」這就是歷史的殷鑒。

蘇東坡詞曰：「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究其實，風流人物決不會淹沒在浩渺的湮波之中，時代的歷史長河洪水愈是浪大流急，就愈是把風流人物的真與假、虛與實洗滌得分明。像毛澤東等扼殺人民民主，在馬克思主義那些陳舊不堪的陳詞濫調愚弄下的中國人民，終須有日把這些生前蒙著一張人皮，欺世盜名，禍國殃民的城狐社鼠牛鬼蛇神之輩還其本來的面目，把他們的鬼魂，從陰曹地府裡押上歷史的審判台，這和爲被他們誣陷罹難、含冤地下的英烈平反昭雪，恰好是一輛車子上的兩個輪子。

關於民運策略的一點看法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魏碑

編者按：魏碑同學這篇文章，談到了海外民主運動如何在國內發生實際影響，也談到如何促使中國大陸執政的共產黨發生良性演變。這些問題，的確是民主運動所面臨實際而又迫切的問題。文章着眼現實，引人深思！希望廣大讀者看過此文後，寫出您的見解來，以促進民主運動深入發展。

海外和香港刊物中有關大陸的言論，大多斷言中國欲達四化，須立即結束一黨專政，放棄四個堅持，徹底建立西方一樣的民主政治制度。即使「中國之春」這樣的趨理性的刊物中，大多數人也還堅持著這個立場。但以真正現實的、理性的、策略的眼光來看，這個主張便大有可商榷的地方。筆者下面寫出一些不成熟的個人想法，與各位討論。

一、現實性與可能性

本人來美不久，對當今大陸的狀況略知幾分。長期的專制高壓和封閉政策，使國內人民對現實大都持以得過且過的態度。共產黨的威望在人們心目中雖已大大降低，但相信國民黨或其它什麼黨能成氣候者畢竟還寥寥無幾。黨員還有千千萬萬，其中堅持信念、嚴於律己的離程度不同，但還不乏其人（尤其在知識份子

階層中）。第一梯隊的領袖還在掌握大局，由老一輩親手培養提拔起來的後繼梯隊也正在和將要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在這種狀況下，要讓中國的當權者在近年內全面否定自己，放棄領導，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必須看到，雖然步履緩慢，時曝時寒，但當權者在近年內畢竟變得更加開明了些，更加寬容了些。如能持續下去，並且加快步伐，便不是沒有希望。

值得海外人士注意的是，一切主張都必須首先考慮其實施的可能性。海外許多學者常常是張口古代如何，近代這般，再觀今日發達國家，各種現成的妙方比比皆是，便認定拿來一用即可手到病除。但筆者看來這些大都是些遠離實際的空談。中國現有的國情，絕不是照搬西方什麼東西能解決問題的。洋人能有今日，亦是一步一個腳印，一把血汗而得到的。過去的中國為何資本主義沒能成功？為何現在沒有多黨的輪流執政？為何至今實現不了真正的民主選舉？理由可以有千百條，但最關鍵的還是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現這些東西的足夠條件。有人說歷史上有過多次變革良機，但被某人斷送掉了。但為何某個人即可斷送中國的前程？還是條件不夠成熟，國情民情不容。孫中山、蔣介石要效仿西方的資本主義，但開始是軍閥混戰，梟賊竊國，後面是千百萬無衣無食的農民等不急，跟共產黨造了反，這就是國情。故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只能在吸取外來經

驗的同時，中國人去創造。

筆者以為，無論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最終目的無非都是要讓人類享受高度的文明。各民族國家國情不同，機遇不同，實現最終目標的方法就不可能一樣。為何非要非此即彼，或是有我無你？亦此亦彼，我中有你不行嗎？英美建成了資本主義，蘇聯創立了社會主義，中國就為何不可搞它個非資非社，亦社亦資的什麼主義？！

形式的東西沒有死爭的必要，改革其實質內容才是重要的。應該注意到，看來並非明智的「四個堅持」，在大陸貫徹的幾年中已有了一些實質性的改變。喊著堅持馬列毛澤東思想，毛的許多謬論和劣舉不是已被公開否定了嗎？喊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的一些有效方法不正源源而入了嗎？由此設想，如能在領導體制中實行真正的民主，使每個當權者都有才有德，不謀私利，就算他們每人都掛上個黨員的牌子又有何妨？在法制方面，如能從憲法做起，興起一個民主的立法運動，在各行各業讓法權代替黨權，並定期修改完善，「無產階級專政」亦可過渡成爲真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制度。

雖然「四個堅持」與「體制改革」將在一個時期內並存下去，任何一方的完全放棄都不大可能，但不可不讓「堅持」姑存其名，讓「改革」突飛猛進？筆者認爲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這也正是民主運動現階段最有效的努力方向。

二、可能性與影响力

從這個角度出發去想問題，面前的視野就開闊了許多。例如關於「一黨專制」的問題。

海外要求共產黨放棄領導，鄧小平不答應，胡耀邦、胡啓立也不會答應。讓群眾起來推翻政權，現在顯然也沒多大的可能性。而中國的現狀也是非變不可的。民主政治如不實現，中華真正的騰飛則全無可能。

關於這個矛盾筆者有個想法。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目前有兩套系統，即黨、政系統。如能在第二政黨不能產生的前提下，使這兩系統變為真正能夠互相協調，互相監督，互相制約，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成功。中國大陸以前已實行過全國人民代表的全民選舉，經過努力，應該能夠實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的定期民主選舉（開始可先在基層實行，逐步上引）。選舉產生的各級領導仍分為兩套系統，其一為行政、政府系統，其二為監督、制約的委員會系統，且兩者要有一定的任期（如四年）。行政系統人員在各級擔任領導職務，有明確的職權範圍。而某些規定屬於較為重大的決定需經同一級別的監督系統人員集體審議，經表決決定或通過，或修改，直至全部否決。如此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級別均有自己的執政者和監督委員會，從而在人事變動、生產管理及各項政策的制定、實施上實現互協與互制。另外規定，某級別以上當選的執政和監督人員一律成為黨員，一旦免職或到期離任則黨籍隨之取消。這樣既堅持了黨的領導，又保證了黨員的人民公僕的性質和純潔性。針對國內現有的體制，各級執政系統人員可從目前的各級政府人員中改選產生，與上至人大、國務院、各部委，下至省、市、地、縣、區的各級政府相吻合；而各級相應的監督系統人員可從目前的各級黨委中改選產生，與上至黨中央，直屬各級黨委，下至各省市、地、縣、區各級黨委要相吻合。這樣，即真正堅持了黨的領導，且解決了黨政分

家的難題，又可克服專制的弊病，吸取了英美聯邦議會制之長，從而形成一種新型的一黨兩系（政治體）制。

這當然是一個初步而粗糙的設想，但未必不是一個可能、可行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如廣大學者、專家們願意從這種角度去思考問題，是大有可為的。

另外一個方面，筆者認為，海外的民主運動必須引起國內廣大知識份子、學生和先進民衆廣泛的共鳴，這是中國民主政治得以實現的前提。相比之下，以建議和主張達到影響國內當權者的目的是第二位的。海外民運的開展，應把如何影響、啓蒙國內的人民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目前國內的信息流通還相當的閉塞，有關民運的宣傳品還極少在一般人中流傳，這固然與當權者的嚴格控制有關，但與宣傳的內容也有很大的關係。言辭過激，首先會遭到查禁，這樣許多人處於自身的考慮就會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而少數接觸著的人又未必能全部同意和接收其觀點主張，如此傳播效果便大大降低了。

故對國內的宣傳，一是要考慮人民的覺悟水平和接受的效果，二是要儘量避免當局查禁的可能。針對現階段國內的狀況，筆者建議海外民運團體可組織一些論述美國和西方憲法精神、西方人民追求獨立人格精神的文章輸入大陸，首先讓廣大人民知道，「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天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力，於是人類才建立起自己的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產生出來的……」（「聯邦憲法序言」），並使人們明白「如果人民得不到政府的良好服務，則咎在人民；如果政府政績修明，則功在人民」（「美國政府簡介」）。這些基礎思想是一個民族振興所必不可

少的。中共多年亦宣傳「人民的主人翁精神」，難以對這些言論下禁令。故這樣的宣傳品便有可能在國內迅速流傳，大量複製。人民廣泛地接觸和接受了這些思想之後，中國的面貌就會是大不相同的了。有了思想基礎，有了有思想基礎的人民，正確的治國之策便不難產生，形成良性循環的連鎖反應。

三、最終要靠民衆

海外的民主運動中，民聯無疑是一支引人注目的重要力量。她與大陸的留學生和國內的一些人士有著相當的聯繫，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有利因素，但也存在著一個危險性。搞不好的話，一大批寶貴的、有志有識之士將長久地被視為異端而報國無門，這豈不是一個民族的損失？而搞好了，不但能夠對國內的政策、措施有所影響，而且將為提高國內廣大人民的民主素質做出重大貢獻。祖國最終會敞開懷抱迎接自己的赤子，使他們得以大展宏圖，成為民族振興的中堅。

廣大的留學生得以機會鑽研、了解一切先進的文明和思想，得以機會站在有利的地位比較各民族、各國家的長短與得失，得以機會充分獨立思考並自由發表意見，則我們就更加義不容辭地應為我們的民族多做一些貢獻。有利的是，隨著大陸政策的持續開放，海外言論必將越來越多地對國內產生影響；由於物質生活的一定改善，人民得以溫飽，也必將在人權、民主、自由上提出更高的要求，這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此形勢之下，海外的民運團體如能以正確的策略，有效的方法持續努力，使民主思想迅速深入廣大民衆之心，則中華民族振興的壯舉就將真正地開始了。

自由民主與經濟制度的關係

——爲什麼自由民主的國家都是實行市場私有制度的？

(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 黃有光

兩類準則劃分四類經濟制度

區分經濟制度之主要標準有二，一是生產資料之所有制，二是經濟決策之方式。根據第一項標準，可分爲主要是私有制的經濟和主要是公有制的經濟；根據第二項標準，可分爲分散決策而主要由市場機制來調節的經濟，和主要以中央指令式決策之經濟。

這兩個標準之聯合應用，可把經濟制度分爲四類——一、市場私有制，以美國爲典型例子；二、指令公有制，以蘇聯爲典型例子；三、市場公有制，以南斯拉夫爲典型例子；四、指令私有制，以納粹時代之德國爲典型例子。

市場私有制，除美國以外，還包括西北歐各國、澳紐、香港、台灣和許多其他國家；而指令公有制除蘇聯外，還有東歐各國、越南、北韓和中國等。但是，市場公有制與指令私有制，除上述典型外，很難找到其他的合適例子。至於納粹時代之德國，也只是很短的時期，而且是在戰爭的非常時期，何況其中央指令的程度遠不及現在之指令公有制國家。另一方面，南斯拉夫有很大的私有制成分，而其公有制，主要是各企業之職工所有制，實爲介於全民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制度。由此可見私有制

與市場及公有制與指令，有很密切的關係。

市場私有制度之優點

在市場私有制下，政府除了維持法治(包括對產權之界定)和提供公物(例如國防)之外，大體上讓人民在經濟上自由活動，包括自由消費、自由生產和自由工作，而以市場之供求，自動調節各個獨立經濟單位之間的活動。

市場私有制，有下述五個主要優點——

A、由於人類天生利己之心，私有制最能夠發揮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減低不必要的耗費，提高經濟增長率。

B、市場之自動調節，使資源大體上能有效地配置到各行各業，有效地生產出符合人民需求的物品和服務。

C、私有制使擁有資產者滿足其擁有慾，並使之有一定的經濟獨立性。這在共產主義者看來，好像是一個缺點，不是優點。但是，在大多數先進的市場私有經濟中，房屋、汽車與其他生活資料不必說，生產資料也通過股份的形式，由廣大人民所擁有，而非單單集中在少數大資本家手中。

D、市場私有制使人民擁有最大的經濟自由，在個人的能力範圍內，人們有從事各種企業、各種工作與選擇消費各種產品的自由。在

指令式制度下，消費者雖然也有相當程度的選擇已經生產出來之產品的自由，但大體上沒有透過其選擇來影響社會之生產的權力。至於消費上的配給制與工作上的分配制對人民經濟自由的限制，則更不在話下了。

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B、市場私有制下的經濟分散決策，有促進政治上之自由與民主的作用。一方面，人們若與老闆意見不合，最多另謀出路；但是，在指令公有制下，全國工作由中央統一控制，與中央有不同政見者很難在職業上有順利的發展。因此，除了少數義士，難有敢在政治上與中央唱對台戲的。另一方面，由於經濟決策之分散性，方便與中央持不同政見者進行活動。例如有許多私人出版商與印刷商，不必經中央批准，即可進行出版之工作。反對市場私有制的「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都是在市場私有制下印刷出版的。世界上真正有自由與民主的國家，都是實行市場私有制的。這些事實，並非是偶然的。

當然，不是所有實行市場私有制的國家，都有自由與民主。即使是在市場私有制下，專制的政府還是可以通過政治上的手段(禁令和逮捕)來扼殺自由與民主。也就是說，市場私

有制不是自由民主的充分條件，但却是其必要條件，至少是有利條件！關於指令式之中央計劃爲什麼一定會導致政治上的極權，見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海耶克（F.A.VON HAYEK，一九七四年贏得該項殊榮）之「走向奴隸制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

事實勝於雄辯

有人對實行市場私有制的國家，與實行指令公有制的國家，進行經濟發展速度的比較，得出前者較後者發展爲快的結論。這種比較，雖有其一定的意義，但由於條件不同，亦有其不可比性。

蘇聯建國後，其經濟發展速度比美國快，但這並不意味著蘇聯的經濟制度比美國好，更不意味著蘇聯人民比較幸福。

當時，蘇聯發展比美國快，一方面是因爲蘇聯從相對低得多的水平上發展，可以借用先進國家的許多經驗與技術；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式束緊人民腰帶的高積累政策，以犧牲一兩代人民的福利換取來的。其次，由於指令式公有制在滿足人民實際需求上的無效性，即使是到了今天的水平，蘇聯人民的經濟福利，恐怕還比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人民低許多。

再說，影響人民福利的不只是經濟因素，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政治上的自由，都有莫大作用，而這些因素又受到經濟制度之影響。

要較全面地在實際上來比較不同制度之優劣，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比較「一國兩制」的情形。試看，只有人從東德逃到西德，那有從西德逃到東德的？若沒有柏林圍牆與嚴密的看守，東柏林一夜之間可能會成爲空城。

試想，離鄉背井，失親散友，在福利上的損失有多麼大？但是，仍有許多人願冒著死亡的危險，投奔市場私有制。那些還相信指令公有制優越性的人，實在是完全漠視事實！

市場私有制度之巴列圖最優性

看完事實，再來講一講理論。爲什麼在自由競爭的情況下，若不考慮外部成本（空氣污染）等複雜因素，市場私有經濟能使資源作最有效之配置，而符合巴列圖最優性之所有必要條件呢？

在市場私有制下，各種有經濟用途的物品與勞務包括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甚至包括無形的商譽與發明權益，其所有權受到法律的界定與保護。各物品與勞務之所有者，決定其最有利之用途，或自己消費，或賣給別人，或連同其他東西來進行生產，轉變成產品，再賣給出價最高者。由於各所有者在自利的動機下，尋求價值最高的用途，因而能使資源作最有效之配置。

例如一個農民，有自己私有的土地與其他資產，他可以決定其最佳用途，假定是用來養雞。爲使其養雞業獲利極大化，他將選用最適當的雞品種（不一定是最貴的），最適當的飼料和人工。他也要千方百計減低養雞成本，及在同一成本水平下，力求使產量之價值（因而考慮了質量與消費者之需求）爲最高。

雞或雞蛋生產出來後，他會決定多少由自己消費，多少出賣，或直接運到市場賣，或賣給商人。由於有自由的選擇，他將選擇最有利的的方式。因此，不論是在雞種的選擇、小雞的照顧、雞蛋的售賣過程中，除非是在缺乏應有信息之情形下，該農民都會採用最有效益的方

式，而符合巴列圖之生產最優條件。另一方面，在特定所得分配的條件下（所得分配不均之問題，以後再談），由於消費者要得到雞蛋，必須付錢，而雞蛋之價格，在有競爭的情形下，由市場之供求決定，因而雞蛋被認爲其價值最高的消費者所購買，符合巴列圖之交換最優條件。

日益繁榮的大陸農貿自由市場。



如果消費者對雞蛋之需求增加，則短期內使價格上昇，鼓勵人們節約供不應求之雞蛋，也對雞農提供多生產雞蛋之信息。雞蛋之生產增加後，價格回跌至成本水平，而產量由對消費者之價值與成本之間的均衡來決定，符合巴列圖之高級條件。（詳論見拙作 Y. K. NG: WELFARE ECONOMICS 書第二章。）

福利經濟學證明，在一定條件下，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私有經濟能滿足巴列圖最優性的要求，但這並不是證明其他制度不能滿足此要求。有如 P. WILES 所說，在理論上，有三種方法能達到資源之最有效配置（見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一書，頁一八九）。

為什麼非自由市場經濟不可

甲、完全競爭 (PERFECT COMPETITION)，這與 LERNER 的名字有關。
乙、完全核算 (PERFECT COMPUTATION)，這與列昂節夫 (W. LEONTIEFF, 一九七五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的名字有關。

丙、完全調節 (PERFECT CENTRAL ADJUSTMENT)，這與蘭格 (OSKAR LANGE, 一九〇四—一九六五，波蘭著名經濟學家) 的名字有關。

上述第一種方法，即是在市場私有制下的完全競爭。第二種方法，即由中央核算，指令進行資源之配置；它與列昂節夫的名字有關，是因為他是投入產出分析之創始者，而中央指令計劃大都採用投入產出法。

其實，投入產出法之應用，即使達到理想

的地步，最多只能使計劃取得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例如煤的總產量等於煤的總使用量，並不能取得資源配置之巴列圖最優性，例如煤的總產量是否應該增加或減少，在生產煤的過程中，應該多用資本或多用勞工等等問題，並不能用投入產出法來解答。

比之於真正能使資源之配置符合巴列圖最優性的完全核算，投入產出法不是一個嬰兒，而只是一個胎兒。要用中央完全核算來達到資源配置之最優性，必須把各個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信息集中起來。這些信息包括消費者對各種不同產品的偏好，勞動者對各種不同工作的偏好，各種不同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各種新企業、新產品的可能性等。這些信息每個都是一個複雜的函數，不只是一個數目。這千千萬萬個函數，集中之後，得由比現今世界上最大的計算機要大萬倍的超級計算機去核算，才能算出最優解。

其實，即使將來計算機發展到能解這複雜問題的高度，完全核算還將是一個空想。第一、有關的信息不可能集中起來，各個信息擁有者沒有真實準確匯報信息的動機和能力。第二、即使能集中起來，但情況仍不斷變化，要及時跟上最新的情況，唯有用市場機制，隨時自動調節。

蘭格模式的漏洞

上述第三種方法，完全中央調節，是由蘭格在其與米賽斯 (VON MISES) 的論爭中提出來的。後者認為在公有制下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經濟核算，因而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經濟生產。蘭格提出中央調節法，由一個中央訂價

局決定各種產品的價格，令各企業以成本最低的方法生產各種產品，產量以邊際成本剛好等於價格時為止，並使各產品按所訂價格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對供不應求的產品，訂價局提高訂價；對少人問津的產品，則降低訂價。蘭格認為這個方法，也能和完全競爭一樣達致巴列圖最優性。

為了與英文原文相同，WILES 把上述方法譯做「中央調節」。其實，更正確地說，它是「中央訂價，市場調節」。因此，即使此法行得通，也不是說不需要市場。

蘭格模式提出後，有人認為蘭格勝利了，公有制下也能進行有效之經濟生產。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大諷刺，因犧牲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與財產而換來的革命成果，建立有優越性的新制度，必須模擬舊制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進行經濟生產，革命義士在九泉之下有靈，必會痛哭不止！

更重要的是，蘭格模式本身有問題。中央命令企業經理以成本最低的方法生產至邊際成本等於價格之產量，但經理是否想這麼做呢？為了悠閒或討好本企業職工，經理可能並不想使成本降低，對此，中央如何知道及如何處理呢？再說，有效的經濟生產需不斷考慮新產品之生產，企業之新陳代謝等，這些蘭格模式都沒有考慮到。

必須允許私有制的根據

蘭格模式的問題，牽涉到非允許私有制不可的問題。如果企業之經營者，也是企業之擁有者，則他必有適當的動機，使其成本（在給定產值下）極小化，以增加利潤。對許多適合小型經營的農業生產和服務行業等，這是顯而

易見的。中國實行農業集體化的痛苦經驗更是上述論點之證明，這是大家公認的。但是，對許多大型企業，即使是在市場和私有制下，也是採用股票公司的形式，其經理者不一定是主要擁有者，但是，為什麼非私有制不能進行有效益的生產呢？

有許多產品的生產，有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小型生產單位成本太高，須由大企業進行生產。另一方面為分散投資與生產上的風險，也促成企業之產品化與股份化。但是，大型企業也有其管理上與動機上的困難，因而不一定是越大越好。讓擁有者自己經營之企業、股份公司、合作社等用不同方式，在市場上自由競爭，由消費者與投資者自由選擇，則能在規模經濟與規模不經濟之間得到一個適當之折衷，並在各行業中使最適當的企業形式得以存在。

大企業的中低級職員，與公有企業的職員，同樣不是為自己的荷包工作，若用同樣的管理方式，應該有同樣的生產積極性。雖然由於上述原因，私有大企業的管理比公有企業較有效，但其中低級職工，也有生產積極性不足之問題。既然一個大型企業是經得起市場之自由競爭之考驗，而得以生存與發展，則可見其在規模經濟（包括風險之承擔）上的得益，必多過管理上與積極性之損失。可能不一定非私有企業不可，但必須允許私有企業有自由競爭的權利，才能發揮人民之企業才能，才能使最適當的企業形式得以發展。

即使是在西方先進國家裏的公營企業，其生產效率也往往比私人企業低很多。據估計，澳洲維多利亞國家電力局，若由私人企業經營，成本將會減半。

股份公司的經理，不一定是股份之主要擁

有者，他為公司賺的錢不是裝入自己的銀包，這和國營企業的經理有什麼不同呢？

公營與私營企業主管的不同處境

第一、私人企業之經理必須面對其他企業之競爭，為生存而提高效益，而國營企業大都由政府給予壟斷地位。

第二、私人企業之經理必須面對股東，為股東賺錢，而國營企業則往往靠政府之財政津貼。

第三、私人企業之經理必須面對被收購的危險，如果不設法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競爭對手可以向效率低的企業之股東，提出較優厚之條件。被接收企業之經理，即使不必另找出路，也將淪為次級經理。

由此看來，公有企業並不一定不可存在，但必須取消其壟斷地位，讓它與其他公有企業、私人企業及入口貨自由競爭。除了有充分的理由，公有企業不許虧本，至少要賺取所用資本之平均利率。另外，公有企業也應當面對被接收的可能，若其表現欠理想，應將它賣給或租給私人經營。中國由於已有大量之公有企業，不一定要也一定能很快轉變成為私有制，但應考慮採用上述三點改革。也就是說，實行公私相互自由競爭的混合經濟制度，以探索那種制度最適合各種不同行業及中國的具體情況。

中國飽受公有企業缺乏生產積極性與靈活性的拖累，最近擴大企業自主權，允許利潤留存，這在某種程度上有點像南斯拉夫模式。其實南斯拉夫在許多中小型生產單位上都是採取私有制，在大企業則採取職工所有制。這樣稍微提高職工之生產積極性，使職工與企業掛鉤，及實現企業內之民主，減少工潮等作

用。但是，它也有難以解決之大問題。

南斯拉夫模式

在職工所有制下，企業大體上追求平均每位職工利益之極大化，而不是總利益之極大化，因而在僱用新職工方面，採取保守的政策。也就是說，企業避免多僱用新職工，以免多人分享利益，使每人平均利益下降。南斯拉夫的失業率在歐洲各國中為最高，並不是偶然的。這在要解決千萬待業青年的中國，無疑是一個大問題。

其次，即使不論效益，而談社會公義，職工所有制是否優於私有制呢？在私有制下，是由提供資本者按所提供資金之多少來分享利潤。若其資金是由正當手段賺來，不是用欺騙、強迫、濫用權力、走私漏稅等方式，則除了所得平均與否之問題（以後再談），並沒有不公正，更沒有剝削。在職工所有制下，有幸在盈利高的企業工作者得利，不見得與其本人之努力有關，是符合社會公正原則，更是一個問題。

市場私有制雖有很重要的優點，但它本身並不足夠。首先，它必須有嚴明的法治，與論自由和政治民主來支持，以免資本與官僚勾結，壟斷市場，魚肉百姓，像舊國民黨時代的情形。中國文人向有看輕金錢（「臭錢味」）的傳統，這實在是受了在法治不興下，金錢之不正當來源與不正當用途所影響。在法治鮮明的英美，有錢人有較好的形象。問題不在於金錢或市場私有制，而在於法治不興。若法治不興，即使實行指令公有制，不義之士是可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力或濫用權力，這比濫用金錢還更使人厭惡，更對社會民生不利！

自由神·華裔·中國人

(中國大陸旅美學學者) 胡務實

美國人民和政府，為紀念「自由神」在紐約港豎立百年，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修建神像。目前，耗費六千餘萬元的工程已大致完成，新像於今年七月四日重新揭幕，紐約慶祝四天，全國其他城鄉也都有一番熱鬧。

自由神——移民之神

自由神雖是百年前法國人民贈給美國人民的禮物，以紀念距今二百年前法美携手聯合抗英的友誼，實際上，它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民主政治開始發育成長的象徵。就美國言，刻在自由神座台旁的「新巨人」二詩，道出了二百多年歷史的主題：這是移民建立的國度。作者安瑪·拉撒歷士(EMMA LA ZARUS, 女)指出：「這不是渡洋遠征的希臘英雄；這新巨人是浪子們的母親。她右手舉火炬，歡迎世界各地流浪或被放逐的人們。」在詩人的想像中，自由神用她不動的嘴唇，向舊世界

的統治者們吶喊：「守著你們的老巢、你們的虛榮吧。讓那些疲乏的、貧困的、你們認為已無利用價值的、擠擁在一起等著呼吸自由空氣的人們，都到我這裏來！把那些無家可歸、苦海餘生的群眾都交給我，我要為他們在黃金門旁舉火。」

事實上，美國的確是移民締造的。除了土著的印第安人外，今天的美國人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或其子女。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事。地球上所有其它別的國家大多是用武力造成的，近代也有些國家是經過百年、千年歷史的衍變而在地圖上出現的。祇有美國是由各色各種的移民建立的，而這一個過程直至今日還在進行中。在五十萬東南亞難民加入行列之後，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每天都有許多人等候簽證來美，參加繼續建國這一大業。

人們移來移去，古已有之，原不足奇。事實上所謂美洲土著也是二萬年前從西伯利亞移過來的。但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世界各角落的人都來美定居，的確是一罕事。此舉除在新

大陸建新國家外，其異於歷史上別的遷徙者至少有下列兩點：

第一是規模之龐大。一八二〇年前，聯邦政府還沒有人口統計數字時，歐裔就約有數百萬；從該年至今，合法的移民已超過五千萬。這種大舉遷徙，連人口衆多的中國也未曾有過。北宋時，華夏物質文明發展至古代史上的極峯，人口遠比西晉多，但南渡時康王(後來的宋高宗)帶走的還不祇是少數的統治階級？

其次，移民中除黑人的祖先外，都是自願的。他們甘心放棄原有的文化，包括風俗、習慣、語言，甚至宗教。他們抵美後，並沒有分別建立「新英國」、「新瑞典」、「新波蘭」、「新以色列」等等，而是都自願成爲美國公民。這一點並不難了解。舊世界太使他們失望了：君主貴族踐踏他們的人權；舊日的國教壓抑了他們的信仰自由；僵化的階級社會不讓他們盡其所能。加上本土人口漸增，生計日困，當機會平等的新大陸向他們招手時，便決心離鄉。



自由神（一八八六～一九八六）

自由·多元的組合與貢獻

解放前，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先生寫過一本名為「政學罪言」的書，其中有「致遊美同學」的一封信，大意說：中國人的樂事除洞房花燭夜外，應是登上了駛美郵船行將離岸的一刹那，蓋機會難得也。他特別勉勵各同學在盡力學習本科之餘，要多留意美國人特有的向心力：膚色和文化背景不一樣的人，都愛國。法裔艾森豪威爾率盟軍攻陷隆美爾的「大西洋長城」，夏威夷的日裔師團在星條旗下戰績彪炳，都是人皆共知的事實。美國之所以能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融在一起，得力於形形色色的各種民間團體，包括政黨、商會、工會、體育會、扶輪社、獅子會等各學科的學會，各式各樣的俱樂部 and 各種教會等等。這些民間團體都由人民自動組成，數目之多難以想像；在培養共同興趣之間，種族、國別、文化背景等界線便逐漸泯滅，外國人都變成本地人了。

今日絕大多數的美國兒童都進公立學校；

這些縣市自辦的學校，可以說是「美國人」的製造所。公民的子女固有入學之權，連非法居留者也可以送其在國外出生的下一代進學校。聯邦最高法院還判定：那些盡維持學校經費義務的地方人士，不得藉師資不足，設備不夠而加以拒絕。蓋公民教育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而民主正是美國之所以使人嚮往的重要因素。

歷史證明：公立學校確已把各種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熔鑄成爲美國公民，但還沒有消弭膚色的界限。移民們從舊社會帶來的種族歧見（特別是對黑人的），並不因時移勢易而泯滅。黑白同校雖是六〇年代才開始的，但在二十多年後的今日，總的來說，美國社會距「天下一家」的理想還遠。先來的移民，在成爲既得利益階級之後，多不願看見後來者居上：既和他們爭飯碗，又和他們奪政權。白人之間，除歧視黑人外，北歐人歧視南歐人，西歐人歧視東歐人，美國南部人歧視拉丁人。西部人也曾歧視亞洲人——華裔當然在內。

關於華人移美的歷史和華裔社會的近況，中外學者做過不少調查研究，這裏不必再贅。應略提的是：自一九二〇年後，美國移民的來源有了改變，除歐洲人仍在東岸繼續登陸外，

墨西哥人和加拿大人成爲移民潮的主流；亞洲人在西岸和夏威夷定居者也日多。一般而言，祇要別處有戰禍或動亂，美國人口隨即增加。較遠的不論，韓戰、匈牙利革命、古巴政權易手、蘇軍入捷、越戰等，都導致了大量移民的湧入。中國的抗戰和內戰自不例外。

華人發展何其艱難

事實上，早在一八六九年初，美國中部東西兩大鐵路接軌，火車可以橫貫新大陸以前，已有不少華人來美工作。當時大部分人在西部築路、採礦、開餐館和洗衣店等；也有人零售雜貨，在農場幫傭，甚至作傭工。初時，華人的刻苦耐勞、做事負責的態度往往獲得好評。到了鐵路逐條建成，就業機會日少，肯接受當時最低工資的華裔，便成爲被歧視的對象。一八八二與一九一七兩年間，國會先後通過以華裔爲主要對象的排亞（洲人）法案，特別規定非土生的華人不得購地，不許歸化；才智之士也不爲政府和大企業錄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扭轉了這一情勢，一方面中美是盟友，排亞法案理應取消；二方面由於戰時亟需人力，華人也被徵召，其表現一般不比白人爲差。一九四三年，抗戰還未結束，美國政府根據一九二一與二四年的限制各地移民來美之法案，規定華人的移民配額每年爲一百零五名。但這並不證明華人在移民方面已獲平等的待遇，蓋這兩年的配額，是根據一八九〇年時在外出生而居美的人口數字而作出的比例。這一計算方法使來自英倫三島和北歐的人佔盡便宜，連東南歐的移民也吃了虧，亞洲人更無論矣。但華人因排亞法案的取消可以從事白領階級的職業，和遠離比較擁擠的「中國城」，總算是一大進步。

中國內戰期間，每年都有不少人來美留學。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後，由於國內情況不穩，大多數學成的人沒有歸國。六〇年代初，港台兩地不少居民藉不受配額限制的移民法案來美；此後兩地每年留美的學生都以千計，而大多數都在美擇業定居。華人社會向來重視教育，子弟在校用功滋勤，加以美國政府選取入境的人員往往都是專業人才，因此，在過去半世紀內，就學位與入學年數言，華裔的素質已較一般白人為高，但其平均收入仍比白人略低，其原因可分三點略述：

首先，種族歧見未泯。六〇年代的公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祇做到各色人種表面上之平等，而當時因越戰而激發的學生運動，雖拆穿了既得利益階級各種虛偽，但並沒有消滅各社群間之界限。同族類、同方言、同教會、同老家的，各自成群。這屬群性，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原不應影響每個人的「價值」。但人類「民族主義」這一「天性」，最低限度仍在許多中年以上白人的靈魂中躲藏著。現任克萊斯勒公司（CHRYSLER CORPORATION）董事長的艾亞哥加（LEE IACocca），其父母從義大利移來，他本人從福特公司的售車員一直升至總經理；若由此人此事觀之，福特家族定必用人唯才，不會歧視美籍義人。但艾氏在其自傳中，報導福特二世常在言談間用蔑語侮辱各族，也背著艾氏大罵義裔。這種排他心理在美國社會中還是常見的。華人樣子特殊，在白人社會中謀生和發展總會遇到阻力。

其次是文化上的衝突。第一代的移民基本上是中國文化之產物，置身於另一文化中便成為所謂「邊緣人」（MARGINAL MAN）。其心理上的不穩狀態正是他們對兩種社會都

有喜與惡、和諧與矛盾的反映。在無數的邊緣人中，祇有極少數能與過去的我劃清界線，完全接受新文化的再教育。有些中國學生，儘管決心改造自己，住在本地人家裏，連中文書報也不看，往來的也只是「白丁」；但昔日家中的庭訓，學校的教育，社會的傳統、風氣、習俗，以及各種價值觀念等等都千絲萬縷地纏住他們的靈魂。說得具體一點，本地人不經大腦便說出來的話，或做出來的事，他們都得先想一想，然後辦得到。這種邊緣人即使原來天賦甚高，或教育程度不低，也會在新環境中被人視為笨蛋。

最後是華裔的專業。過去和現在的留學生，唸理工科的佔大多數。美國基本上是一重技術的社會，實科出身的人求職較易，但這種人的生命往往祇消磨於工場和實驗室中，不會鑽入美國權力的「精英群」（POWER ELITE）。芸芸華裔中還沒有出現過一位陳納德將軍，一位艾亞哥加。自參議員鄺友良卸職後，二十年間竟無接班人。最近吳仙標競選特拉威州副州長獲勝，可謂本土四十八州空前之舉。由於華裔不從軍，不從商（當然是指大企業），不從政，本地人便認為儘管他們學業成績優異，也不過是受僱、聽命的一群。舊金山州立大學吳德璋校長原不欲擔任行政工作，但要「為中國人出氣」，讓本地人知道華裔也能管理一個大機構才勉強就任。這不是說理工不重要，事實上第一代移民的確需要真才實學來謀一技之棲；但第二代華裔宜擴大視野，即使學的是理工，也可兼讀商管，以冀打進公司的董事會；或讀些社會科學或法律，將來學優可仕；或唸人文方面的科目如新聞學等，以主持電視台的主要節目，則華裔的名聲和形象自會家喻戶曉。

大陸華人的發展

也許會有人問：王安不是大企業家嗎？當然是的。事實上，任何移民的第一代具王氏之目光、魄力、敢冒險而成功者，皆極少數。不過王氏固富，其聲望還不及艾亞哥加。一九七九年，艾氏初任克萊斯勒的總經理時，該公司的赤字還不到十一億，翌年增至十七點七億。艾氏乃得在華府遊說各議員和行政首長，終獲十億貸款。對內艾氏說服工會，要求讓步，撤換半數以上的企管人員，又得數以萬計的債權人寬限。經過三年苦鬥，終於扭轉乾坤。自一九八二年起，該公司開始賺錢，以後盈利屢破本身歷史的記錄；除直接間接維持近百萬人的生計外，還連本帶利歸還政府的借款，使納稅人不損失一個銅板。艾氏本人主持的電視廣告進入過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美國家庭；其自傳出版後，數月內一直是最暢銷書。雷根總統邀他出任自由神重建委員會的主席，他也把著作的收入約四百萬元全部奉獻出來。

在自由神百年紀念和巨像重啓之際，所有的美國人（移民和其子女）除追溯歷史外，定要展望將來。自東南亞難民陸續在此安居後，繼往者莫非中國人乎？現在，香港已有炎黃子孫對該地的前途不敢憧憬。有辦法的人先離港一次，取得外國護照或居留權後才回港操其舊業，伺機應變。過去，香港學生都留學英澳或加拿大，並不熱衷於留美，由於美國接納他們久居的可能性較大，今後來此的人數日增，似可預卜。目前，台灣和大陸學習英語之風，可謂如火如荼。青年們之用心，說穿了還是先留學，後定居。這在美國原無不法之處；事實上也是許多台灣學生走過的老路，祇是現在加入了一支來自大陸的生力軍而已。

紐約華埠孔子大廈是最大的華人建築物



大陸學生喜用「過關」這一詞語。他們學習英語文法孜孜不倦，以冀語言過關。假如過關是指藉字典之助，有能力看懂專業書籍和期刊，那還講得過去；否則祇露出他們的無知而已。首先，在中國學語法，與陸上學游泳相似；規則爛熟的人跳入水裏，其頭未必浮起。其次，比較重要的是，他們應著重「文化過關」，蓋在人類互通心意之工具中，語文祇是其中一種。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說話作適當的反應固非易事；一舉手一投足都具「洋」味也很難學。美國人也和世上別的人們一樣，其語文是日常生活的反映。要認真學美式英語，先得來美居住；要學寫文章，自應從「讀萬卷書」開始。

可是，人類是在孩提時代學語文的；所以，歷史上會出現曹植、王勃那些能詩能文的神童。人進入了青年時代，母語已在神經系統中定了型，要在另一語文環境中「出入可也」，

實際上已無可能。中國學生在外語上花費的功夫，一般而論，比美國土生唸英文多得多，但實效未必有一半。最近返蘇的鋼琴家賀洛維茲 (VLADIMIR HOROWITZ)，留美凡六十年，還是說：「我必須死在俄羅斯。」這話充分表達出邊際人的心境，蓋母語抓住了他的靈魂也。按賀氏來美時年二十一歲，已超過學新語文和接受新文化的適齡。這不是說他英語不行，祇是他的話還不是十足道地的而已。時代雜誌在五月五日為他刊出特稿，許賀氏為本世紀最偉大的演奏家；美國電視台付他二百五十萬元，作為他在歐五次音樂會的轉播費。這種美蘇兩國都認為「國寶」的人物，(言語、文(化)還能使他存著「落葉歸根」的情懷，則第一代華裔的精神苦悶可想而知。

中國人中，有的是「為下一代著想」而學外語，蓋欲藉留學或別途徑定居國外。這真是近代「龍種」的悲哀。假如「傳媒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一話是對的，則崇拜心理已達不可收拾之地步。事實上，中國人的各種問題不可能僅靠移民來解決。即使今日大陸門戶全開，人民可以自由出境，而北美洲仍是十九世紀初時的一塊大空地，千千萬萬的華人移入之後，還是建立不起美國的。中國人中，還沒有一位像第三任總統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 的領袖，會終身為人權奮鬥；也未曾出過像第四任總統瑪迪臣 (JAMES MADISON) 的人物，認定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保障。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人，祇會把「貧、愚、弱、私」移植過來。他們也許會東行瞻仰一下自由神，欣賞她右手高舉的火炬，但有多少人會看到她左手持著的是一本法律書呢？

● 文藝園地 ●

詩兩首

(中國大陸新移民) 草葉

一

夜
像一座橋，
從今天伸向明天。
晚風似心靈在低語，
向未來送去我的聲音。
夜把我們溶在一起，
我從一顆星，
走向另一顆星，
是過客，……
也是歸人。

二

在高高的天空，
我是你失去的夢。
白天也在燃燒，
無聲地去追尋永恆。
讓淚水流進土地，
把生命拋向虛空，
但我真實的存在着。
黑夜裏我悄悄走來，
期待着每一個黎明。



文化交流多得益善

東亞經濟文化發展研討會散記 馳 遼

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賓州頗可諾斯（POCONOS）的 WHITE BEAUTY 避暑山莊，亞美文化協會舉辦了一個「東亞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邀請了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旅美華裔學者一百多人參加，在會上提出了數篇論文，探討了東南亞文化、藝術、社會、政治、經濟等許多問題，以及中國與美國的新聞工作的良莠比較等等。

大會分成經濟社會組、科學工程組、文化藝術組和新聞座談會幾個部份進行了各專業的深入研討。在文化藝術組中，旅美畫家和詩人秦松，首先宣讀了論文「論東南亞文化藝術的現代化」，秦先生在論文中強調了現代觀念對古老中華文化發揚光大的重要性。他說，東南亞的現代化是各國的一致要求，已形成一種潮流。它不應夾雜意識形態的分歧，也不應西化，而應是東方人的內在思想的解放和外在物質環境變化的反映。藝術現代化更非人為的、社會的運動，而是現代人思索方法與感受的自然流露，是一種精神產品。秦松舉日本與中國的現代工業化革命起步為例，日本是徹底現代化，不僅軍事膨脹，而且政治、文化藝術、教育都出現現代思潮的膨脹。

東方人對抽象藝術有誤解，特別是官方，這並不奇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法國印象派就是在學院派反對聲中誕生的，中國大陸今天比其它東南亞國家晚了二十年接受現代藝術，但搞得好亦可後來居上。北京官方現在提倡現代

化，應是宏觀的，包括思想藝術等一切領域的現代化，不可有局限。當然，不要求官方提倡抽象現代藝術，只希望不要壓制即可。大陸如果宏觀現代化成功，北京為什麼不會成爲巴黎、紐約式的現代藝都呢？海外藝術家應從交流着手，努力輸送現代藝術信息進去。

之後，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的唐璞先生，做了「大陸人文精神的再研究」報告，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一位來自台灣師範大學的學人，做了有關東南亞現代化與音樂的演講。另一位來自台灣的學者周芬娜的報告，特別引起大家的興趣。周女士說，台灣對大陸作家的研究工作有很大不足，比如大陸女作家丁玲及其作品，在台灣文學中很少看到。她本人在反共資料中心才從「匪情分析」中知道丁玲女士多年受到迫害的情況，七九年後，她本人親自去大陸訪問了丁玲女士，才得以完成研究了丁玲的願望。

二十八日下午，新聞從業者舉行了座談會。黃紀瑞先生首先報告了本次研討會的籌辦經過。受到邀請的人士有（按姓氏筆劃序）：毛人浩（美洲華僑日報）、王嗣佑（中央日報）、李子堅（紐約時報）、和銘（經濟日報）、吳若思（中國日報（英文））、洪藍（人民日報）、施克敏（世界日報）、俞國基（北美日報）、陳憶村（人民日報）、陳國坤（中報）、黃肇松（時報週刊）、傅建中（中國時報）、張錫純（新華社）、張治平（上海文匯報）、雷素貞（美國時代週刊）、諸友鈞（中國新

聞社）、鄭心元（華語快報）、DELICE LI（哥倫比亞電視台）。但「中央日報」與「世界日報」方面的人沒有出席。

姜敬寬先生首先介紹了美國新聞界的概況，指出新聞的客觀性和獨立性，是新聞工作者所應奉行的原則。大陸「經濟日報」記者和銘則認爲，美國報紙有兩大弊端：第一是商業化，廣告太多；第二是色情化，什麼黃色照片都登。對此，姜敬寬先生解釋道：美國新聞事業是私營的，沒有國家和黨派的支持，因而爲了生存，必須登一些廣告，因爲賣報本身是很難盈利的。第二，美國的報紙在新聞管制方面，有一套嚴格的法律，限制色情和暴力照片的出現，對讀者亦有年齡限制。某些色情雜誌對未成年者是禁讀的。

鄭心元先生在發言中說，華語新聞界因財政上的關係，很難做到政治上獨立，故報導不免有政治色彩。鄭心元先生以「華語快報」爲例，談到維護新聞獨立的困難。但是他表示，新聞的價值在於真實、公正，沒有獨立就談不上公正。他表示不論有什麼壓力和危險，報人都應有自己獨立的風骨。

美國「紐約時報」的李子堅先生談到，就新聞報導來說，客觀報導和報紙觀點一定要分開。一般地說，新聞報導爲一版，報紙觀點爲另一版，不可混在一起。李先生還談到華人如何打入英語新聞界的經驗。

姜敬寬先生最後說：美國是法治的國家，美國的報紙很強調新聞真實性，不可報導傳說。新聞來源一定要有出處、要負法律責任。

上述這些觀點，反映了民主法治社會中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和新聞價值的重要性，以及對自由的理解。這些使大陸新聞界代表感到一定的震動和新鮮。

海外新聞自由豈容粗暴干涉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秦風

編者按：

關於「中國之春」記者參加亞美文化協會新聞座談會一事，我們收到了七位熱心朋友的電話通知後，方派代表參加的。我們認為，亞美文化協會本次同時邀請有大陸和台灣方面的代表，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有利於促進台灣海峽兩岸的相互了解。遺憾的是，中共方面的干涉新聞自由的做法，令許多與會者十分不愉快，給好端的盛會加了一段不協調的插曲。

在我出席亞美文化協會舉辦的「東亞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研討會」的過程中，碰到了一件粗暴干涉新聞自由的事件。我認為有必要把它揭露出來，以要求維護華人在美國的新聞自由。

據我了解，亞美文化協會是一個旨在促進亞洲東方文化在美國傳播的團體，並不帶什麼政治色彩，本次會議也力求促進大陸與台灣各方華人的溝通。但是，應邀出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先生，竟提出：若「中國之春」有人參加，大陸代表就不參加。當「中國之春」記者出席會議採訪時，亞美文化協會的一位「賴先生」向「中春」代表轉達了這個意

思，並請該記者不要錄音、攝影，但當時有十幾位其它報社記者在錄音和攝影。「中春」記者當即表示，美國是民主國家，「中國之春」是在美國正式註冊的合法新聞機構，任何人無權干涉新聞自由，否則將訴諸法庭。但中春記者頗有涵養，考慮到亞美文化協會受到中共的壓力，有其難處和苦衷，便答應了這位賴先生的要求。沒有把事情擴大。

我認為，「中國之春」是開放後，中國大陸留學生在海外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她對中共現行的改革政策從來都是採取支持態度的。同時，希望中共的現代化應從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各領域並舉，方有成功之希望，人民生活方能得到改善。對於這樣的一份小小留學生刊物，偌大的共產黨竟如此懼怕。對「中春」宣傳的民主思想，就像國民黨對中共的統戰反應一樣，視若洪水猛獸。一位中共官員說，寧讓台灣「中央日報」到北京出版，也不能允許「中國之春」進大陸發行，這種病態心理實在是大不可取。中國的進步是十億人民的事情，不是一黨一人的事情，願中共廣開言路，集衆思獲廣益，不要限制新聞自由，更不要來到美國干涉新聞自由，那會觸犯美國法律的。儘管「中春」的幾位代表答應了協會負責

人的要求，在會議上也沒有發表演講。中共方面仍不肯干休，還向亞美文化協會施加壓力，要調查是誰通知「中國之春」的人來參加會議的。調查活動驚擾了紐約的十幾位新聞界人士和文人，引起大家的反感。這個會可以讓台灣中央社的代表參加，可以讓世界日報的記者參加（但他們均沒出席），却竭力封殺中春，其統戰目的，昭然若揭。

中共開放後有了許多改進，但是對言論新聞自由總是榆木腦袋，開不了竅。中共還有一個勢利眼的習慣，即對美籍或台灣華人極盡拉攏誘惑之能事，但對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大陸留學生，却十分粗暴，崇外媚台表現得淋漓盡致，實在令我們這些接受民主思想的大陸留學生寒心和失望。

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具備一些民主社會新聞自由的常識。可以在此講個故事：華盛頓總統曾在受到一個記者批評時說：「我恨不得想和他決鬥。但我又必須尊重他的新聞自由。」美國新聞界有這麼一句話：「我反對你的觀點，但我會用生命保衛你發言的權力。」中國政府要在海外建立開明形象，就應該多多知道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和法治精神，不要總是令大家失望，做些令人耻笑之事。

撥雲見日話台北

解鈴還需繫鈴人

——看台北當局處理

女籃赴俄參加比賽

最近，台北當局在處理涉外事務的態度上，已有了極大轉變。首先對「華航貨機」事件，由堅持「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的原則，轉變為「不畏懼、不迴避、不屈服」的積極原則。在技術層面愈見其彈性化，獲得了台灣人民以及國際間的好評。接着，台灣的女子籃球隊在贏得亞洲地區代表權後，將於八月間前往莫斯科參加第十屆世界杯女子籃球大賽，這是國民黨自「華航」事件以來，再度採彈性政策的一個轉變。表面上，充分顯示了「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政策的明智之舉，是值得肯定的。但，遺憾的是，對隨女籃赴俄京採訪

(台灣留學生·美國) 凌天鳳

的記者，却出乎意外地有所限制。使我們深感台北當局對「政治與體育」分離的政策無法確實貫徹，並且對事情處理也無一定準則及一貫政策。

根據新聞報導，台北當局對隨女籃赴俄京採訪記者，初步決定採取「局部開放」原則，亦即台灣電視公司、中國電視公司、中華電視台等，可以派少數記者辦理球賽轉播事宜。文字採訪方面，則可能僅由在美的「遠東新聞社」負責。台灣的所有報社、通訊社、雜誌社、廣播電台一概不准派員採訪。

由以上報導看，對這件事情處理的過程，國民黨似乎扮演了主宰的角色；決定了誰可以去採訪，可以採訪什麼，應該報導什麼。有干預新聞媒體自主權之嫌，有扭曲新聞從業人員自由報導之嫌，從而也剝奪了全島上一千九百多萬人民「知」的權利。

國民黨在近年來，由於島內民智的開放，國際不利潮流的衝擊，對一些事務的處理尺度

，已較前開放，誠為可喜現象。但其開放尺度，却往往因事而有別。「華航」機事件可與中國大陸直接談判，商品可用轉口方式與共產世界交易，反而與政治毫無相干的體育，却大行其逆行逆施的政策。

此次記者隨女籃採訪事件的風波，在台北當局所持理由是在堅持其「基本國策」之下，將朝更有彈性走，但不是盲目快速地走，而必須審慎一步一步地走，不能一步跨得太大太遠。事實上，這種顧慮誠屬多餘。在政策上准許球隊前往俄京參賽，是值得稱許，何以對採訪一事竟如此多所限制？他們忘了，民衆有「知」的權利，記者有報導「事實」的權利，這是民主國家新聞自由的最基本權利。國民黨號稱有充分新聞自由，我們也深信在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是較中國大陸的新聞從業人員充分享有新聞自由。但何以在此關鍵事務上，却要層層限制呢？國民黨所持的另一理由竟是「怕新聞記者赴俄採訪會形成一種假象」，其實說穿



台灣女籃全體隊員

了完全是一種諱疾忌醫的十分不健康心理在作祟，又那裏能構成說服力？却十足表現了在心態上不敢面對現實的眞象。國民黨自小學以至大學，天天都在實施「反共」教育，到頭來却變成「恐共」，顯見其對三十幾年來的教育未具信心。是國民黨的悲哀？抑或人民的悲哀？

多元化的外交是每個民主國家必經、也是必走的一條路。台北的新聞界應據理以爭，組團赴俄京採訪。台北當局也應捨棄以鴛鳥心態來處理此問題，避免再度陷入自我孤立僵局。將記者自由的報導，留給讀者判斷和選擇，而政府不再加以干涉，否則民主政治勢難迅速紮根與落實。

勿以小我誤大我

——兼向國民黨及

黨外人士進一言

國民黨一黨獨大統治了台灣三十餘年，就在對國事稍有理想、有抱負的台灣黨外人士，數年來苦心經營，稍具雛型的一種「政黨組織」逼迫下，終於有了今年五月十日及五月二十四日的兩次黨內外溝通。溝通的意義是正面的、肯定的。它關係着台灣未來政治走向能否和諧安定，以及台灣內部能否繼續繁榮進步，從而締造眞正的民主政治，爲台灣一千九百萬人帶來福祉。如今却因種種事端遭到了挫折，黨內外對峙情勢又有昇高危機。影響黨內外溝通的幾件事是：

一、蓬萊島雜誌誹謗官司判決，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分處八個月徒刑，因此



台北市議會會長張建邦（左二）探視在市議會前靜坐抗議，即將入獄的陳水扁（中）李逸洋（左）黃天福（右）

黨外人士在台灣各地發起「坐監惜別會」，使街頭運動又見擡頭。

二、蘇秋鎮、李敖、鄭南榕等積極籌劃發起「台灣民主黨」組黨步驟，使黨外激進派加緊組黨腳步。

三、國民黨強硬保守派人士組成自救委員會，散發傳單，強烈批評與黨外溝通之不當，同時也批評居間協調的學者。

四、國民黨立法院議事規則修正案，爭論不下，國民黨決意強行表決，來對抗黨外立委的杯葛，導致黨外立委分別退席。

五、黨外綠色五·一九行動，以及各地黨外公政會成立。

六、拘捕「民主天地」發行人鄭南榕事件。無可諱言，在一個開放性的民主社會中，衝突原不足畏懼。而任何民主政治，在求得理

想與觀點一致前，都要付出極大代價。對立雙方，祇要以開潤的胸襟，冷靜的心態，透過正當管道，對問題癥結，加以溝通與紓解，不難獲得協調。但反觀這二次黨內外的溝通，顯然地未能在大前提下着眼，以致彼此都逐漸失去了耐心與信心。使稍見微曦的民主政治，又再度陷入陰霾，再度走向兩極化。這種僵局一日不得化解，台灣眞正民主政治，將永無實現的一天。

平心靜氣而論，台灣黨內外的政治衝突，已非一朝一夕之事，當然也絕非一時的壓制即可消弭於無形。變數操在雙方之手，端賴雙方努力程度而定。當然，國民黨統治台灣這許多年，對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顯然遲緩而令黨外不耐。幾個敏感性問題，如組黨、戒嚴、報禁、台灣地方自治等問題，都懸而不決，一拖再延，在在都形成了黨外對政治訴求的主題。現在，黨內外歷經了二次各說各話的溝通，而第三次溝通又在未可預期下，雙方稍有不慎，即可能鑄成大錯，永難彌補。

台灣之有今天，是它神奇的經濟在維繫。任何健全經濟都經不起動盪的，現在台灣正處在一個空前動盪環境中。黨外群眾基礎日益增多，素質也日見提高，國民黨不可忽視潛藏在黨外群眾背後的問題，黨外也不可沉醉在群眾掌聲中。黨內外如何縮小認知差距，建立共識，表現寬容與節制，是化解政治歧見關鍵所在。各持己見，各行其是，對民主政治的推動將只有帶來破壞，而無所建設。

我們誠然希求國民黨以及台灣黨外人士，雙方重新建立共識基礎，重新檢討，積極尋求溝通可能性，避免各持己論，各堅立場，進一步緩和和政治對立緊張情勢，在峯迴路轉中，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文藝園地●



血
絲

——紀念我的朋友王荃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晴 曉

在天堂和地獄之間，你選擇了地獄。
在歡樂與寂寞之間，你選擇了寂寞。
去年的今天，我從同時收到的幾位遠方朋友的來信中得知，我的朋友王荃患肺癌死於S省立醫院。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相信王荃已不在人世這個事實。在這異國他鄉，每當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而惆悵，我總是習慣性地提起筆寫信給他，期待他的指點和關懷。
他有山東人高大的身軀，寬寬的肩，挺拔的腰背。他邁起大步來，我需小跑才能追上他。除了風霜和歲月在他臉上刻下一道道皺紋，從背後看他只是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然而他已經六十二歲了。在我離鄉背井前和他分別時，他說：

「你這一去，很快會忘記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的朋友們的。我不指望分享你的快樂，我只希望在你遇到坎坷而苦惱時，給我寫封信，讓我分擔你的憂愁。如果若干年後，你能舊地重遊，希望你在我的墓地上撒一把新土，插一朵小白花。」

「我也許會忘記這個地方，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況且死亡並非和人類的年齡成正比的，或許我的骨灰會運回來由你安葬。」我認真地回答。

沒想到，和他分手不到一年，他真的去世了。

我們的認識是在那一天的晚上。

我去生物實驗室取標本，準備第二天上課時用。沒想到推門進去，實驗室中間的長條桌

上躺著一個人。聽見門響，他突地坐起來，一張臘雕似的臉看著我淡淡一笑。我吓得拔腿就跑，大喊「有鬼」。迎面走過來生物教研組的組長楊培林。她拉著我說：「別亂叫亂喊，他是我的朋友，剛落實政策回校工作，沒房子住，暫時住在實驗室。走，一塊進去坐坐。」我定了定神，跟著楊培林走進實驗室。他走過來握住我的手：「我叫王荃，剛才把你嚇著了，對不起。」楊培林在一旁補充道：「他是西南聯大畢業生，主修數理邏輯。畢業後分配到我們學校擔任教導主任，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現在回來了，但工作還未安排。」我一聽是西南聯大畢業，學數理邏輯的，被打成右派，不由對他肅然起敬。楊培林說：「王老師英文很好，你有問題可以向他請教。」全校的老師都知道我在自學英文。

「那我現在就拜你為師。」我高興地說。
「有問題我們共同研究。」他微微一笑。他穿一套破爛油漬的衣服，大概好幾年都沒有換過。楊培林拿出二十元錢：「這二十元先拿去買套衣服。為人師表，要注意衣著。」我也趕緊掏出二十元：「這算是我的拜師費。」王荃他只收下楊老師的錢，不收我的。我知道他是看我年齡小，又是女生。「你馬上就會補發工資，等補發了工資再還我，這錢算我借給你。」我硬把錢塞進他的衣袋。

第二天下午沒有課，就陪王荃上街買衣服。一路上我問他：「按政策規定，打成右派前擔任什麼職務，現在至少不能低於當時的職務。因此，至少他們會安排你當教導主任。」

「一個只有幾百個教職工的學校，副校長十幾個，教導主任八、九個，官太多了。我年齡也太老了。我要申請去教英文。日本人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懂外文，我們中國人外文水準

太低。」他說。

「是啊，當官沒什麼好處。我從小就沒興趣當官。雖然我具有當官的條件和機會。」我得意地說。

「那是因你從未做過官。你只要當上三天官，就不想下台。」出乎意料，王荃這樣回答我。「你要什麼就有什麼，想要什麼還未說出口，已有人送來或替你安排的。權力的誘惑就在於此。」這樣說來，他不是沒有嚐過當官的甜頭，不是不知當官的好處。他就是不願當官，我對他的尊敬又多了幾分。

過了幾週，他真的被分到了英文教研組，教高中三年級的英文。以他的資歷和學識，教大學尚不成問題，何況幾十個中學生。可是學生們對他的教學並不滿意，原因是他少了一顆門牙，學生說他發音不準，沒有門牙，不關風。我不願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只告訴他，我一個朋友的父親剛從印尼歸來，是相當好的牙醫，且收費公道，我願陪他去鑲門牙。他沒有拒絕我的提議。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門牙的故事」。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送到郊區的一個磚瓦廠去燒磚。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勉強能撐住，最受不了的是每頓只能吃一碗玉米粥，整天餓得頭重腳輕。尤其是在冬天，沒有棉鞋，檢一些破布條、谷草把腳包起來；沒有棉衣，檢別人丟掉的破棉絮把腰纏起來。寒冬增加飢餓的痛苦。每天放工，就到垃圾堆旁轉來轉去，希望能發現可以填肚的東西。有一天他找到一根牛骨頭，上面還有一丁點肉絲。他拾起來就啃，因為用力太猛，門牙斷了一半，不幾天整顆牙就脫落了。十幾年來他一直沒有去鑲。一個西南聯大的數理邏輯畢業生，蹲在垃圾箱旁啃牛骨頭，想像這樣的場景，我難過得流下了眼淚。王荃看我傷心，又開玩笑地說：「

在那些年裏如果迎面扔過來一個肉包子同時走過來一個傾城美女，我的兩眼只會停留在那個肉包子上。如果同時扔過來一個饅頭和手榴彈，我會置手榴彈的爆炸不顧而去搶那饅頭。」自嘲的笑容一閃即逝。「我太膽小軟弱，沒有勇氣自殺。」他沉重地嘆了口氣。

「自殺才是膽小軟弱的表現，強者就要敢於和冷酷的現實環境抗爭。」我大聲地說。

「我們怎敢抗爭，我們只能逆來順受，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尊嚴。像條狗一樣的活著，被那些智力低於自己幾百倍的人指揮著，連進廁所前還要報告看守。伊索說得好『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是我太缺乏勇氣。」王荃堅持地說。

「你能活下來就是抗爭的勝利。活下去需要勇氣，甚至需要比自殺更足夠的勇氣。」我說。

「可是，像條狗一樣的活著，除了延續個人的生命外，於社會於他人於自己又有何益？」

我啞然。

學校的對面是電影院。有天上演描寫右派苦難經歷的影片「天雲山的傳奇」。我買了兩張票，約王荃一塊去看。我為影片中主人翁的悲慘命運而唏噓哭泣。王荃聽見我唏噓的聲音，就問：「怎麼你感冒了？」隨即傳來他呼呼入睡的鼾聲。電影結束後，我邊走邊憤憤地說：「大概是過去冷酷的經歷使你神經麻痺了。」王荃聳聳肩說：「我經歷的屈辱和不幸超過電影反映出的十倍，怎麼能使我感動。」過了幾天，我又買了「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電影票，請他一塊去看。一對自由戀愛的農村青年男女，被世俗的封建愚昧逼得跳河自殺。八十年代人類已進入火箭時代，居然還有這樣陰暗的

角落。我為這個國家哭，為生活在那個角落的人們哭。而王荃，他仍然進入夢鄉。走出電影院，他看著我紅腫的雙眼說：「你看到的角落太少了。」從此我再不為他買電影票了。和他一塊看電影真是自討沒趣。沒想到過了些日子，他送了一張蘇聯的「復活」電影票給我。我很高興，因為中蘇斷交，已有十幾年未上映蘇聯電影了。「復活」是根據托爾斯泰的原名小說改編的，上下集長達四小時。這次王荃沒有入睡，在卡秋莎被冤枉定罪，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絕望地高呼：「我沒有罪！」「我沒有罪！」時，我聽見王荃低低的哭泣聲。走出影院，他連聲說：「好影片，到底是世界名著，中國讀者喜歡追求情節，作家也喜歡製造離奇曲折的故事來贏得讀者，而忽略了對人物的深刻剖析、刻劃。然而偉大的事件，曲折的經歷，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人們遺忘。只有人物是不朽的。比如：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她所經歷的那個時代早已成為歷史。然而安娜·卡列尼娜這個上流社會的叛逆女性仍得到當代人們的同情和愛。又如拿破崙和他所指揮的若干戰役，人們早已記不清楚那些戰役的經過，但拿破崙的形象和名字誰能遺忘。」

我點點頭又搖搖頭說：「情節的發展推動人物形象的完成。情節由細節構成，細節如釘子，沒有這些釘子，建築物是立不起来的。」

回到學校，王荃要我到他宿舍坐一坐，他從一個皮箱裏取出一本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遞給我：「想必以前你沒看過這本書，海明威的這個故事幾乎沒有情節，却進入了世界名著」。

花了一個傍晚的時間看完「老人與海」，想找王荃談談感想。推開他的房門見他桌上放著一堆花生米，正和高小平喝著小酒。我知道

計劃生育小記

(中國大陸訪美醫生) 袁耆

高小平就是五七年貼大字報揭發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怎麼竟和這樣的卑劣小人一起喝酒聊天。我一氣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王荃來找我。他說：「人類也是一種動物，不過是會思想有語言的動物，因此人類也同時具有人性和獸性，報復是人類獸性的一種發作。我希望自己身上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動物性。」

聽了他這些話，我覺得自己的臉紅得好厲害。直到今天我想爲他逝世一週年寫點文字時，翻著他生前寄給我的幾段詩句，我還在爲我當時的衝動臉紅。

一顆受苦受難的靈魂，一顆至誠至潔的愛心。他的詩句，就是他受難靈魂和愛心的呻吟：

(一) 顛抖於蛛網中的蝴蝶還在幻想著她自己的美麗能贏得蜘蛛的愛情。

(二) 牛老了，主人剝下他的皮，製成鞭子，鞭打他的後代。

(三) 謝謝你——我的腳鍊，當世界都把我遺棄的時候，我日夜都能聽到你的歌吟，爲我進入天國而祝福。

(四) 樹葉不要抱怨樹枝背叛，樹枝也不要抱怨樹葉遺棄，這是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季節啊！

(五) 我的名字早已從你記憶的王國流失了，而你的名字却出現在我的記憶裏，仍能引起我對生命的慨嘆。爲此我是滿意的。因爲，至今我仍不遺憾我情感的執著。

王荃去了，他是進了天堂，還是入了地獄？帶著遺憾還是帶著寂寞？

現將我當年在鄉下參加計劃生育的情況，就所記得的介紹出來，供你們及關心這一問題的人參考。

時間：一九七五年冬至一九七六年春，前後約四個月左右。

地點：遼寧省法庫縣四家子公社。

計劃生育小組成員：組長：四家子公社醫院院長。組員：1. 四家子公社婦女主任(女)；2. 四家子公社青年團書記(女)；3. 一名下鄉的「五七」幹部(男)；4. 我本人，係臨時借調協助工作。

準備工作：在正式開展工作前，早已作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工作，例如先通過各大隊的婦女主任摸清各大隊有多少育齡婦女？婦女的月經週期情況，已婚的多少？新婚的多少？未婚的多少？已婚多年的有幾個子女？現有多少妊娠的，幾個月了？：：：通過調查以掌握計劃生育對象的情況。

具體作法：計劃生育小組(以下簡稱小組)到某一大隊後，由該大隊的通訊員找到該大隊的婦女主任，再由婦女主任通知該大隊某小隊的某戶婦女來大隊部，或小組一起去該婦女家中，先對其宣講人口多的害處，然後宣講黨的人口政策，最後講一胎化政策的獎懲辦法。講完後讓對方考慮一下再表態。

就我所知，根本沒有人當場表態的，都是藉口說要回去和「當家的」商量一下再說，這些都是推托之詞。因此，有時要經過反復多次的「說服」、「動員」，才能徵得對方的同意，但也有同意後又反悔的。

獎懲辦法：凡是只生一胎的，孩子可以上戶口，多分一份口糧，多給一份自留地，再送給幾尺紅布。但父母的任何一方則必須接受絕育手術(輸精管結紮或輸卵管結紮)，以後小孩長大了入學、升學及招工等均有優待。

如係超生者，屬黑人，不給上戶口，不配給口糧，不增加自留地，當然更說不上有什麼優待照顧了。

這一着十分厲害，不給上戶口還是小事，大不了不能入學而已，唯獨不給口糧及不分配給自留地，對農民來說是莫大的威脅。因爲本來每年年終時分的口糧就不夠吃，現在多一口人後當然會更不夠吃了。

農民在此強大政治壓力下，真是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有的人就逃奔他鄉，等生育完後再回來，用造成「既成事實」的辦法來對抗。可是共產黨不怕你跑，乃對男方說：「你女人跑了不要緊，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們派人四處去找，派出去的人的旅費、食宿費都要由你負擔，如你拿不出錢，則叫你賣掉縫紉機、自行車等值錢的東西，來頂賬，否則年終在工分中扣還。」這樣就把逃跑的人家整苦了。其實，逃跑也真不是辦法，因爲他們早就知道這位婦女是由哪縣、哪村嫁來的，娘家、姥娘家是誰。所以很容易把逃跑的人「找」回來。但也有乖巧的逃到偏遠的親戚家去的，找不到，但這一筆找人的費用却要由該位婦女負擔。

計劃生育手術隊之組成：手術隊是由縣醫院抽調醫護人員組成，分駐到各公社。因法庫縣共有二十個公社，不可能派出二十個手術隊，只能每個手術隊到幾個公社，輪流不斷地去進行手術，(結紮或人工流產)。凡作了手術的給半個月休假，並發給一些細糧(如小米、大米或白麵)，以資鼓勵。

燴麵館

(報告文學)

(歐洲) 陸明

鄭州市解放東路，關閉了一家個體戶的燴麵館。

這在中國經濟雲龍霧虎的時代，本不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事實上，除了那百十個新、老食客去碰了幾次門板之外，並無什麼人知道這件事，更無人關心這件事。如果這群「食客」中要是有一兩位高幹子女，或省報記者之類，如果這店主家有一兩條這樣的「關係」，那麼，都不至於會發生這樣的事。然而，遺憾的是：事實上，這些關係都沒有。

羊肉燴麵這東西，雖不敢用「下等人」這個稱呼，但起碼是社會上「粗人」們的食品。在食客中，有那些拉板車的、蹬三輪的、知青商店的小店員或社辦工廠的採購員之類，「崇高」一點的也不過是一兩個偶爾路過的工廠科級幹部，或來「看看」的派出所所長、稅務所所長之類，而且正是由於這類「大人物」的光顧，燴麵館便開門了。

用一句法律術語來介紹，該館「生」於一九八一年——個體經濟在中國驚蟄時代。如果從計劃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家燴麵館的興辦實屬「社會浪費」。因為從鄭州市解放路的「二、七」廣場起始，到這個小館所在地的中段，不過半條街的光景，却有各種牌號的燴麵館不

下七家，還不包括廣場一圈的兩家名震中原的「陝西×記燴麵館」。

可是為什麼其他家的就沒有關閉呢？

受這個問題折磨的也不過是那百十個「粗」食客中的一、二個。他們想：

論質量，這家新辦的燴麵館強於所有的燴麵館，甚至強於廣場上那家有「四十年」歷史、並有一名「三級麵案師」掛牌的國營「×記」燴麵館，有據為證：

新館的麵條比其他家的薄而鈎（約差兩個毫米以上）。

羊肉比其他各家多一塊（約五克），且肉精。

麵湯中的牛油濃度強最少百分之三十以上（不像國營店的湯鍋上常開著自來水龍頭）。

純香油（而不是像國營店那樣混入不少花生油）可自取。

香菜可自取。

論服務質量：這家麵館比國營店不同的是：可為拉人力車的工人添泡饅湯。

每客走後擦桌一次（而國營店大約每三客後才可能擦桌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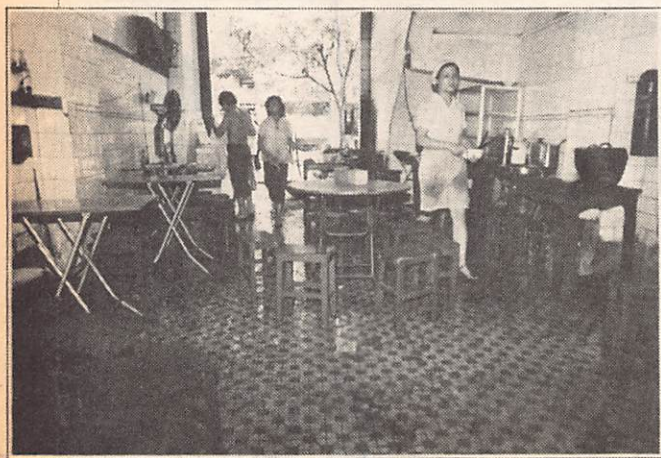
論蒼蠅的數目，每立方米的含量低於國營店百分之六十（不敢說沒有蒼蠅。因中國的蒼

蠅是「社會性」的，受民間「習慣法」的保護）。

……這些對於吃燴麵的人來說，已經有足夠的吸引力了。也是正因為有這些特點，才使得剛剛開館不足三兩個月的小館「名聲漸起」，各家的客人不約而同、似蝶戀花般地而來，不久便使這個小館「供不應求」，每到午、晚，常見小小人龍排於館門之外，而其他各家生意便相形見绌了。

本來，個體戶加入市場競爭對於改善國營與集體企業的服務質量是有促進作用的。而且事實上也是如此，為了競爭客戶，其他各家的燴麵館的服務狀況相繼改善，麵條連粘的現象及缺油少肉的現象都有所改善，桌子也改爲每兩次客後擦一次，但是……

競爭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像這樣「鶴立雞群」的小業家膽敢如此「樹敵之衆」，馬上



個體戶餐館在競爭中求存，全靠服務質量了。

引起了各國營、集體館「負責人」的注意。雖然「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罪名及「資本主義勢力」的稱號不能那麼容易地使用了，但在當今搞活、改革時代，却另有別的武器用來制裁那些膽敢與「國家」對抗的人。其辦法是：利用「國」「國」相衛的原理，首先與國家稅務所、國家食品衛生監檢部門及當地公安派出所「打招呼」，並且在「歡迎檢查」的名義下輔以招待「麵燴羊肉」，又加上這些官員之七姑八舅的光臨厚待，於是，什麼「群眾反映」、「群眾意見」……等，便成了發難的藉口。

其實，國營商店所用的這些手法，個體戶並非不會用，「麵燴羊肉」的技術人人都會。但「官員」們滿足的並不是這些，他們是精於計算的人（國家用人是很注重專業特長的）：一碗燴麵六角錢，吃乾打淨成本也有兩毛賺頭，一碗賺兩毛，一天賣十鍋就有一百五十元的賺頭，如此算來當個個體戶小老板竟比稅務所長的收入高五十倍以上，這當然不合乎中國傳統「有飯大家吃」的習慣。於是，稅務所首先找上門來。

「啊！所長來了！來碗燴麵？」兼收賬的老板一看所長夾著黑皮夾子就知道這不是來吃燴麵的。

「報一報上個月的營業額！」所長一副官腔地說。

「……啊！……回頭我侄子會從廣州帶回兩台日本彩電，我想您家也該……」老板心有靈犀地拿驢頭對上了馬嘴。

……然而，他能有多少彩電送人呢？稅務所長、稅務員、派出所長、街區民警、衛生監理、居委會主任……，要知道，這世上與人為難的藉口實在太多了，「偷稅漏稅」、「份數

不夠」、「衛生不佳」（有蒼蠅）、「門口自行車太多」、「干擾社會治安」等等，一次、兩次，「索」禮者越打發越多，像是有傳染病一樣，稍有照顧不到，就被慘重罰款。於是，這家開戶不足兩年的「新生事物」，終於應付不了社會（可以說是「國家」或國家官僚們）的勒索，乾脆關門心靜……。

這件事可以說完了，老板的結局也並不像文學家描述的如何慘，也許他賺了一筆錢席捲而去，又做其他生意去了，也許……。

總之，他沒有因「偷稅漏稅」、「行賄」或「經濟犯罪」而坐牢，雖然他也確實漏過稅、行過賄。只因爲看到了一個新電影中歌頌了一位勇於改革的省委書記，才想起寫這篇「祭文報導，或許也碰上一個什麼「長」之類的清官，看過秘書或下屬部門送上的「國外材料」，於是在全省××幹部大會上慷慨陳詞一番。

「……同志們，我們現在有不少同志，在改革中得了紅眼病，他們只看見人家個體戶賺了大錢，却不知道那些個體戶者的艱辛，你們知道香菜多少錢一斤嗎？你們知道哪裏有質精而價廉的鮮羊肉嗎？你們知道那土製的燴麵灶旁溫度幾何？又知道小老板其人幾點入睡？幾點起身？……當然，我們並不鼓勵經濟上的違法亂紀。我們要學會用法律的辦法管理經濟，我們要××××，我們要××××，我們應該××××××，我應該××××××」

痛快！

可是，「死」的已經死了，活著的店裏依然有蒼蠅，桌子還是三客抹一次，麵條的厚度又依然如故了！而價格「聽說」（一定是聽說，沒有證據的）又漲了兩次，該是八角錢一碗了吧！

依戀

一個小男孩，
送我一隻
未蛻殼的雛蟬。
小生命，
似乎帶來我的童年。

我瞧着她，
掙扎着脫掉
堅硬的外殼，
顫抖着伸展
金色的雙翅。
可是，沒有離開，
只靜靜地覆在
萎下去的舊衣上，
許久，許久。
直到美麗的翅膀變硬，
還是依戀那
難看的過去！

我感動
但迷惑了。
於是，
把她擲向空中，
讓她飛走，
作爲我對自由的
寄托。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楊漫克

● 文藝園地 ●

請你做二件實事，支援大陸民運活動！

親愛的同胞、同學和讀者們：

很多中國人有一個習慣：「說的多，做的少。」提起中國大陸的現狀，絕大多數人不滿意，可是想幹點兒實事、以改變現狀者，却又不多。對待民主運動這樣的「公益事業」，多數人同情、支持，並盼望着有些成效，以便自己也能受益。可是，自己出點力嘛，却又有所顧忌。這就是搞民運這類「公益事業」的最難之處。

問題就在這裏：你不出力，他不出力，我不出力，還有誰出力？民運是群眾的事業，大家都不想出力，也就不會有大成果，也就造不出什麼「公益」為大家所享。

好在已有一批批自做「填坑石子」的人站了出來，為民運做了大量開路工作。萬事起頭難，已經有了開頭，後面的工作就靠各位有心人的積極參與了。

您一定會問：「做為一個普通的華僑，一個普通的留學生，一個普通的出國訪問人員，我能為中國民運做些什麼？」其實，可做的事太多了，我們列出幾件，您看看能做什麼：

一、幫助我們收集國內單位和個人的郵寄地址（如中國大陸各地電話簿、各種有中國大陸地址的貿易手冊、旅遊指南、大陸大學介紹、公司、廠礦介紹、聯誼會、校友會通訊錄……），以及中央首長住址，您的老師、同學、同事和所在單位幹部的地址等等。我們將通過各種渠道，將民運信息帶給他們。多了沒有，每個讀者給我們提供兩、三個，我們就會徵集到數以萬計的地址；

二、幫助我們收集中國大陸留學生和中國駐外機構（包括外交、商業和文化等）的通訊處，以便我們將民運資料寄給他們；

三、把你保存的中國之春雜誌轉給或寄給剛出國的留學生和出訪人員；

四、幫助我們往國內郵寄「中國之春簡訊」。往國內郵寄「中國之春」雜誌，由於體積大，易被海關發現、扣留，但「中國之春簡訊」，就像普通書信一樣，不易被察覺。經驗表明，過去我們往國內寄發的大量「簡訊」，大都能夠收到。您若願做此工作，請來信說明。想想看，每人每月往國內寄十份「簡訊」，一千個人就可以寄上萬份；

五、往國內攜帶「中國之春」雜誌和「簡訊」。中國海關對華僑通常免檢，已有很多愛國華僑幫助我們帶進各種印刷品，從未出過差錯。請海外華僑協助我們做好此項工作。

涓水可以匯成巨流。您的點滴努力，可能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果。一切有心人，為改變我們祖國的落後面貌，做一兩件實事吧！歷史將記錄下您的貢獻。

您的捐款 ● 可獲減稅

中國民聯擴大活動 亟需各界捐款相助

親愛的各界同胞：

中國民聯在去年年底召開二大後，組織逐步健全，運作漸上軌道。為進一步擴大影響，向中國大陸更多地傳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思想，向外界及時報告中國大陸的實情，中國民聯決定開展更多的活動，亟需各界同胞捐款相助。我們擬議中的活動包括：

1 出版英文版「中國之春文選」，目的是向英語各界介紹中國大陸的實情，爭取使中國民主運動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援；

2 在世界各個與中國大陸有直接航班的大城市飛機場，向中國大陸外出人員贈送中國之春雜誌和有關印刷品，我們已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開展此項活動達一年之久，收效宏大。基於此，我們準備在世界各地將此項活動全面推展。

3 組織演講團到大學展開宣講活動。

4 組織人員回大陸慰問尚在獄中的民運人士家屬。

我們還有更多更多的計劃，但由於經費拮据，均無法開展。各項活動均有預算，您多捐款一分，中國大陸民運活動就多開展一點。

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Spring，亦歡迎與我們個別接觸。

您的捐助，可獲減稅。歷史將記錄下您對中國民運的貢獻。

中國民聯總部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507-6442 (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6.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T. P. Lee #3437 34-39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